

◎韩春梅 主编

兰州市城关区
历史文化丛书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办公室
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金声 玉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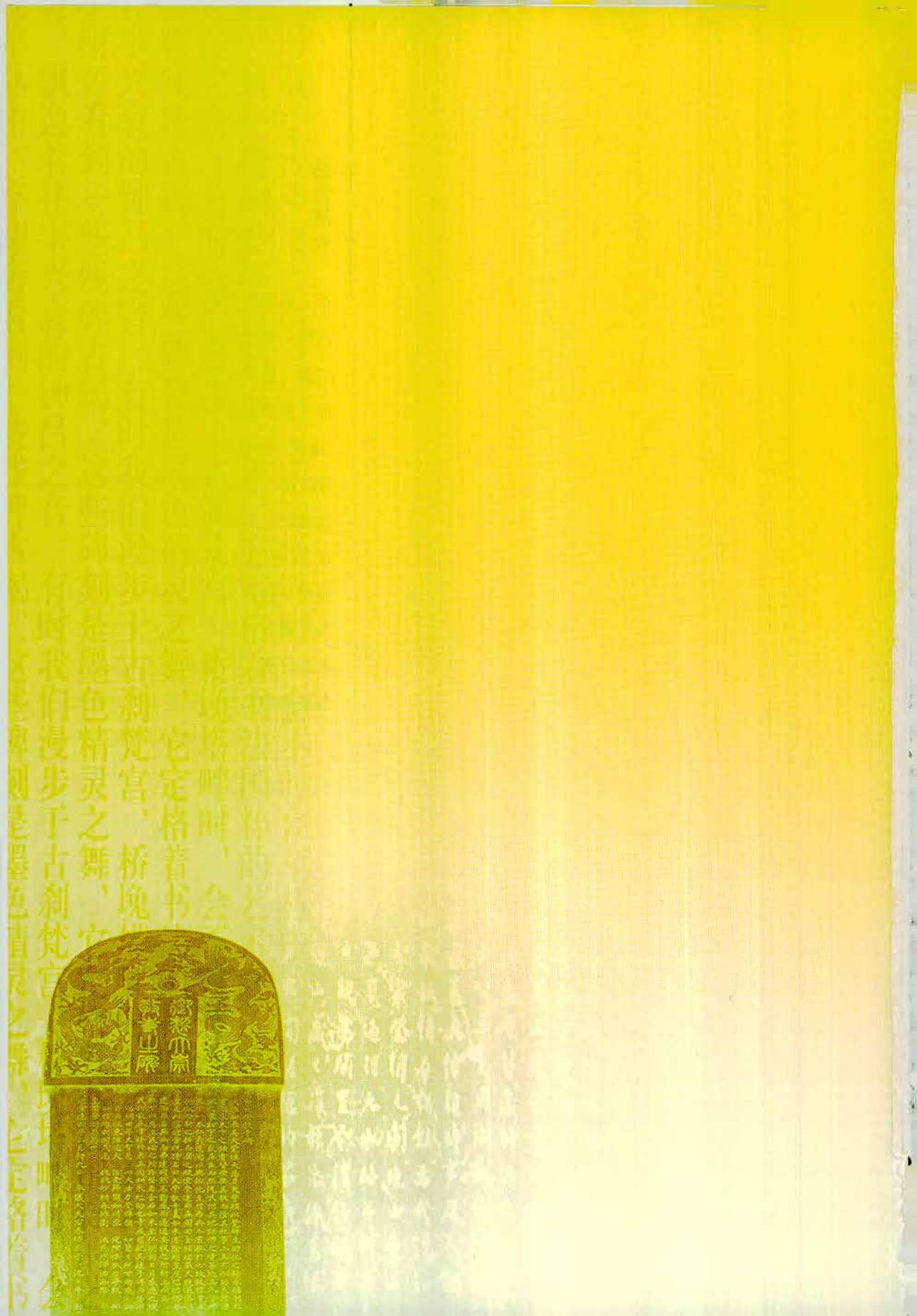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高羔 著

有时我们漫步于古刹梵宫、桥塔塔畔时，会不时在草丛中、亭榭旁看到一些残碑古碣，这些碑刻是墨色精灵之舞，它定格着书法纯粹的艺术之美，飘逸着往事兴衰的钟吕之音。



 甘肃文化出版社



兰州市城关区
历史文化丛书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办公室
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韩春梅 主编

金声

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高羔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声玉振 :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 高羔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 5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 / 韩春梅主编)
ISBN 978-7-5490-1353-1

I. ①金… II. ①高… III. ①碑刻 — 介绍 — 兰州
IV. ①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0947号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高羔 | 著

责任编辑 | 吴艳丽

封面设计 | 李中安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231千

印 张 | 17.5

插 页 | 12

版 次 |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5月第1次

印 数 | 1-3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1353-1

定 价 | 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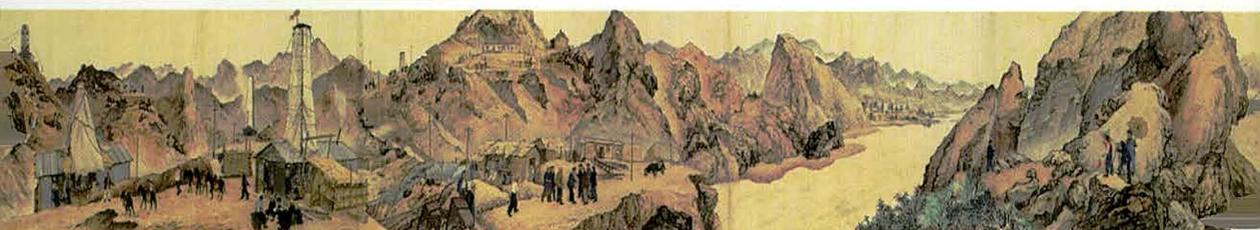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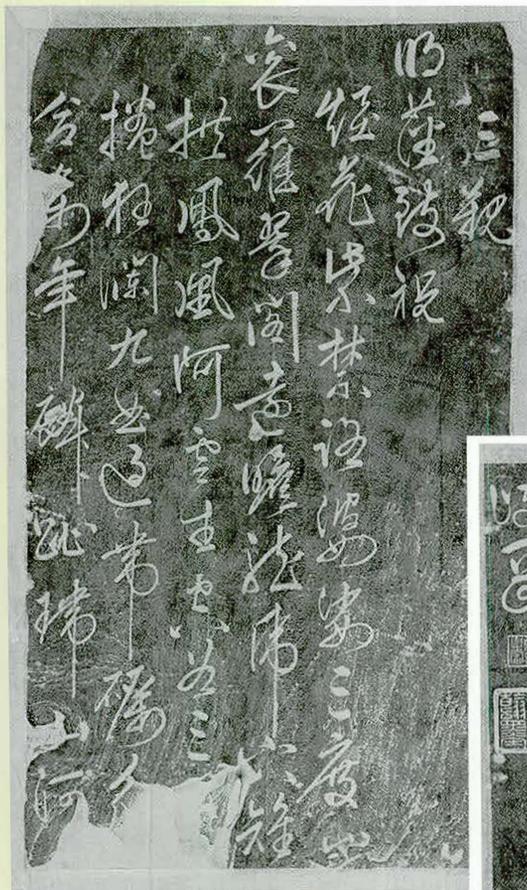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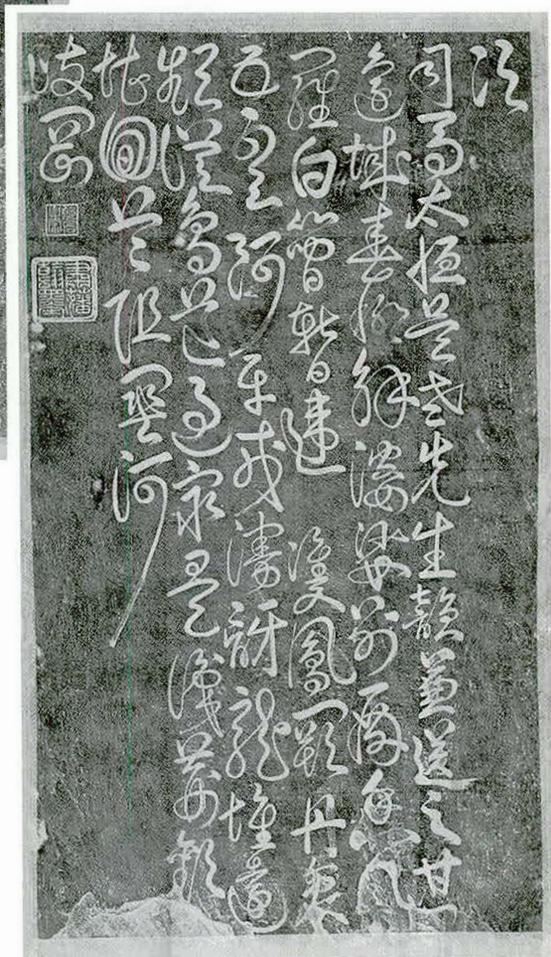
彭泽墨迹

《兰州新风景》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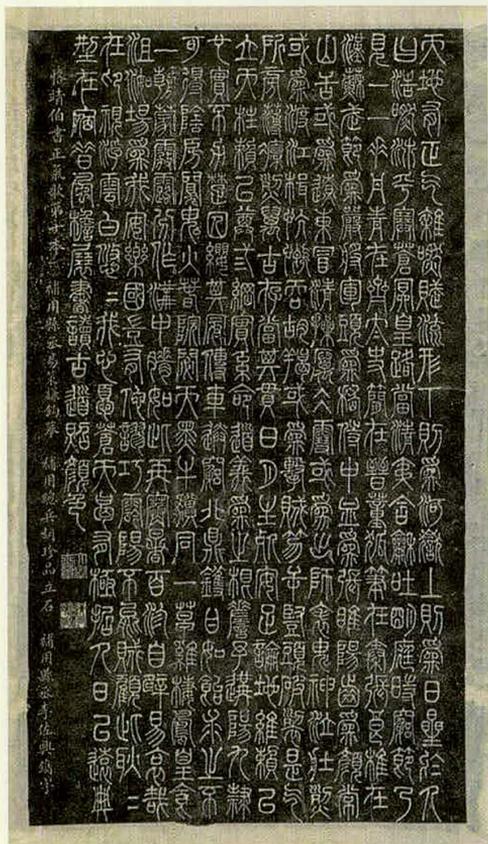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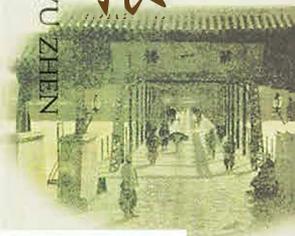
《三親明藩致祝》碑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口》碑

金声玉振

JIN SHENG YU ZHEN



原拓左宗棠篆书《正气歌》



现拓左宗棠篆书《正气歌》



仿王淑明筆意

淑明作畫每於溪澗著林木
即臺間便資丰平絕倫著
仿其意愧多生云

漢作朝鴻都



顏鴻都繪《仿王淑明山水圖軸》

金声玉振

JIN SHENG YU ZHEN



聖人之道，自孔子而後，
世宗師之。其教之於天下，
如日月之麗天，不可磨滅。
其教之於萬世，如江河之
流，不可斷絕。此其所以為
萬世師也。

赵孟頫画、刘尔炘题跋孔子像



明福指画人物

金声玉振

JIN SHENG YU Z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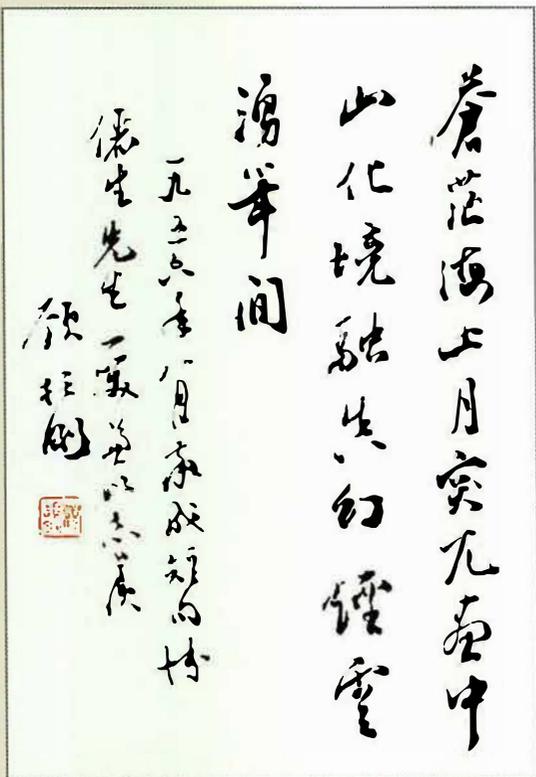
升允题“第一桥”

和景秋坪節使督署拂雲樓原韻
 作賦豪情脫憤投不關王祭感登樓
 煙消大漠羣山出河入長天落日浮
 白塔無倚飛鳥迴百年印塔山蒼梧有淚
 斷碑愁若云碑在橋下傷心梁苑繁
 華盡柱本有花欲把興亡數到頭
 金城故郡幾星霜漢代窮兵開戰場
 豈料一時雄武盡遂令千古重邊防
 西人轉鎮疲東國廿肅軍儲數四百
南疆省時制所為家可親年伯方諸
似轉星走以有取於博大夫小未之
 憂南仲何年罷朔方未必儒生解履
 樂登臨偏易起徬徨
 光緒十四年四月時隨侍甘藩署
 憇園之樂壽堂
 瀏陽復生譚嗣同

譚嗣同《和景秋坪節使督署拂云樓原韻》墨迹



顾颉刚赠予赵俪生书法作品



张大千绘《青灯课子图》

金声玉振

JIN SHENG YU ZHEN

姚凤岐绘《三星图》



张大千绘《长松高士图》



张大千绘《石潭游鱼图》

不據山河擬平
地天地為之久

依日耶
甲申秋日子庵郭維屏畫



蒼天何故生猛常全晴既、鉤爪舞
炳豈翁為大人儀即撲肉血恣吞吐
明月沈山萬壑冥為風呼嘯一林腥在
山高可底蘇密土押翻使禍生室為
今謂是神箭自為我引弓持孝配
不飽惟祝皇天速使交謀祥生物生
竹工八口表瑞合仁居郊藪

高一涵題



郭維屏繪、高一涵題跋《虎嘯圖》

总序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群体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所在。

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交通、商贸中心区，位居黄河上游、兰州河谷盆地东部，位于我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交会处，居南北之中，扼东西要塞，座中四联，雄踞西北，古时就有“黄河九曲通佳气，西域咽喉在此间”的记载。承天地之恩泽，得黄河之浸润，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滔滔黄河穿城而过，横贯东西，将城关区分为南、北两部分，白塔山雄踞岸北，皋兰山耸立城南，两山对峙，峰峦迭起，构成城关区的天然屏障，自古有“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之誉。

城关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在城关黄河两岸的阶地上已分布许多先民聚落。秦汉时期，兰州一直是汉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在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陇西郡榆中县之

后，尤其是隋开皇元年（581年）在皋兰山下设兰州以来，城关地区即为县、府、州、市治所在地，今天城关区的范围大抵就是隋唐以降兰州治所及近郊。到清代后，城关因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均备受瞩目，曾经一度成为甘、宁、青、新的核心区域。民国时期，兰州市基本上在今城关区范围以内，而且兰州市、皋兰县曾同治于今城关区。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几经调整，于1955年正式设立城关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关区旧貌换新颜，变化翻天覆地，全省、全市中心城区的位置更加突出。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生活在城关地区的各族人民，以辛勤的劳动、聪明的才智创造了集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于一身的地域特色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形制多奇，色彩争艳，用工精细，堪称彩陶的精品，达到了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巅峰，成为兰州黄河文化的渊藪。秦汉以来，以城关区为中心的兰州曾凭借秦陇锁钥、东西咽喉、津渡四境、关通八方的区位优势，成为丝绸之路和元明清时期陕甘、甘新驿道上的商埠重镇，呈现了“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独特的地理区位，也使得城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居住着汉、回、满、藏、维吾尔等众多民族，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所共存，演绎着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对抗与冲撞、渗透与融合、同化与变异的蔚然大观；黄河水车、太平鼓、羊皮筏子、秦腔、剪纸、刻葫芦等诸多民俗文化，保留着历史演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印迹，渲染出古朴凝重而又酣畅明快的城关民俗风情全景图。这里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有博学多才、操守严正的黄谏，为官清廉的理学家段坚，文武全才的彭泽，直谏御史吴可读，文坛泰斗张国常，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刘尔炘，首创黄河水车、倒挽河水灌溉农田的段续。这里还是西北工业和甘肃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发生最早之地。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创设制造局、织呢局，开创了兰州乃至西北工业的先河；清末新政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建成黄河第一铁桥，至今仍为兰州的标志。这一切，养就了城关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情怀和气度，城关文化因此表现出坚持坚守的从容、奋发进取的勇气和创新创造的活力。

历史孕育了文化，文化反映着历史。研究、总结和借鉴城关历史，传承、创新和发展城关文化，是历史托付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此，我们启动了《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组织了一批学养和文笔俱佳的学者、作家，集思广益，通力合作，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求是的精神，科学把握，辩证取舍，选择了最能体现城关文化研究成果的12个方面，以《人物春秋》《土木之功》《街巷旧事》《太平鼓韵》《名札集束》《良风美俗》《工商辐辏》《千载芸香》《艺苑经典》《杏坛遗泽》《文博精藏》《金声玉振》等分册铺叙，通过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以及鲜活的掌故、口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了城关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西北重镇、历史名城。这12本书，就像12张精美的地方文化名片，内容琳琅满目，图片新鲜珍贵，材料真实可靠，语言浅显生动，融史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有关城关历史文化形成、发展和内涵的诠释都将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套丛书，是迄今为止唯

——一套既传承千年文明，又充满时代精神的城关历史文化百科全书，是城关历史上第一套全面展示全区历史风貌的通俗文化读物。

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积蓄、创新发展的过程。纵观历史长河，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先贤前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城关文化，我们相信，当代城关人也一定能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以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推动全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出新的文明、新的辉煌！

引 言

文字是依据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字最初是帮助人们进行记录、记载的符号。文字有了音的要素后，才有了交流的功能。

汉字结体方正，每个字的形体都不一样，变化万千，加上我们中国的毛笔刚劲挺健，在书写的时候，通过速度、轻重、枯湿的变化，可以创造非常丰富的笔墨形象，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门类——书法。书法早在东汉末年即以艺术的形式流传下来。有人说，历史纪念的任务，在别的地方往往由雕塑（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秦始皇为了纪念其完成统一大业，刻立了《泰山刻石》；颜真卿为了纪念平息安史之乱的胜利，书刻了大型摩崖《大唐中兴颂》。

我们现在在游览名山古刹、佳祠秀园时，会不时在草丛旁、亭榭中看到一些残碑古碣、牌匾联额。在现代化的都市中，这些残碑古碣、牌匾联额就像是播洒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的种子一样，有了它们才使霓虹闪耀、车水马龙的都市中飘逸着文化的馨香，可以看到历史的年

轮，感知往事兴衰的沧桑。

皋兰山下、黄河之畔，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伏龙坪出土的东汉纸，斑斑墨迹记录下了时代痕迹。时代的发展就像是五泉山的泉水般潺潺流淌、绵延不绝，当然一些文人墨客为了遣兴咏志，他们挥着竹管毛笔写之、画之。他们所写所画得以流传至今，正是以碑匾联额的形式流传下来。有些碑刻恰似墨色精灵之舞，它定格着书法国粹的艺术之美，飘逸着往事兴衰的钟吕之音。而匾额，以凝练的文字、精湛的书法，反映出深远的寓意，被称为古建筑的眼睛。

而这些碑、匾的书写者绝不是贩夫走卒，他们或为名人，或为政要，他们题写的内容，引经据典，或励志精进，或崇善酷学，具有高雅的审美情趣。

清代书学理论家刘熙载曾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天戴其苍，地履其黄。正是滔滔的黄河水孕育了一代代饱学之士，他们的墨迹和绘画作品留传至今，其中蕴涵着一种精神。如节园中，景廉的诗碑及林之望、崇保唱和诗作，通过品读诗作、欣赏墨迹，可以看出这些拖金委紫的朝廷重臣都有一种对兵连祸结争战的厌恶，祈盼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所有这些似又涵盖为一种护国佑民的精神。其中皖北人林之望宦游来到兰州，他刚正不阿、作战勇敢，坦荡拒狐妖，所以他留下的《乞假养疴留别鸣鹤园二首并跋》《鸣鹤园记》等碑刻，均以楷书写就，结体遒劲，气概凛然，这也似乎正是他刚正不阿的写照。

我们看到一些名人留下来的墨迹、画作，会肃然起敬。但是我们更

希望知道他们进行创作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以期全方位、全景式地了解他们艺术殿堂的构建。而这些小的琐记又恰恰反映出他们酷学向上的精神。丰子恺曾说：“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希望在看到一幅名画佳作后，能够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但同时又可知道他们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以砥砺后学。

周作人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他的译作《陀螺》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但我认为文字写作始终是一项严谨认真的事情，如果有“游戏”的成分在其中，那将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但对于知堂老人来说，也许其五车腹笥、智周万物，写文章只是信心拈来，故有“游戏”之说。对于我等凡夫俗子，拙愚如我者，文字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然挂一漏万，惹有不妥之处，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墨石铸华	001
陇上珍宝《淳化阁帖》	001
刘郁芬墨迹留兰	008
白塔山上岫嵒碑	013
“碧血碑”原有两块	017
金石铭文	023
将军柱铭文载千秋	023
泰和钟上的铭文	029
节园碑刻	033
景廉诗碑	033
不怕鬼的林之望	046
万卷河山	053
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	053
万卷云烟揽豪情	060
汇聚名家墨迹的《莫高窟访古图》	067
名匾寻踪	081
握桥上的匾额及其所附的文化元素	081

庄严寺匾额	085
封疆大吏	093
那彦成碑刻心系民生	093
陕甘总督升允桥畔留墨迹	106
左宗棠兰州留墨	120
乡贤遗墨	139
彭泽的真贗书法	139
邹应龙的《喜鹊闹梅图》	143
颜刚甫酷爱颜体书法	148
胡宝耕印坛玉臂手	151
李泽夫铁笔生辉	154
字里行间看人生	157
魏振皆书法逸事	160
刘尔忻的德行励后人	162
民谚书画	176
家家音得正 户户李友桃	176
家有冷字、明画不算穷	179
名画遗兰	185
兰州最早的书法墨迹	185
留在陇原的孔子像	187
张大千所绘《青灯课子图》	194
高一涵为郭维屏画作题跋	198



杨虎城墨迹留兰	201
于敏中夫妇的书与画	206
陇上白石画艺传人赵西岩	211
佚画谜踪	215
蓝方丈足拓	215
朱岫兰藏画魂归何处	219
畅想五泉山壁画	226
画坛逸事	231
顾颉刚写字无印章	231
宋万选喷墨绘蛟龙	234
颜鸿都瓜皮研粉作画	236
曹世岳椽笔写大字	237
黄胄在兰州	238
黄胄受温虚舟启发画驴	241
音得正不擅使鸡毫	243
甄载明铁锹“写”标语	245
张大千西去敦煌逸事	246
姚凤岐“点睛”有“绝活”	260
参考文献	263
后 记	265

墨石镌华

墨石镌华
MOSHISHUANJIHUA

陇上珍宝 《淳化阁帖》

甘肃被称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悠悠丝路和滔滔黄河相交于兰州，在金城兰州的历史文物或是遗迹中，肃府本《淳化阁帖》无疑是其中重量级的。

《淳化阁帖》，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历来被称作“法帖之祖”。宋淳化三年（992年），北宋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藏汉魏、西晋、南北朝及隋唐以前历代名家墨宝分类，编次成卷，刻于枣木板上，名曰《淳化阁帖》，珍藏于秘阁，故又称为《淳化秘阁法帖》。

《淳化阁帖》共分为十卷，收入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一百多人墨迹约 422 帖。卷一为历代帝王法帖，卷二至四为历代名臣法帖，卷五为诸家古法帖，卷六、七、八为王羲之法帖，卷九、十为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法帖。楷、行、草、隶、篆各书体齐备。

法帖原版捶拓极讲究，均采用当时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澄心堂纸“轻似蝉翼白如雪”，千年难得。这批原版在宋朝就已是难得的宝贝，因为宋太宗并不多拓，只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中书省、枢密院大臣每人仅一套拓本而已。元代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中有：“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张，也“此纸不敢书”。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 年—1048 年），一次宫中失火，刻帖的木板与所藏历代名帖原作悉数被毁。因此自宋代至明代留传下来的《淳化阁帖》就极为稀少珍贵。2003 年，上海博物馆以 450 万美金，购得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宋代初拓残本，也是唯一存世的宋代阁帖原版，仅存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全是书圣王羲之一人作品，共 170 帖。数百页全为正宗千年“澄心堂”拓纸，弥足珍贵！

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政权，他分封诸皇子，其中第十四子朱模被封为肃王，在前来甘肃赴任之时，朱元璋将一部宋代初拓《淳化阁帖》赏赐给他，朱模携至甘肃，一直由历代肃王相传，珍藏于内府。

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肃宪王朱绅尧临摹帖子时，觉得“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恰陕西右参政、甘肃洮岷道兵备张鹤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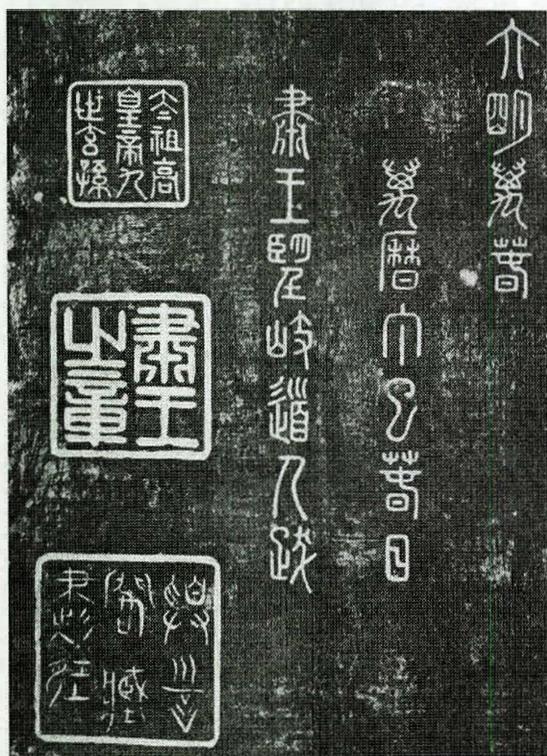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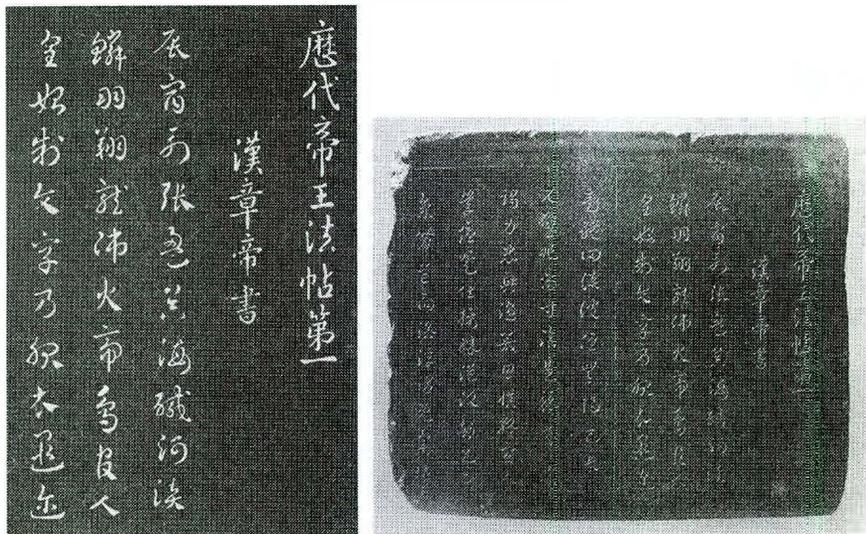
存放于志果中学的《淳化阁帖》帖石

得到友人所藏的一些枣木版阁帖，请肃宪王将所藏阁帖取出与他收藏的枣木版比照校勘。肃宪王很慷慨地将阁帖借之。同时命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二人，将阁帖双钩临摹并精刻于陕西富平石上，并为此写跋道：“雨粟泄秘，代传厥神。镌惟宋擅，允为世珍。建国获授，永保虑湮。殫精重勒，大明万寿。万历丁巳春日肃王望岐道人跋。”末尾钤“太祖高皇帝九世玄孙”及“肃王之章”。据记载，“温、张两生功苦坚一片石，朝暮作对，若面壁达摩，雪没胫而弗退也”，二人以至于“闭目梦寐，无非阁帖”。可惜肃宪王绅尧刻帖尚未成而身先逝。他的儿子朱识鋹继位后，继承了父亲这项未竟的事业，最后历时7年之久，终于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完工。共用石144块，多为两面刻文。每块

碑石高 27.8~34 厘米，宽 36.5~40.5 厘米，厚 6~8.7 厘米。所刻《淳化阁帖》又名“肃府本”或“兰州本”，又因刻成后藏于肃王府东书堂尊训阁，而称为“尊训阁本”。各卷末除照刻宋本款识外，新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1615 年）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肃府本《淳化阁帖》，初拓用太史纸，计 253 纸，程君房墨。此帖摹工精良，锋棱宛然，点画顾盼，神完意足，有“淳化亚帖”之美誉。碑帖刻成后，因朱识铉追思先祖遗命得以完成，故写跋：



《淳化阁帖》肃宪王朱绅免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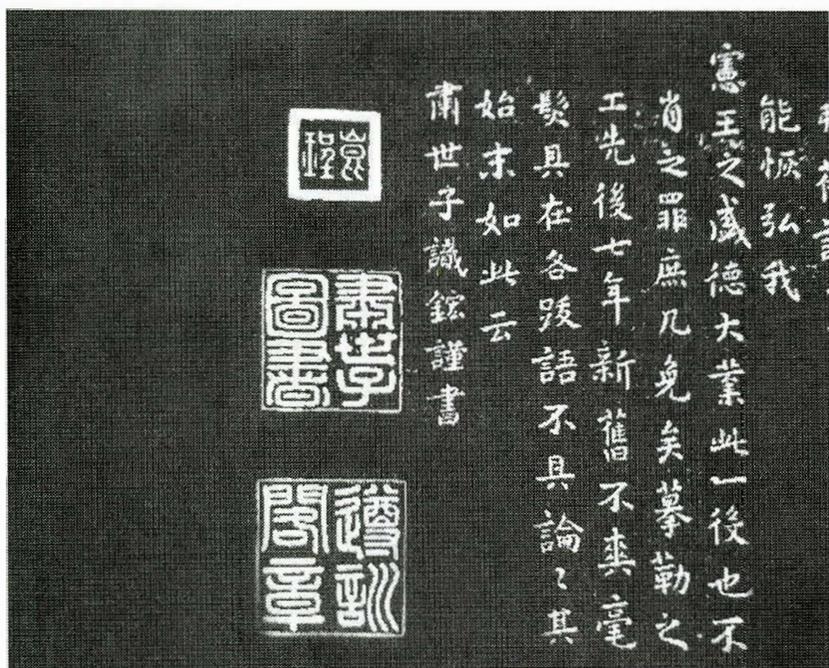
《淳化阁帖》拓片及帖石

“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庄王于甘兰，从御戎羌。而锡之以宋人淳化阁帖，无亦以文德足以柔远，干羽可以格苗之意与！珍藏内库，弘治间我恭王出而临之，仍留内库。至我宪王出而临之，恐我子孙与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乃延温、张二韵士摹勒下石，未竟而弃予。且嘱予以勿替，于辛丑六月始竣事，割牲高成，泫然流涕。临阅之际，至桓桓尚父一帖，于我圣祖之遗意，有遐思焉。夫析薪弗荷，谓之不肖。予冲年无能，恢弘我宪王盛德大业，此一役也，不肖之罪，庶几免矣。摹勒之工，先后七年，新旧不爽，毫发具〔俱〕在。各跋语不具论，论其始末如此云。肃世子识铍谨书。”

末尾铃“昆瑁”“肃世子图书章”和“遵循阁章”。

倪苏门在《古今书论》中称：“《淳化帖》在明朝，唯陕西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上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兰州画家姚金儒与静宁人王少军在民国时曾合力购得明拓肃府本《淳化阁帖》一本，帖本题跋齐全，没有一字残损。抗日战争期间，曾被朱绍良以重金购走。原拓中有重复的一张拓片被姚抽出后保存下来。甘肃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张思温曾目睹此页拓片，称“纸制墨色迥异常也”。

清顺治三年（1646年），陕西人费甲铸又将“肃本”再刻于西安，藏于西安碑林，称为“关中本”或“陕西本”。此外，江苏溧阳虞氏重



《淳化阁帖》肃王朱识铤题跋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刻本，每卷末照刻肃府本款识，是按照肃府早期拓本重摹上石。清拓重刻本，藏于南京博物馆。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二十年后即遭逢战乱，损坏严重。明末李自成义军贺锦率部攻陷兰州，王府将石刻深藏于府内井中。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陈卓聘邀陈曼仙、毛香林，补刻四十余块。康熙十四年（1675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其部将赵士升攻陷兰州后，用阁帖帖石做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是年三月，清军大举进攻兰州，征讨叛军王辅臣。王率部负隅顽抗，欲毁帖石当炮子，同时又欲将帖石移置城头做防御工事，幸有兰州知府徐某冒死陈情，竭力说服，才使叛军放弃了毁坏帖石的想法。历尽劫难后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现存刻石 141 方。

宣统二年（1910年），刘尔忻移帖石于儒学署即文庙（今兰州二中）保管，置于大成殿东侧之尊经阁中。并增刻木版释文 40 块。后儒学署裁撤，尊孔社入驻。再后尊孔社并于全陇希社，石刻遂由该社保管。1938年，日寇轰炸兰州，为策安全，将石刻埋于大成殿南面院中。1939年，志果中学在文庙中成立。后志果中学与全陇希社间发生矛盾，全陇希社遂于 1944 年趁志果中学校长赵元贞出访宁夏之机，将石刻掘出移往贡元巷丰黎义仓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时任甘肃省银行地方公益事业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水梓呈请“拨款保存淳化阁帖碑石”，甘肃省府“以该项碑石由市政府保管”，遂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十二月训令兰州市政府，“飭该府查明该项古物保管情形，并妥拟保管办法”。兰州市政府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拟定

《兰州市文庙财产及阁帖碑石保管办法》共八条，其中第二条为：“本市文庙财产暨阁帖碑石依法由兰州市政府负责保管，但为管理便利计，可由兰州市委托兰州志果中学代为保管之。”第五条为：“对于文庙各项财产暨阁帖碑石，应随时清点，确实负责保护，如有缺损，代理保管机构应负赔偿之责。”第七条为：“本市文庙财产暨阁帖碑石，应由兰州市政府列入交代，以重古物。”由于当时兰州市政府明文指定石刻由志果中学保管，于是帖石又由丰黎义仓运回志果中学，置备木架，镶嵌在尊经阁檐下，计石刻 145 块，278 面，木刻 40 块。

1966 年，肃府本《淳化阁帖》碑石移交甘肃省博物馆珍藏至今。

刘郁芬墨迹留兰

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带又称“萃英门”。这是因为清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甘肃举子赴陕西参加科考，“路程悠远”，“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伤矣”。于是左公上奏朝廷，建议陕甘分闈。而当时的举院选址即在今中山路以西、黄河南岸，当时被称为海家滩的一带。因是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而举子们都要汇聚于此参加科考，有着荟萃英才之意，故改名为“萃英门”。

因清同治年间，甘肃及西北地区战火频燃，急需枪炮军火，于是左宗棠在兰州畅家巷开设制造局，制造子弹、火药和旧式抬枪，这也是甘肃近代工业的肇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兰州道彭英甲将兰州制造局迁于小仓子（现在武都路兰园东侧）。当时有职工 113 人，车床五六部。





民国萃英门鸟瞰

进入民国后，袁世凯的心腹张广建任甘肃督军。张到兰州后，仰仗袁的势力，竟大兴土木，筹建起自己的府第。首先在选址上就颇费了一番心力。因张广建笃信迷信，他想找到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后经兴隆山某道人密勘，认为五泉山前面的史家祠堂和旧举院内至公堂西明远楼南的一段“龙脉”最旺，是绝佳的吉址。可是五泉山下的“吉地”已被他人占据，所以只好在萃英门破土开工了。木料等建材均来自连城天堂寺，由大通河入黄河源源运至兰州。整个建筑格局模仿北京顺承郡王府，建有大殿、大门和照壁。照壁砖雕百鸟朝凤，富丽堂皇，张广建亲书“带励门”。当张广建正热火朝天地修建王府之际，袁世凯宣布称帝，张广建受封一等子爵，于是更加紧了施工的进度，昼夜不停。可是没多久，短命的洪宪王朝就宣告垮台，张广建顿时也泄了气。为掩人耳目，他对外界称说所建为厂房，并将兰州制造局迁入萃英门，改名为甘肃制造局，仍制造枪械弹药。

后来，张广建黯然离开兰州。1925年，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军入甘，后又任甘肃省主席。由于当时正逢“河湟事变”，急需枪支弹药，于是刘命甘肃制造局加紧生产，日夜赶制。民国十七年（1928年），刘郁芬还亲题“甘肃制造局”五字，以鼓舞士气。刘郁芬所题“甘肃制造局”五字被勒字上碑，垒砌于该局大门的门楣上。后来，随着甘肃制造局被搬迁至西郊土门墩，该碑也被一同搬至兰通厂。如今该碑就镶嵌于兰通厂医院的门厅正墙上，也为该厂增加了一些历史底蕴。

刘郁芬（1886年—1943年），字兰江，河北清苑人。所以在该碑的左侧落款有“清苑刘郁芬”的字样，右侧题写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这通碑刻见证了甘肃工业的发展，因此也似乎成了甘肃工业发展的一块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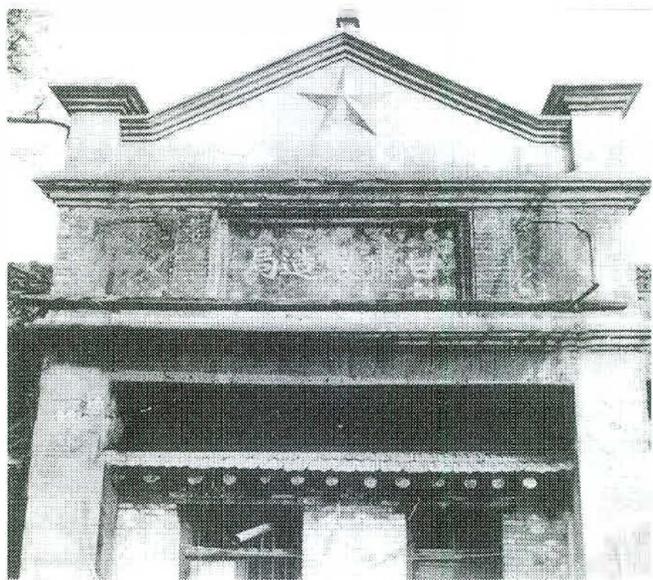
刘郁芬被称为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1930年率部随冯参加了“中原大战”，兵败后赋闲北平。抗战爆发后，他投靠了汪精卫，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开封绥靖主任，成为可耻的汉奸，后又改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1943年病死于北平。



刘郁芬

刘郁芬在兰州还干了一件惊骇世人的事情，那就是在他率军入甘不久，于1925年11月13日，为铲除异己，他以请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清部营长以上军官赴督署会餐为名，下请柬将李诓骗至督署，后将李诛杀于督署后花园。当时





甘肃制造局大门门楣上的碑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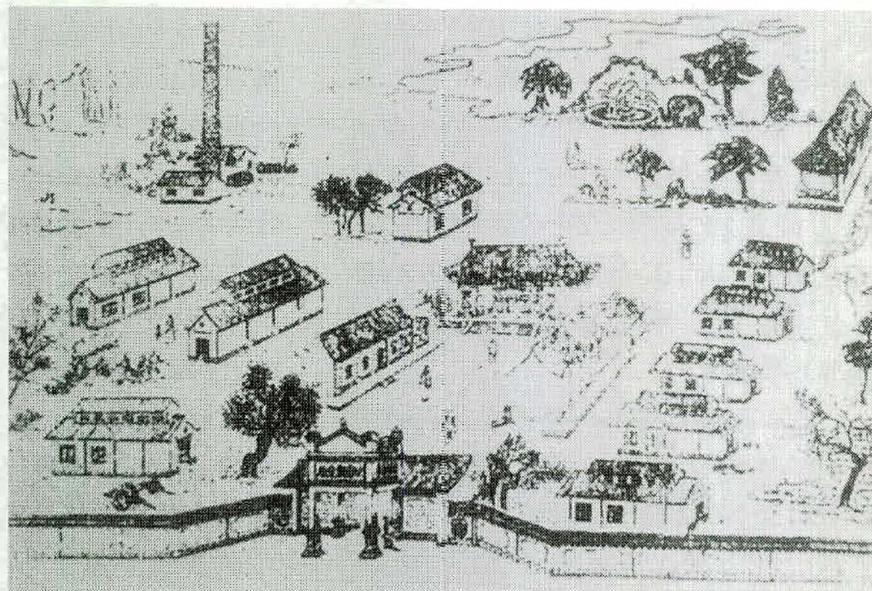
刘郁芬入甘后，共产党员宣侠父、钱靖泉等也随军来到兰州，与张一悟一起积极着手创建党的组织。这也是刘后来值得世人肯定的一面，以致刘郁芬诛杀李长清后，甘肃各路镇守使联合起来进攻兰州，竟打出了“讨赤”的旗号。

俱往矣，一切都如书籍般翻了过去，唯留下的这块碑刻见证着甘肃工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来看刘郁芬题写的“甘肃制造局”五字，韵致厚重，行楷中透着隶意，不难看出其具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其实，刘郁芬也算一名儒将，因为其幼年时入保定陆军小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童子功。后刘郁芬又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因此他的书法还透着武将的霸气。



刘郁芬所题“甘肃制造局”



甘肃制造局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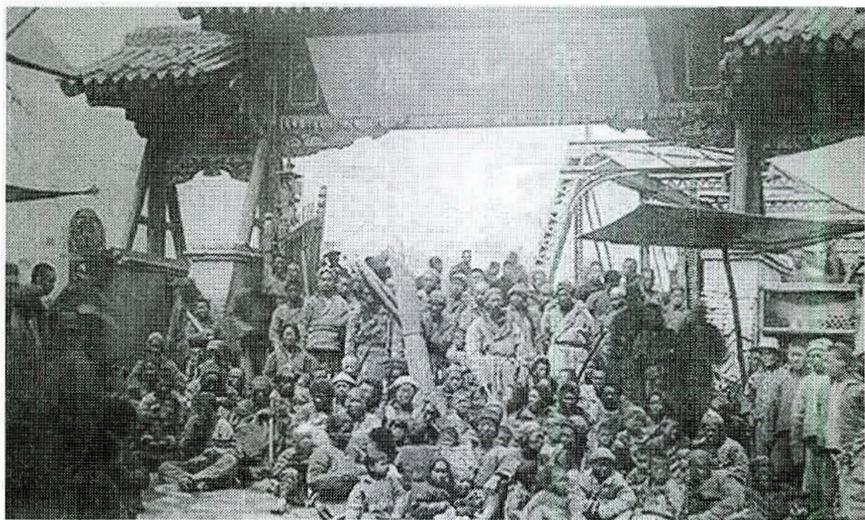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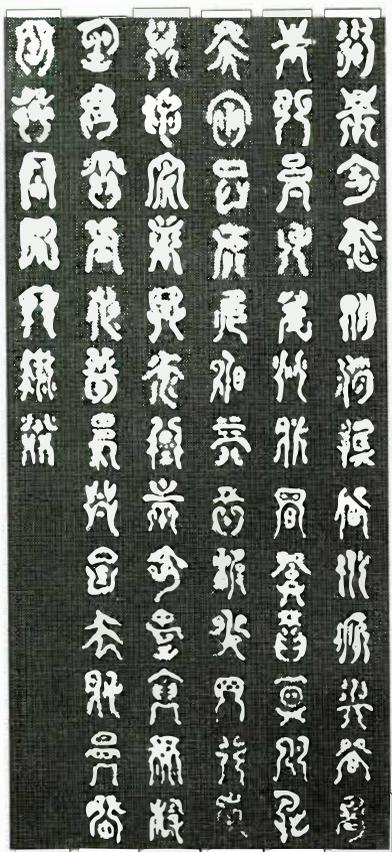
此外，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刘郁芬将黄河铁桥改为“中山桥”，并亲题匾额“中山桥”。有一张难民聚于中山桥的照片，可以看到桥头牌厦上悬挂有刘郁芬亲题的“中山桥”模糊字迹。同年，刘郁芬还将张广建题写于原“子爵府”的“带励门”改为“萃英门”，并亲书于门楣之上。另外，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还为节园内的“澄清阁”题写了一副对联：“一水引来枯井活；寸胶解尽浊河狂。”但是如今这些墨迹却荡然无存了。通过刘郁芬留在兰州的这些墨迹，我们可以看到其作为一名统兵的军人外，还有着文人墨客的儒雅。怎奈，后来他投靠了汪伪政权，成了一名可耻的汉奸，真可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啊！



刘郁芬题“中山桥”

白塔山上岫嵎碑

岫嵎碑又称“禹王碑”，有关禹王碑最早的记载，见于晋代罗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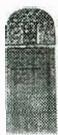


岫嵎碑

《湘中记》：“岫嵎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有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相传唐代有人在湖南衡山岫嵎峰发现有岫嵎碑，韩愈曾有诗咏道：“岫嵎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唐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也登衡岳寻觅岫嵎碑，赋诗《寄吕衡州》：“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纹螭虎形。”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张栻、林用中等结伴而行，登上衡岳，寻找禹碑而未果。因此，他

在《韩文考异》中说韩诗为传闻所误，衡山实无禹碑。

南宋嘉定年间，何致发现禹王碑，他将碑文拓了下来，摹刻在岳麓山石上。何致刻石的边上有宋代匠人题记，传世的各种拓本均未将该题记收入。但是清代陈运溶的《湘城访古录》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中收入了该题记，文字为：“嘉定壬申(1212年)秋，用七十二工。长沙匠何兴、李曾美、西川监工王兴勒字青诏。”明嘉靖九年(1530年)，长沙太守潘镒在岳麓书院发现了宋代摹刻的禹王碑，他



“剔土拓传”。因此，明季以来，昆明、成都、开封、绍兴等地皆有摹刻。因潘镒拓本共有 77 字，所以这些拓本也都为 77 字。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云南本（嘉靖甲午年 1536 年）、成都本、南京新泉书屋本（1535 年）。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本明代的原拓，该拓片字口清晰，拓工较精。

到了清代，凡与大禹传说有关的风景名胜之地又翻刻了一批禹王碑。毛会建刻于西安碑林；康熙癸丑（1673 年），李藩刻于山东黄县；咸丰十一年（1861 年），侯建功刻于兰州禹王庙。其实岫嵎碑被辗转摹刻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是我国水文化史上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

传说大禹治水时，也曾踏上陇山陇水。《尚书·禹贡》中有“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导渭自鸟鼠同穴”。其中弱水、黑水、黄河、渭水等皆是流经或发源于甘肃的河流，而合黎、三危、鸟鼠等皆是甘肃境内大山。

对于这 77 个字符的研究，自明代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或以为是夏代文字，或以为是蝌蚪文，或以为是甲骨文，或以为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更有人哀叹它是人类无法辨认的“天书”。其中著名的释文为明代杨慎、沈镒、郎瑛、杨时乔所做，这四家的释文均认为碑文所述是大禹治水的经过。其中杨慎的释文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一作罔）弗辰！往求（一作术）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哀（一

作襄)，劳馭伸裡，郁塞昏徙，南渎衍享。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甯无永奔。

可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禹王碑碑文并非是记叙大禹治水。曹锦炎在《岫嵎碑研究》一文中说：“岫嵎碑是越国刻石，是继秦沮楚文、中山国守丘刻石后，战国刻石的一次重要发现。作者为后来继承王位的朱句，刻于公元前456年。内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辞。根本不是大禹治水时的诰文。”

兰州岫嵎碑原立于黄河北金城关之金山寺北峰禹王庙前的六面亭内，其中自然有缅怀禹王治水之功绩，又有镇服水患之寓意。因金山寺坍塌，岫嵎碑凋敝，为防止毁坏之虞，后于1963年移白塔山牡丹亭，1980年又移置白塔山之白塔下禅院内。据张思温先生记载：碑宽约二尺六寸，高约六尺，厚约四寸，碑头刻蟠龙。约为碑之三分之一，刻古篆六行，行十四字，共七十七字，有释文刻于第六行下段，字有残缺。内容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
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
定华岳
余伸裡郁塞昏徙南渎衍享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甯勿永奔
咸丰辛酉三月望日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氏



兰州岫嵎碑文字形奇古怪，有似繆篆，亦如符录，不失禹王碑的古朴风貌，今最下一排字全剥蚀，现存有 72 字，损 5 字，释文仅存 63 字。这也许是侯建功对杨慎等人注中相异及缺疑者，全都予以删除。

如今，岫嵎碑傲然矗立于青峰之巅，俯瞰大河东去。尽管它的字迹怪异玄秘，难以辨认，但是其结体工稳、章法规整，仍不失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仔细品评鉴赏，可从中得到诸多书法艺术的感染和启迪。

“碧血碑”原有两块

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他在改组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大封诸子为王，让他们“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达到“屏藩王室”的作用。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朱元璋将其庶十四子朱模封为汉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改封肃王，驻平凉。二十八年（1395 年），设藩于甘州（今张掖市）。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 年），肃王朱模由于“甘、肃兵变不常”，局面复杂，难以控制；甘州寒冷而多风沙，江南官兵不服水土等原因，请求内徙，获建文帝朱允文批准。肃庄王朱模遂带领王府官员、侍卫，以及来自江南的肃王随从和其他人员移藩兰州。从此，历代肃王对兰州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无不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当然留存至今，见证了当时艺术发展，特别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则莫过于《淳化阁帖》和“碧血碑”了。

在兰州市工人文化宫西南一隅的过廊旁，有一通石碑无言地矗立着，这就是凝聚历史、颇有传奇色彩的碧血碑。

据《甘肃通志》载：拂云楼下诗碑，在皋兰城内，碑二通，俱高



七尺，宽四尺，七律各一首。一存五十二字，一存六十一字；一题“三觐明藩致祝，无年月款识”，一题“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

为何称之为“碧血碑”？《皋兰县志》给出了答案：拂云楼在北城上，中列诗碑二，碑阴血迹各一大如碗，历久不灭，相传明季冠乱肃府，二妃触碑殉难，世称碧血碑。

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部将贺锦率众挟滚滚烟尘攻破兰州，肃王妃颜氏、顾氏等为免受辱，在仓皇中登上北城墙，欲投河自尽。可是义军顷刻而来，就在拂云楼下，她们以头触碑，顿时鲜血喷漓，成为千古绝唱。按照封建时代的价值取向，为了褒扬这种节妇烈女的行为，碑自此后被称为“碧血碑”。

张维在《兰州古今注》中记载：节园城北有楼曰拂云，其初为远源楼，下临黄河，故俗谓之望河楼。楼西旧有二碑，皆为明代诗刻。崇祯末流寇陷城，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天阴雨涇则血痕斑然，故所称为碧血碑也。妃墓在节园西隅，其上有亭，前数年称亭中，易亭名“韬碧墓”，前有石刻“贞烈遗阡”四字，左文襄公书也。

后来传说，若遇阴天下雨，碑上当年斑驳的血迹则可显现。碧血碑于1976年移入兰州工人文化宫。

一块无言的石碑，但似乎又在讲述着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以及封建时代妇女的价值取向。因此，一代代文人墨客都以此碑吟诗作赋。除封疆大吏左宗棠外，还有清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景廉、陕甘总督林之望、陇上名进士王烜等庞大的阵营。

碧血碑碑文为狂草，笔力遒劲，潇洒飘逸，龙蛇竞走，这完全符合时代的书风。书法自东汉末年作为艺术流传下来，发展到明代，由统治阶层的皇室及士大夫自上而下形成一种书学意义上的复古，他们跳过宋、元书风而直追晋、唐，主要表现为对草书的狂热喜好。这一时期许多书家诸如徐渭、祝允明等，都进行着草书的创作，极具代表性的有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卷》，挥洒自如，气势纵横，颇具美感。

对于碧血碑，许多文献均记载有碑的高度、宽度，以及书体，但对于碑的内容却从无记载。根据现存于文化宫的碧血碑，可以辨认的文字为：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
 边城春柳解娑娑，别殿香风□□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青□□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欢□□，□□回首阻关河。

在这首诗的落款处有“岐冈”两字，以及“磐石之宗”和“肃藩翰墨”两枚印章。至于碧血碑为何人所写，至今存在争议。许多书籍文献中均记载碧血碑为肃怀王朱绅堵所书。但是有人提出肃怀王生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薨逝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只有16岁即英年早逝，他能否写出如此文采斐然的诗篇、潇洒飘逸的书法，还是值得

商榷的。那么，碧血碑到底为何人所写呢？根据碑文落款“岐冈”的线索，有人指出碧血碑当为肃懿王朱缙燮所写。因为在明代，王室有崇尚道教之风，如肃靖王朱真淤自号光霁道人，肃昭王朱缙烜自号星海道人。而“岐冈”即为肃懿王的道号，因为根据1993年出土于华林坪七里河区委党校的《明故苏孺人陈氏墓志铭》中，有“皇明宗室岐冈道人撰”的字样，而且同样钤有“肃藩翰墨”这枚印章。

根据《甘肃通志》《皋兰县志》记载，拂云楼下有“诗碑二通”，陕甘总督林之望也曾记述“（拂云）楼阴近堞处有二短碑”。可是现在看到的只有一通，即文化宫内的《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即使在1936年出版的《西北览胜》一书中，也只拍有《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这一通碑的照片，可见另外一通《三觐明藩致祝》碑佚失年代较早，下落成谜。

可是笔者偶然发现一幅《三觐明藩致祝》碑拓片，尽管漫漶的拓片上只残留为数不多的几个字迹，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原碑的风采。经辨认，拓片内容为：

三觐明藩致祝

经花紫禁语娑娑，三度□□□袞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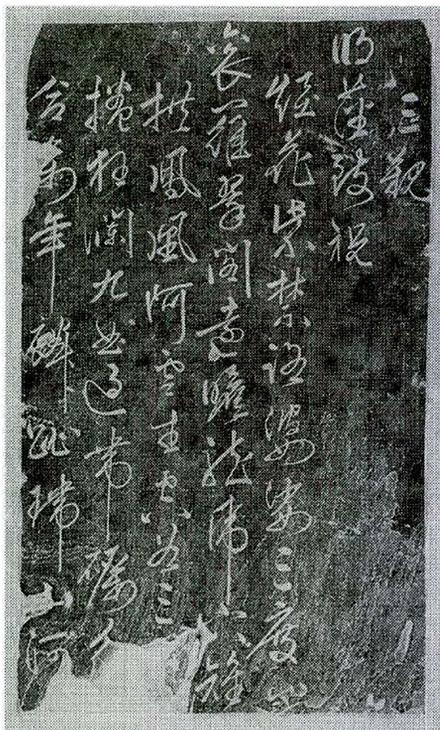
翠阁远瞩龙虎下，□□□抚凤凰阿。

云生空谷三□□，□卷狂澜九怒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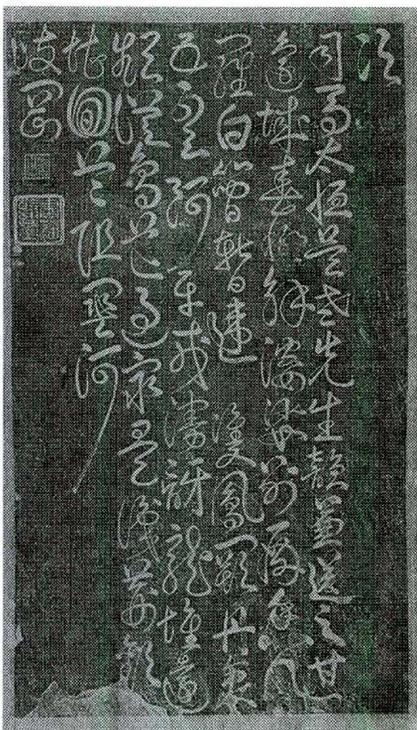
常□□□□□合，□年麟趾瑞山河。



从拓片上的文字来看，这应当是“司马太恒吴老先生”的原诗。明朝地方行政未设“郡”这一级，因此，自然没有“郡司马”。郡一级在明、清类似于府一级，而明代一个府的“同知”别称也叫司马，所以肃懿王诗中所写估计是一个代称或者说是尊称。而这位吴太恒老先生也许已经是第三次来兰州觐见肃王，并且写下了这首诗。从诗的题目可知，觐，是指觐见；藩，则是指属国地和分封的土地，一般借指边防重镇。对于明代肃王一系人们也多称为“肃藩”，如肃懿王就有“肃藩翰墨”字样的印章。



《三觐明藩致祝》碑



《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碑

也许是肃懿王为了感谢吴太恒的觐见，故以次韵方式写下了《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次韵，诗歌创作中和韵里最严格的一种，也称步韵。这就要求作者既要使用原作中的所有韵字，而且还要依循其用韵的次序。如肃懿王诗首联中的“娑”“罗”，颔联中的“阿”，颈联中的“过”和尾联中的“河”，都极为押韵。肃懿王的诗虽是步韵，却写得晓畅自然，浑然天成，不着斧凿痕。

这也许是历代肃王，因在和平年代，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环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才能写下文采斐然的诗篇、潇洒飘逸的书法。可是正是这种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的生活，致使明朝灭亡。也许末代肃王朱识鋹正在书房安详地翻阅着《淳化阁帖》，并提笔写下了“新旧不爽，毫发俱在”的跋文，正自我欣赏这一得意之作时，义军却已兵临城下，他的爱妃亦殉难于自己先祖书写的碑刻上。



金石铭文

将军柱铭文载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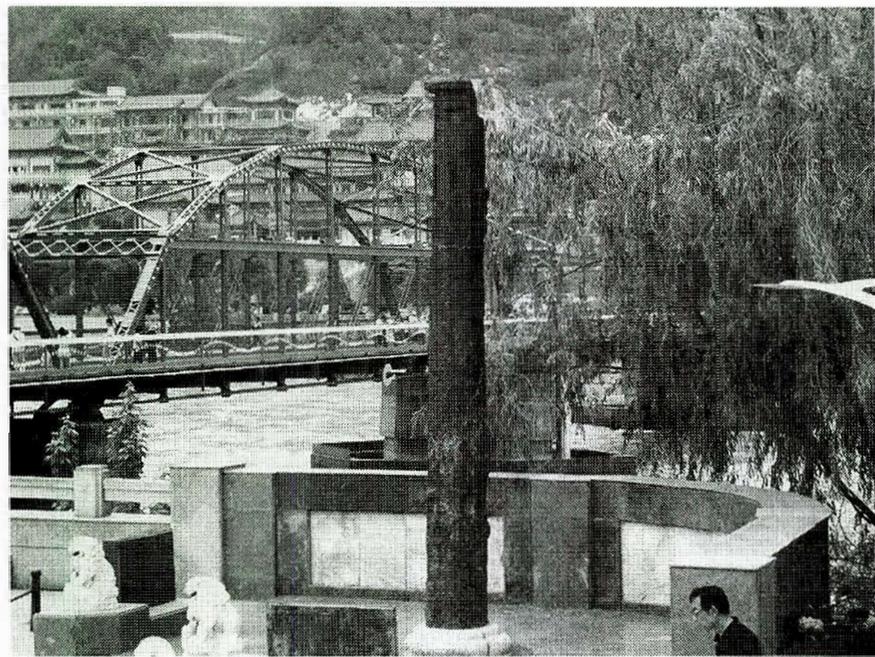
金文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种书体的名称。金文顾名思义是指金属上的文字，一般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

昔日中原的瓷器、造纸术、铸造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甘肃作为丝路的要冲，因此铸造业也极为发达，我们现在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铍、铲、锄、刀等，就可看到当时的铸造工艺极为精湛。另外还有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兰州五泉山上的泰和铁钟，都可反映出当时

的铸造工艺水平。而且在一些大型的铸器上，还铸有铭文，这些铭文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铸造背景，提供了一些史料。另外，这些铭文字迹清秀隽美，字体平易古朴，笔画方圆兼备、端庄典雅，具有书法的艺术之美。

黄河经青藏高原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流经兰州，因此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就多设有渡口。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50 年，西汉大将赵充国率领万余众骑兵，就是在今中山铁桥以西的金城渡口渡过黄河的。

明洪武五年（1372 年），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为追击逃亡的元朝残余势力王保保，要渡过黄河，于是在兰州城西 7 里处修建了一座浮桥；至明洪武九年（1376 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 10 里处，



将军柱



称“镇远桥”；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将浮桥移至城北的白塔山下，即今天黄河铁桥所在位置。

当时的兰州黄河浮桥用24只大船排列于黄河之上，船与船之间相距5米，中间用橧木相连，铺以木板，木板之上加有围栏。滚滚的黄河水将24只大船冲成月牙形，场景颇为壮观。曾有人赋诗描写这一景观，曰：“伫看三月桃花冰，冰泮河桥柳色青。”为了固定住浮桥，又在黄河南北两岸各立铁柱（将军柱）两根，并以木桩、铁索和大绳固定桥身，冬撤春设。同时“将军柱”还有测定水位的功能，为下游的防汛进行预报预警。

将军柱是何人所铸？如何铸造？又是如何立在黄河岸边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溯源而上，进行探究。

昔日，在河湟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谚：“胖哥川的模子，山城堡的炉子。”胖哥川又称半个川，即原皋兰县西半个川上古城（今永靖县刘家峡太极镇上古村）。在这一带居住的王姓人家，开设有炉院，从事冶铁铸造。据王氏家谱载：“我王氏家族，远在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家大村，以征调行艺铸冶来兰州，铸造金城关黄河两岸的将军柱……王宣、王训二公来兰之后，初居五泉山下禄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城。数年之后，才移到皋兰西半个川（又名胖哥川）上古城定居，以农为主，兼作铸冶，子孙繁衍，手艺发达，传至于今。”

对于具体铸造将军柱的情况，王氏族谱中记载：“我王宣、王训二始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铸造将军柱两支，又于洪武五年岁在壬

子（1372年）铸造一支，再于洪武九年岁丙辰（1376年）铸造一支，历时六年竣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四根将军柱并不是一起铸造出来的，而是历时六年铸造而成的，足可见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黄河发洪水，滔滔的黄河水从上游呼啸而来，将镇远桥北面的一根将军柱冲入了黄河中，经过民夫们的多日打捞，最终一无所获。是年，陕甘总督布彦泰召见了王宣、王训的后人王建文、王建武兄弟，令其再补铸一根。



刻有铭文的将军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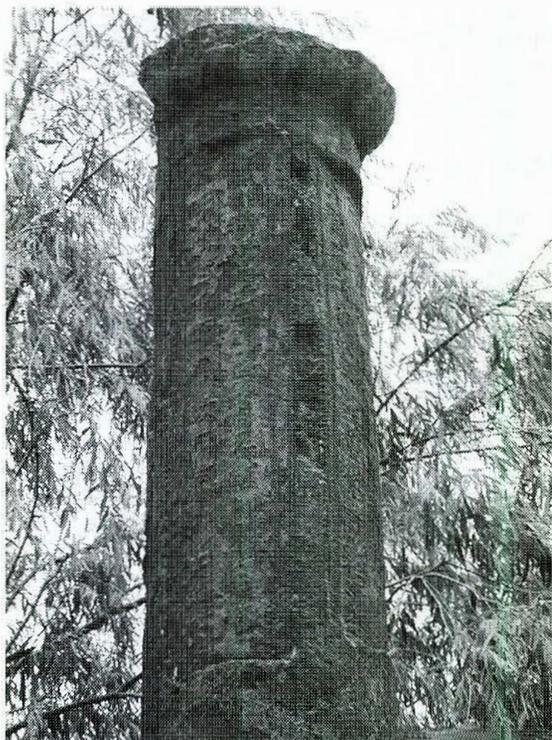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据说此次将军柱在开铸前，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时间。他们用牲畜从陇南驮来生铁，从阿干镇运来优质的炼铁煤块以及坩子土、砸块等，从皋兰运来铸造型砂。他们将黄河北的烧盐沟口西端作为铸造的场地，将大型的风箱、抱钳、提钳、坩埚集中在一起，然后开始砌筑炼炉，制造模型，最后冶炼、化铁，昼夜赶铸。

据说当时的冶铁炉有 36 座，每座炉熔 36 个坩埚，每个坩埚装铸铁 8 公斤。由于铁水要连续不断地浇注在砂型内，所以浇注时由王建国统一指挥，采取分段化铁，连续浇注的工序。就是说工匠们要依次用提钳



将军柱上，铭文斑驳



将坩埚中的铁水连续不断地注入砂型中，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否则将前功尽弃。

如今在黄河之北、白塔山下（王保保城附近）王氏后裔的住处，仍可见到有些院墙是用当时融化铁水的坩埚砌成。这些坩埚状如砂锅，但是比砂锅细、比砂锅长，像是粗壮的竹筒。它们用黄粘泥迭垒成墙，默默地矗立路边，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由于明代西北地区的生产力还很落后，铸冶工艺尚不发达，生产工具极为匮乏。当将军柱铸成后，明朝官府即以“免税行艺”的优惠条件，把王宣、王训等留在兰州。从此以后，子承父业，孙继子术，世代相传，他们的铸造工艺也日益精湛。据说，陕甘总督署衙门口的两个旗杆上直径一米有余的铁箍子即为王氏后裔所铸。当然他们还是以民用铁锅、犁、铧、钟、罄、碾槽、鏊子等的铸造为主。另外，黄河水车上的一些金属部件，如铁箍、铁钉、铁轴等铁器，也均由王氏后裔生产。他们可铸造小至几公斤大至数吨的法器，如佛像、狮子、宝鼎、香炉、钟罄等大型铸件，其工艺精湛，一些宝鼎上的文字运笔飞白，甚至人物的发丝皆清晰可见。

黄河岸边原有的四根将军柱，现在只剩一根，矗立在桥南东侧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根仅存的将军柱长 5.8 米，重达 10 吨，底部直径 0.61 米，底座长 1.2 米、宽 0.31 米、厚 0.3 米，其上还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这根将军柱无论是在铸造工艺上，还是铸造规模上，在当时的铸造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600 余年来，独留的这根将军柱矗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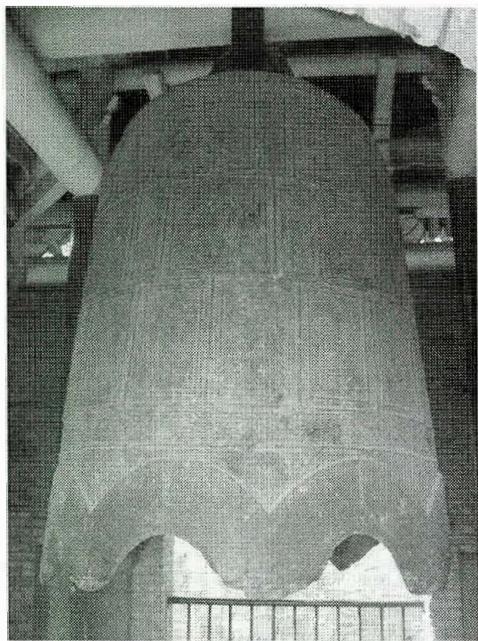
黄河边，经雨雪而沐风霜，注视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泰和钟上的铭文

钟，大约出现于商周时期，是我国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当佛教传入我国后，“钟”又成为佛教的“法器”之一，作为寺院集众之用，或召集僧人上殿、诵经做功课，另外诸如起床、睡觉、吃饭等无不以撞钟为号。寺院的大殿前一般多置有钟鼓楼，钟则悬挂于大殿前的左侧，每于晨昏击钟敲鼓，以警行者当勤精进，慎勿放逸，称为“晨钟暮鼓”。唐代临洮诗人李咸用《山中》诗有：“暮鼓晨钟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意思是，听不见寺院里的暮鼓晨钟，只看到天上悬挂的明月、飘浮的孤云。

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由东长廊西望，在高耸、陡峭的青云梯东隅有一个四角钟亭雄立山腰，亭曰“猛醒”。亭中悬挂一口铸造于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的铁钟，这就是著名的“泰和铁钟”。泰和为金章宗完颜璟年号，泰和二年相当于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二年，距今有815年。泰和钟高约2.8米，口呈八角莲瓣形，口径1.7米，周长5.3米，重达万斤。

钟体上布满铭文，铭文共分为三层，每一层铸有16个矩形方块，呈砌墙般参差错落排列。最上一层八个方块中有“皇帝万岁，臣佐千秋”八个大字，其余八个方块为佛号颂辞。第二层16个方块分为大小两种，铸有铭文150字，四字一句，内容为：



泰和钟

青山崇崇 白云溶溶 灵山深处 时现金龙
 龙音唯哀 悲愿先从 悲愿者何 三界大雄
 以悲愿故 音满太空 上摇玄府 下撼阴宫
 仙闻生喜 鬼闻停凶 击落地狱 救苦无穷
 创之者谁 海量珍公 铭之者谁 鹤发崆峒
 于千万年 永震西峰

落款为“维大金泰和二年岁次戌五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铸铁钟一
 顶重一万斤 郭嵩谨识”。

此外还有一些铭文：



金声玉振

城关碑
 刻墨迹撰萃



敦武校尉商酒都监文溪刘都迥 进义副尉商酒同监薛廷秀
宣武将军前第三队将裴满刺 武略将军临洮路第三队将刘琮宣
武将军前行巩州安西县主簿兼巡檢史于达信 武将军行巩州安
西县主簿兼巡檢骑都尉仆散好古信武将军行巩州安西令兼第三
副将完颜忠勇校尉千户高显普济院会首讲经论沙门海珍本院僧
海深讲经论海湛海秀怀城……

第三层 16 个方块则为兰州、定西等地布施男女的姓名。

泰和钟上的铭文字迹清晰，花纹图饰精美，从中可看到当时铸造工
艺水平之精湛；同时，这口铁钟对于研究金代社会习俗和历史也是不可
多得的珍贵文物。

从钟体的铭文“永震西峰”可以看出，这口钟也许是为兰州旧城以
西的华林山古峰寺而铸，后来可能因寺毁而被移至城中之普照寺。

怎奈 1939 年 2 月，日寇飞机轰炸兰州，建于唐代的普照寺因建筑
群庄严宏伟而成为敌机的众矢之的。敌机过后，千年古寺已是一片残垣
断壁，寺内方丈蓝象诚大师不幸遇难，唯有泰和铁钟安然无恙，得以保
全。1954 年，泰和钟又被搬到五泉山公园内的猛醒亭。猛醒亭翘角飞
檐，庄严耸立。泰和钟悬挂其内，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一睹金代铁
钟的风采。

泰和钟历经沧桑，尽管距今已 800 余年，若要敲击，声音依然浑厚
洪亮。清嘉庆年间兰州进士巫揆赋有咏《古刹晨钟》一诗：

梵宇沉沉绣古苔，钟声每向枕边来。

鲸鸣碧落千门晓，锁辟金蟾万户开。

可以想象，古时的兰州人也许就是在这悠扬洪亮的钟声中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古刹晨钟”也被誉为金城十景之一，堪比姑苏城外的寒山寺之钟声。

泰和钟为兰州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金石文物之一。1979年，兰州卷烟厂生产了“泰和钟”牌香烟，烟盒主色彩为橘红色，主标为圆角矩形框中绘有泰和钟，副标注有泰和钟铸造的年代。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枚烟标已越来越少，因此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泰和钟烟标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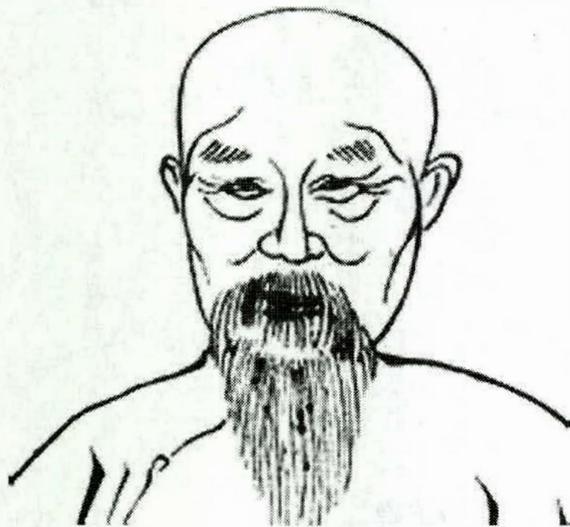
节园碑刻



景廉诗碑

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十四子肃庄王朱模由甘州移驻兰州，创建了肃王府。后历代不断修葺，到了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甘总督驻节旧王府，自南朝北修建有辕门、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内宅、后楼，后楼北部为后花园，最北为北城墙，组成大小十来个院落。院内花木扶疏，其中尤以初夏时节的牡丹最为有名。亭台楼阁参差错落，颇有南方园林之秀。登北楼远可见山峦连绵，近可瞰黄河滔滔，同时又有着北方园林之雄，故可谓雄秀融为一体。因陕甘总督驻节于此，故称节园。

清同治六年（1867年）夏季，节园内树木茂盛，枝叶婆娑，绿草夹径。在清凉幽静中，一位清代官吏双手反背，在陕甘总督林之望、甘肃按察使崇保、署兰州道蒋凝学等人的陪同下，在节园中踱步，这就是时任新疆哈密帮办大臣的景廉。



景廉像

景廉（1824年—1885年），字秋坪，颜札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进士，由编修迁至内阁学士。后来主考福建乡试，擢工部侍郎，赐奠朝鲜。咸丰八年（1858年），授伊犁参赞大臣。十一年（1861年），调叶

尔羌参赞大臣。据由李慈铭撰、翁同龢正书的《景廉神道碑》载当时的情况是：“叶尔羌者，南北八城之管辖也。汉回杂处，余孽潜伏。时西事萌芽，反侧蠢动。俄人眈眈。”景廉到后筹饷练兵，严禁绿营兵以重利侵夺回民资产，八城以安，人心大悦。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景廉旧疾复发，上奏朝廷乞休。《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同治朝卷》“同治三年五月壬寅”条记载：



谕内阁，奎栋奏“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于正月初四日起程，进口就医，顺道回旗”等语。览奏实堪诧异。前据常清奏，景廉因病咨请开缺，当经降旨赏假一个月调理，毋庸开缺；并据景廉自行陈请开缺，亦经批示赏假调理。景廉如果病势沈〔沉〕重，亦应再行具折陈请，静候谕旨遵行。乃于发折后迫不及待，径自交卸，起程进口，殊属轻率。

正因为景廉因病陈请开缺，但是并未等“谕旨遵行”，而是擅自离任到口里看病而因事获罪，被贬调离。当他离开时，当地数千人哭于札尔玛。札尔玛者，回部栖神之所，意欲祷神阻其行也。景廉遂被革职发往宁夏，到曾任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署陕甘总督的都兴阿的军营听差。为什么要发往宁夏军营听差？这是因为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翁同龢之兄、前安徽巡抚翁同书病卒于甘肃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景廉遂接管统率驻扎于花马池的直晋官兵两千名。至此，景廉又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另据《景廉神道碑》载：“（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授头等待卫，为哈密帮办大臣。时甘凉道阻。六年（1867年）冬，始募勇得千余人，骑不满百，持二十日粮，鼓陜西进。”也就是说，景廉此次来兰州是为招募兵勇，前往新疆。

景廉和林之望、崇保、蒋凝学等一行来到节园北城墙下，抬头可仰望到城上高耸入云的拂云楼。他们一行人循台阶缓缓登上北城墙，来到拂云楼下，看到拂云楼北面近堞处有两通诗碑，一为《三觐明藩致祝》，

一为《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州》（清初以来所称的“碧血碑”），景廉不禁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碧血碑》诗：

碧血碑

同治丁卯

明崇正末，流寇陷京师。其党西走陇右破兰垣，肃藩遇害，三妃同时殉节。迄今拂云楼下碑阴渍血犹新。

殉夫兼殉国，生气凛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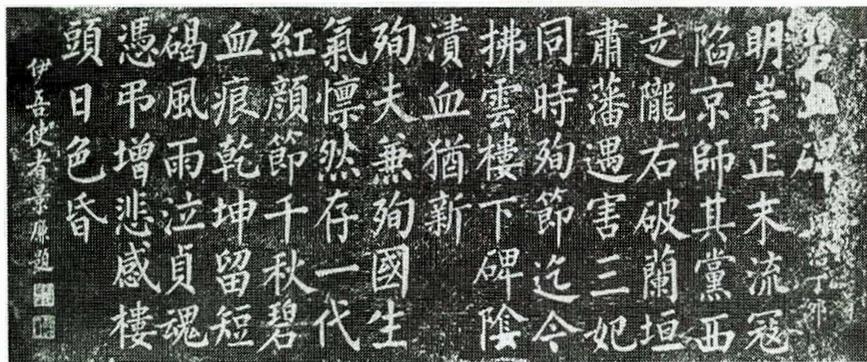
一代红颜节，千秋碧血痕。

乾坤留短碣，风雨泣贞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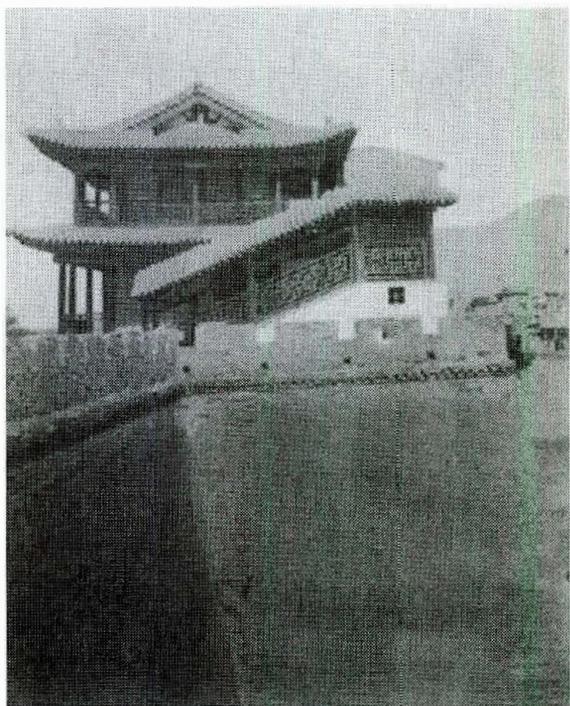
凭吊增悲感，楼头日色昏。

伊吾使者景廉题

碑文楷书共 14 行，满行 6 字。拓片高 24 厘米，宽 61 厘米。其诗中“崇祯”改为“崇正”，大概是为了避雍正皇帝名讳。碧血多指为正



景廉《碧血碑》



节园拂云楼

义事业而流的血，称肃王所写诗碑为碧血碑，是因为肃王妃颜氏、顾氏、赵氏等为免受辱，以首触此碑而死。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里写道：“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一位妇人的生活目标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社会活着。”因此颜妃、顾妃等的死，很大程度上张扬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而且被当时的理学磨砺得熠熠生辉。因此称“碧血碑”似乎还有丝丝弘扬与褒奖的成分含在其中。景廉题写的《碧血碑》诗后被勒石上碑，该碑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碑的拓片。

参观完碧血碑后，景廉又与林之望、崇保、蒋凝学登上了拂云楼顶

层。该楼建在明肃王府北城墙上，楼高二层，下临黄河，河距城仅二丈余，石基坚固。该楼始建年代失考，原称源远楼，因楼高出云表，云彩似轻拂而过，故名拂云楼。明清之际，此楼为历代肃王及其家眷、僚属、宾客登临赏景之处。登斯楼眺望，北有群山连绵，黄流绕其下；南有皋兰、五泉之秀；西有木塔、华林之雄，铁桥横亘河上，马车纷驶，翻水车轮远挂城边，真乃极天下之大观矣。

景廉登上拂云楼，已是暮色渐浓之时，看到眼前壮丽的景色后，又联想到他离开新疆时，天山南北正是燹火弥天之际，大规模的民变又加上浩罕汗国的阿古柏入侵，英国、俄国也在伺机觊觐着新疆，不免触景生情，满怀着惆怅和愤懑的心情，以前朝节义激励自己，写下了《登拂云楼》七律两首，以表达对烽火边疆的关注和茫然的心境。



景廉诗碑

草罢军书笔暂投，夕阳影里独登楼。
万家灯火凭阑见，四面云山入座浮。
羌笛吹残边塞曲，大河淘尽古今愁。
不堪回首寻前梦，惆怅临风搔白头。

遥天如盖草如霜，极目平沙古战场。
秦地山川馀戍垒，汉家笳鼓重秋防。
龙城此日思飞将，狼燧何年靖朔方。
两载戍行惭借箸，筹边无计倍彷徨。

同治丁卯五月拂云楼戏赋七律一首，□林秋坪景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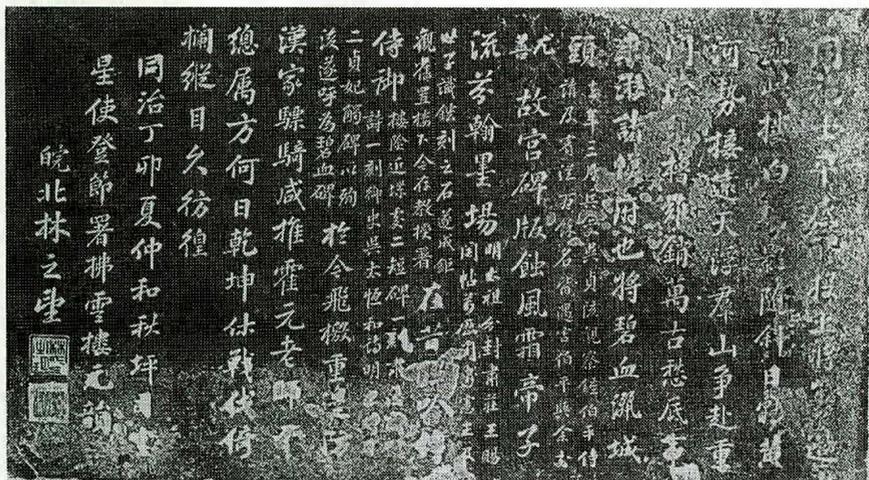
因李慈铭撰《景廉神道碑》称景廉“世为吉林钜族”，所以碑刻漫漶剥落的□处当为“吉”字。景廉在兰州时，朝廷谕词严切，迭次催促其迅速出关上任。然而手中无兵的景廉，却无法单独赴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景廉在兰州滞留期间，对前途是“不堪回首寻前梦，惆怅临风搔白头”。同时，景廉又以汉唐时期西北边塞的历史典故来砥砺自己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感慨昔日飞将军李广的勇武，“龙城此日思飞将，狼燧何年靖朔方”，但又苦于无法报效朝廷，“筹边无计倍彷徨”。

陪同景廉同游的林之望见其写下了这首诗，也步其韵写了两首七律，据《重修皋兰县志》载，林之望的和诗为：

同袍士卒感轲投，上将筹边憩此楼。

白塔影随斜日转，黄河势接连天浮。
 琐窗迴挹千峰秀，樵櫓难销万古愁。
 闻道贞魂留碧血，摩挲短碣过城头。

故宫碑版蚀风霜，帝子流芬翰墨场。
 在昔聊吟传侍御，于今飞檄重边防。
 汉家骠骑咸推霍，元老师干总属方。
 何日乾坤休战伐，倚栏纵目久彷徨。



林之望和景廉诗碑

但是据此诗的拓片可以看到，该诗的颈联和尾联却与《重修皋兰县志》中的林诗有所不同，拓片上的诗为：

同袍士卒感醪投，上将筹边憩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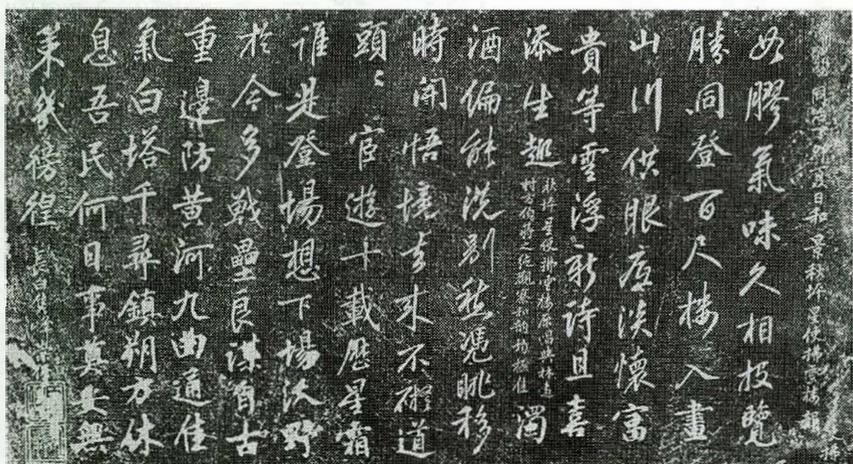
白塔影随斜日转，黄河势接连天浮。
群山争赴重门险，樵櫓难销万古愁。
□□□□□□□，也将碧血洒城头。

故宫碑版蚀风霜，帝子流芬翰墨场。
在昔聊吟传侍御，于今飞檄重边防。
汉家骠骑咸推霍，元老师干总属方。
何日乾坤休战伐，倚栏纵目久彷徨。

联想到自己与景廉境遇相似，同为满人、同为进士出身、同样的宦海沉浮，崇保也写了两首七律和诗——《同治丁卯夏日和景秋坪星使拂云楼韵》，表达出自己相同的心情：

如胶气味久相投，览胜同登百尺楼。
入画山川供眼底，淡怀富贵等云浮。
新诗且喜添生趣，浊酒偏能洗别愁。
凭眺移时开悟境，去来不碍道头头。

宦游十载历星霜，谁是登场想下场！
沃野于今多战垒，良谋自古重边防。
黄河九曲通佳气，白塔千寻镇朔方。
休息吾民何日事，奠安无策几彷徨。



崇保和景廉诗碑

崇保（1815年—1905年），字俊峰，号学莲，萨克达氏，满洲镶黄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补授西宁道员缺，署兰州道。三年（1864年）署甘肃按察使，八年（1869年）任甘肃布政使。诗中“宦游十载”说明崇保与景廉相识大约是在咸丰九年（1859年），景廉赴任伊犁参赞大臣，途经乌鲁木齐，崇保时任甘肃镇迪道道员，常迎来送往过往的官员。崇保与景廉因相似的经历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诗中第一句“如胶气味久相投”即说明了他们这种友谊。后来，崇保为左宗棠筹兵转饷，功绩显著，朝廷予以优叙。清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崇保由甘肃布政使调为山东布政使。

最后，景廉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冬，由兰州率捐募的兵勇回应新疆。路途上粮草极为匮乏，冰雪中不少人因寒冷被冻僵相继倒下。景廉秉持着忠义，夜晚支撑起单薄的帐篷，点燃马粪，席地而坐，而且还不时出去安抚、慰问兵勇，使大家能够安心团结。景廉统兵到肃州



时，叛贼沿南山西窜，他派遣总兵张玉春大败叛贼于黄花营。后来叛贼又骚扰安西，又被击败。到达新疆后，景廉运筹帷幄，坐镇古城，饮酒习射，若无事然，却不断收到各地的捷报。因景廉战功卓著，被擢升为乌鲁木齐都统。当时叛贼伪元帅马明屡次诈降，令其手下假扮成做贸易的生意人，分布于济木萨、木垒河。景廉侦察后得知这一情况，秘密派部下孔才、金永清等一夜之间将之全部消灭。后来俄国人挟制蒙古、哈萨克人入境要求通商，景廉告知地方未靖，不负责对对方的保护。从此以后，景廉在新疆时，俄国人再也不提通商之事了。

在新疆期间，景廉悉心边务，警惕俄人窥伺，筹饷练兵，“崇正学、开言路、慎牧令、简军实、重农桑、弭异端”，先剿灭肃州贼寇，再歼妥得璘、伪元帅马明东犯之万八千贼众，继而统众军大战白彦虎及帕夏数万众，连战连捷，攻取吐鲁番、巴里坤、玛纳斯，“三路齐举，使贼不相顾”，为其后左宗棠统领大军赴疆平叛奠定了根基。景廉宦游西域多年，在任期间，与士兵同甘共苦，为守土拒侵尽职尽责，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光绪二年（1876年），景廉奉诏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授工部尚书，再迁兵部尚书。

《重修敦煌县志》卷九《官司志·景廉》记载：“昔人论回疆勘定：左文襄竟其功，景大臣开其基。”其实景廉在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接替之前，为新疆平复起到的奠基作用，一直被朝廷与地方所铭记。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在“回疆克复，一律肃清”之后对官员的奖励中，专门对已经调离新疆事务的景廉给予了“交部从优议叙”的上谕。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癸丑，还下达了对其在新疆

功绩的追认：“追复前乌鲁木齐都统督办新疆军务大臣景廉原官，并准其在新疆捐建专祠，事迹宣付史馆。”

在景廉登上拂云楼赋诗 21 年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一位他的“粉丝”，在游览节园时看到了他的诗碑，也有感而发和诗一首，这就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光绪十年（1884 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任甘肃布政使，此时谭嗣同也由湖南浏阳故籍来兰随侍在父亲身边。谭嗣同的和诗为《和景秋坪节使督署拂云楼原韵》七律二首：

作赋豪情脱愤投，
不关王粲感登楼。
烟消大漠群山出，
河入长天落日浮。
白塔无俦飞鸟回（隔岸即白塔山），
苍梧有泪断碑愁（碧血碑在楼下，肃妃殉难于此）。
惊心梁苑风流尽（楼本肃藩后苑），
欲把兴亡数到头。

金城置郡几星霜，
汉代穷兵拓战场。
岂料一时雄武略，
遂令千载重边防。



西人转饷疲东国（甘肃军饷，岁四百八十万，皆仰给东南诸省。时总督为家云颯年伯，方请假归里，是以有取于谭大夫小东之义）。

南仲何年罢朔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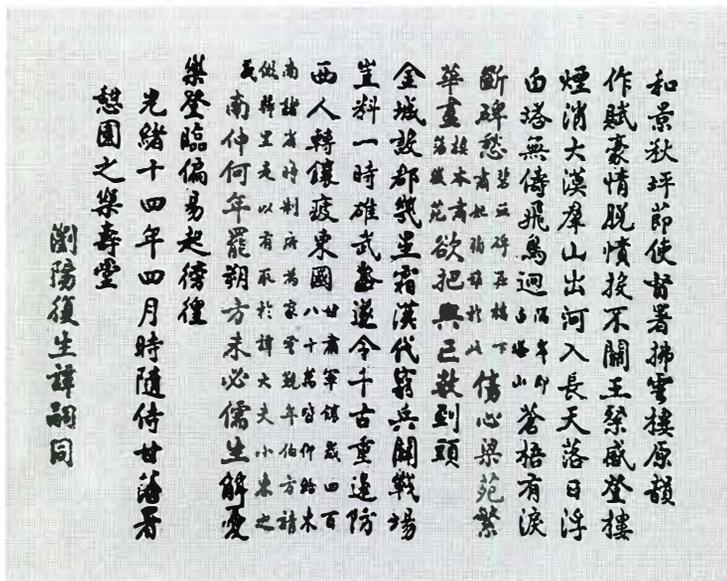
未必儒生解忧乐，

登临偏易起彷徨。

光绪十四年四月时随侍甘藩署憩园之乐寿堂

浏阳复生谭嗣同

谭嗣同这首诗中落款提到的“藩署憩园”即布政使司的后花园，原来称鸣鹤园，后又称若己有园，光绪初年，时任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对此



谭嗣同《和景秋坪节使督署佛云楼原韵》手迹

园苦心经营，又改名为“憩园”。谭嗣同在这首诗中，既有对当时拂云楼周边风光景色的描写，同时又借景抒情，指出自己和景秋坪诗，不是因为客居异乡的伤感，而是出于豪情，与东汉末的王粲郁郁不得志所做的《登楼赋》不同。他站在拂云楼上，看到远山已笼罩在暮色中，远处黄河水与天相接，一轮落日浮于水面。金城关就是兰州的咽喉所在，是兰州的一道天堑。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成了拓土征战的战场。因此他又转向了对百姓疾苦的忧虑，及因战事长途转运粮草而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质问这种穷兵黩武、滥事征讨到何时才能结束？他只是一介书生，所忧乐的未必关系国家利害，但每逢登高望远，总不免触发愁怀，感慨徘徊。这首诗后来也成为谭嗣同的代表诗作，如今这首诗的手稿就珍藏在湖南浏阳谭嗣同纪念馆里。

不怕鬼的林之望

清代同治年间许奉恩所著的《里乘》，是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后，又一部惩恶劝善、反映社会风俗、以神鬼精怪故事为内容的志怪小说。其中在卷四中有一篇《林远村方伯》这样写道：

吾皖林远村方伯之望，赋性端方，束躬严谨。自言开藩甘肃时，督师攻剿□□，驿馆后有楼，颇觉幽静，爰命僮从解装其上。夜漏三下，甫就寝，忽闻楼梯窸窣有声，一女子率帷遮入，走傍榻前，含睇微笑，妖艳异常，粉香扑鼻。方伯知为妖



物，将取床头宝剑击之。女子睨之笑曰：“公何为者，而忍恶作剧耶！”方伯虑其为祟，急掣剑在手，女子却步摇手曰：“咄咄，公勿恶作剧，我去！我去！”言讫，然不见。后闻人言，楼固有狐。然方伯居此月余，亦竟不敢再至矣。

读了这篇诡异惊悚的小说后，不由得对林远村的胆略和坦荡钦佩不已。

林远村（1811年—1884年），名之望，亦字伯颖，安徽省凤阳府怀远县人。因《里乘》的作者许奉恩也为安徽人，所以文开篇即有“吾皖”之说。

林远村出生于数代书香之家，其祖父晋奎公品学兼优、文章锦绣，以萃科官贵州司马，事迹见诸《皇朝经世文编·循吏传》。所谓“循吏”即清廉之吏，民间所称的青天大老爷。他的父亲名士佑，庠生，淡泊明志，隐逸不仕，著有《绵汾潇湘诗赋》等。

林远村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后宦海沉浮，先后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等职。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势卷西北。当时因烽火弥天，甘肃军政糜烂，又因粮道堵塞、府库空虚，各省援军延缓不至，多引起军中哗变。

林远村后署理陕甘总督，他作战勇敢，率领军士冒着锋刃矢雨冲杀在前。有一次，林之望被困于阶州野牛岭，加之军士因饷银未发滋生懈怠，罢战不发，此千钧一发之际，林远村奋而疾呼：“所欠众人薪饷一

应照发，不差分文，不足之处，当以我之俸银补给。但你们不能误国，误国大事，要依法处置。”众人闻听之后，深为感动，从而士气复振，执戈奋起，平服了军中哗变。林之望又将被困消息速报陕甘总督杨岳斌，请求支援。杨接报后马上召集总兵彭楚汉和杨明海，令杨明海速率两千骑兵前去营救。可是彭楚汉说：“如去营救，兰州城空虚无人，若是里应外合破了城池，后果不堪设想。”杨听后只好作罢。林远村在无援兵的情况下，首当其冲，往返驰突，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免遭全军覆没，挽回了这场危机。半个月后，林之望带着残部突围回到兰州，众官员出城迎接。林当众解开血迹斑斑的战袍，丢在杨岳斌面前，拂袖而去。随后他参奏杨“剿匪不力”，朝廷于是将杨降为二品留任。杨自知理亏，此后就处处对林有了防范。后来，杨岳斌驻守泾州时，从驿站截获一封林之望上报朝廷的奏折。师爷说：“何不拆开看看。”打开后，奏折无非是一些例行公事。杨捋髯而笑：“看来是多心了，怎么说林也是一员儒将。”

其实，林之望早已派人前往军机处，只等杨岳斌私拆截留奏折。事情败露后，慈禧震怒，又将杨降为三品顶戴留用。

林之望参奏别人，但他同样也受到别人的参奏。在林远村离兰之际，曾与他的继任者左宗棠产生了一些嫌隙，这也成为诱发林远村结束其仕途的一个小“菌种”。原来，左宗棠介绍一位道员前来补缺，当时林远村的胞侄林介藩任收发之类的幕宾，他暗示对方要交“门包”（贿赂），没想到这位道员也是个“硬头鱼”，心想“后台”左大人平乱有功，乃当朝“红人”，决定不吃他这一套。可是，林介藩就是不上呈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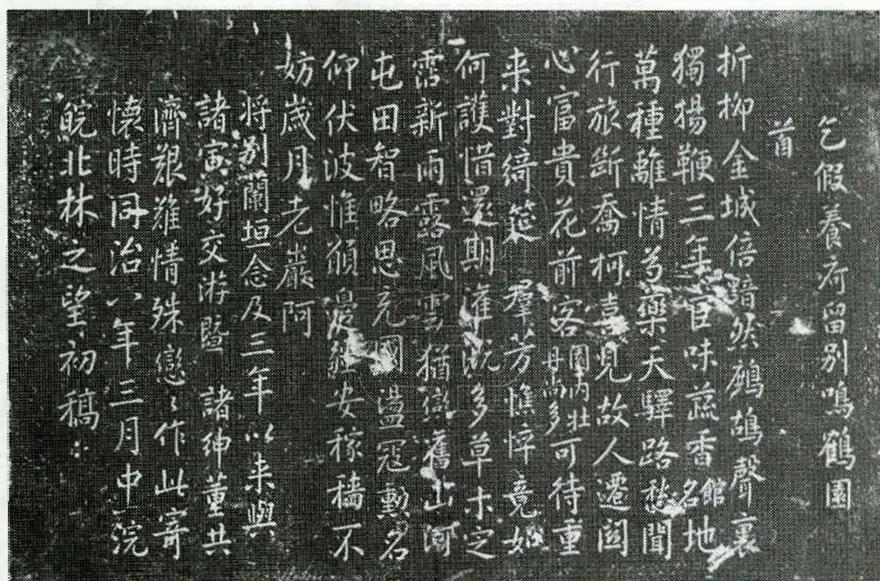
公文，最终没办法，这位道员还是妥协了，入乡随俗地交了“门包”。林远村生性耿直，始终不知其侄所做的龌龊之事。后来，这位道员将这件事回禀左公，左宗棠闻知后未免怏怏不悦、耿耿于怀。后来左宗棠到兰州赴任，初到者按常例应下榻“总督官署”，但左却寄寓道员衙门，可见二人已有嫌隙。就是林、左之间这段不愉快的小插曲，致使时不多久林远村奉命调京另用，从此结束了他十多年的军旅征战生涯。离任时，时值西北大旱，林远村将自己积蓄的俸银大部充当军饷和赈灾之用，人民感其德，拦道泣送，依依告别。

林远村也感念宦游兰州的生活以及诸多同僚，于是挥毫写下了《乞假养疴留别鸣鹤园二首》：

折柳金城倍黯然，鹧鸪声里独扬鞭。
三年宦味蔬香地，万种离情芍药天。
驿路愁闻行旅断，乔柯喜见故人迁。
关心富贵花前客，可待重来对绮筵。

群芳憔悴竟如何，护惜还期灌溉多。
草木定沾新雨露，风云犹恋旧山河。
屯田智略思充国，荡寇勋名仰伏波。
惟愿边疆安稼穡，不妨岁月老岩阿。

将别兰垣，念及三年以来与诸寅好交游暨诸绅董共济艰难，情殊恋恋，作此寄怀。时同治八年三月中浣，皖北林之望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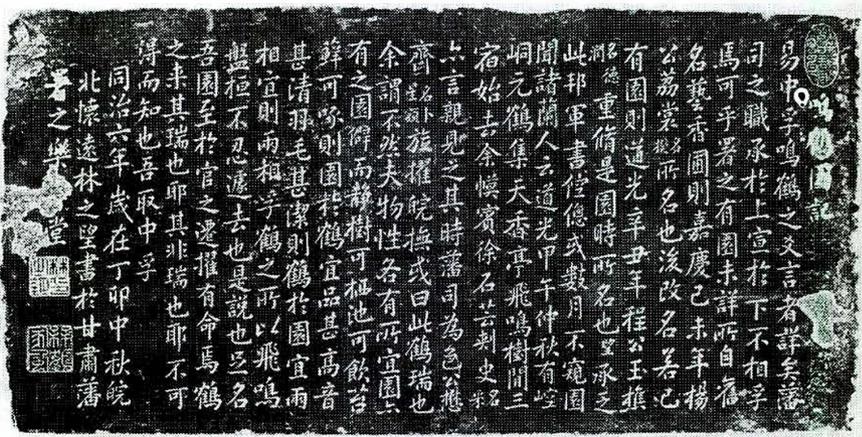


林之望《乞假養病留別鳴鶴園二首》詩碑

鳴鶴園即布政使署後園，在明朝時肅王稱為“望園”。清乾隆時因仙鶴棲息園內，鶴唳數日不去，改為“鳴鶴園”。道光時，甘肅布政使程德潤將其改為“若己有園”。清光緒時，陝甘總督楊昌浚改名為“憩園”。由於憩園與陝甘總督衙門的節園東西相望，故也稱西花園。也許林之望對鳴鶴園有著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曾作有一篇《鳴鶴園記》，內容如下：

鳴鶴園記

《易》中孚，鳴鶴之爻，言者詳矣。藩司之職承于上宣于下，不相孚焉可乎？署之有園未詳所自，舊名藝香圃，則嘉慶己未年楊公荔裳（名揆）所名也。後改名若己有園，則道光



林之望书《鸣鹤园记》

辛丑年程公玉樵（名德润）重修是园时所名也。望承乏此邦，军书倥偬，或数月不窥园。闻诸兰人云，道光甲午仲秋有崆峒元鹤集天香亭，飞鸣树间三宿始去，余幕宾徐石芸刺史（名采）亦言亲见之。其时藩司为色公懋斋（名卜星额），旋擢皖抚，或曰此鹤瑞也。余谓不然，夫物性各有所宜，园亦有之。园僻而静树可栖、池可饮、苔藓可啄，则园于鹤宜；品甚高，音甚清，羽毛甚洁，则鹤与园宜。两相宜则两相孚，鹤之所以飞鸣盘桓不忍遽去也，是说也足名吾园。至于官之迁擢有命焉，鹤之来其瑞也耶，其非瑞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吾取中孚。

同治六年岁在丁卯中秋皖北怀远林之望书于甘肃藩署之乐

□堂

《里乘》中所描述林远村遇“狐仙”的故事是否就发生在鸣鹤园则不得而知。

林远村到了京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鸿藻深知林远村的才能和人品，密保他为弘德殿行走，而林远村厌倦了官场的蝇营狗苟，以衰病辞谢，回归故里。

林远村退隐乡里后，纵情于山水，身心闲适，诗酒书画以自娱。他与邻里和睦相处，并不以曾经的“高官”而自居。闾里父老，对他也格外尊敬。他在故里筑有个人书斋“荆居书屋”，他的著述也因之命名为《荆居书屋诗集》《荆居书屋文集》。荆居书屋楼高两层，实为林远村的个人藏书楼。林氏自祖上晋奎公始，至父士佑，以及远村，三代都是嗜书如宝，不惜重金，广为罗致。而林远村一生清廉，为官数十年的所有俸禄唯购置这一财产。因此小楼上下，满是其宦游时购置的古今图书，其中不乏珍善名本、名人书画等。以至四个儿子分产时，为相互均分，争闹不休。除大儿媳孙氏深明大义，尚能按翁公遗嘱，每年夏秋晾晒，其他妯娌都不知先人遗泽之宝贵，任意丢弃、变卖、剪裁，加之水火灾害、兵燹战乱等，直至抗日战争怀远沦陷，更加彻底地荡尽林氏藏书。

林远村曾为故里涂山禹王庙大禹神坛两侧书有一副楹联：“清浊二仪还高下；万国衣冠拜冕旒。”据说该副对联为宏幅木刻，笔力遒劲，结体开阔雄健。人们惋惜其仅留下这一件遗墨，可是在“文革”中仍遭毁弃而荡然无存。殊不知，在其故里千里之外的兰州却还保留着他的《乞假养痾留别鸣鹤园二首》等墨迹碑刻，因此殊为珍贵。



万卷河山

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谱写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1935年1月，当红军战士踏上甘肃这片广袤的土地时，陇山陇水也就留下了红军战士的足迹。

在60年前，1957年，为了纪念这一震撼世界的军事壮举，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甘肃省的一批丹青高手用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国画，来纪念歌颂英勇的红军战士长征经过甘肃的情景。这些画家，带着激情、怀着敬意，用心点染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这就是《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第二年的“八一”建军节30周年，特向全国征集美术作品。当时的甘肃省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省文化局，省文化局又委托当时的甘肃书画界名流范振绪、郭维屏、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米瑛等创作绘制。

这副画卷全长三丈六尺，画面自甘肃省岷山腊子口至子午岭一段，以绵延壮阔的数百里自然景色为背景，赞美了祖国壮丽的河山，更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画卷的开端是白雪皑皑的岷山，毛主席的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这里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接着画面上出现了天险腊子口，随后毛主席栩栩如生形象也在画面上出现，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正浩浩荡荡穿越千山万水，挺进在行军途中。

高耸突兀的二郎山、松杉参天的洮河林区、田畴相望沟壑纵横的渭河河谷，以及华家岭、六盘山、泾河河谷、董志塬、子午岭等也依次出现在画面上。其中六盘山高耸入云，山巅的红旗迎风舒展，形象地表现出了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壮美意境。

在长卷的结尾部分，还有范振绪先生的行书题跋，记述了该长卷的创作过程和画面内容，可谓书画合璧，熠熠生辉：

去岁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派员来甘，为“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征画，予认绘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岷山腊子口至子午岭甘肃境内一段，去冬已将意图计划分别研究，并多方搜

南北朝的画论家谢赫对绘画提出的“六法”说，可以说是对我国绘画实践的一个系统总结。他提出的“气韵生动”可谓是将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之说进一步的完善与升华。现在我们将《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这一鸿幅巨制按照这一标尺来衡量、品评，不难看出其正是达到了“气韵生动”这一中国画的最高境界。

60年过去了，但这件事仿佛发生在昨天，鲜明依旧。这是因为红军战士万里长征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和画家们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娴熟的笔法，以及对艺术的追求，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这件事可以穿越时空，直驻我们的心底。可是毕竟时光如水，这些美术家均已过世，我们只能寻觅到一些当时的知情者以及他们的后代，以回忆那渐渐远去的岁月……

已故原甘肃省美协主席陈伯希曾谈道：

1955年冬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在1957年建军30周年大庆之际，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各大军区参加的美术展览。到了1956年初，黄胄同志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创作组工作，而且这次画展的举办地也就在军事博物馆。黄胄在信中请我拟几个创作选题一起报上去，并鼓励甘肃的画家要积极参加这次全军美展。

我当时决定用不同的美术表现形式，并且还要以反映军事题材以及甘肃、西北特色的美术作品为主题。最后我决定将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红军长征、解放战争中的宜川战役、兰



州战役用国画、油画、版画的形式来创作。后来我就给黄胄同志写了回信。不久我就接到了黄胄同志的来信，这大概是在1956年春节过后，被告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同意这几个选题，并让我们抓紧时间进行创作。

当时甘肃省还没有成立美协、画院等美术专业单位，师大有美术系，但只承担教学任务，没有创作任务。甘肃省文化局只有一个美术工作室，我当时担任主任，因此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因为解放战争中的宜川战役、兰州战役我都亲身经历了，所以《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我决定邀请范振绪先生领衔创作。范老先生是甘肃人，而且他又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同时省美术工作室又派米瑛、郭维屏同志也参加了这次创作。我当时同吕斯百先生等人投身到《瓦子街大捷》的油画与《解放兰州》的版画创作中去了。

其中范振绪为晚清进士，工书善画，在当时的甘肃文化界德高望重，当年他曾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同赴敦煌考察临摹壁画；郝进贤、马文江皆为范振绪先生的学生；吴绍镛曾任省立天水第五中学的图画教员；郭维屏解放前为兰州大学的教务长、教授，曾与何香凝、张大千等名家切磋过画艺；米瑛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曾创作过连环画《在康布尔草原上》，当时任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创作组组长。《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班子可谓阵容强大、人才济济。

《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的创作班子确定后，大家就深



入我省当年红军行进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并进行写生为创作积累素材。回兰后，大家又找来了各种有关刊登红军长征的报刊、书籍等资料进行学习，真正动笔则到了1957年4月份。当时邓宝珊省长腾出了自己的住地慈爱园中的会客厅让画家们进行创作，而且每天创作结束后，都要请大家到悦宾楼菜馆用餐。当时创作工作十分辛苦，大家一段段地画，一遍遍地修改。省上领导也很重视这次国画创作，省委秘书长陆为公、省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领导同志经常来到创作现场鼓励、慰问各位画家。到了6月份，《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完成后，在兰州举办了作品预展，省委书记张仲良、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等领导同志都来观看并表示祝贺，还宴请了参与创作的各位画家。《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送到北京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美术家》等报刊都发表了消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来看，这幅国画长卷的创作，在甘肃省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幅国画长卷开创了甘肃美术创作的三个第一：一是它的创作完成，标志着甘肃巨幅画作的出现；二是如此之多的画家参与集体创作也是我省前所未有的；三是首次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在美术作品上。现在参与当年创作的美术家都已去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如今回顾这幅国画长卷的创作历程，还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

亲自将此画作送至北京的原邓宝珊将军的随从副官、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王焕文说：“邓宝珊将军非常喜好中国传统书画艺术，1957年春天，邓先生得知要创作《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时难以找到一间合适的画室，因邓园内比较清静，他便热心地将自己花园内一间招待客人用的大厅腾出来供大家作画。在创作这幅国画长卷期间，邓先生政务工作有闲暇时便经常来花园中关心看望大家，偶尔还提出一些建议供各位画家参考。《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创作完成后，我随邓先生去北京开会时将这幅作品带上，到京后，是我亲自将作品送至前门外廊房头条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后来听说这幅集体创作的作品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还给范振绪等先生颁发了奖金。”

范振绪之女范恂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也充满了深情：“1957年创作这幅国画长卷的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因为这幅作品不是在我家中创作的，因此关于这幅作品的一些情况是后来听父亲说的。在几位参与创作的画家中，郝进贤、马文江先生是我父亲较为得意的学生，他们经常来我们家，因此我对他们的印象较深。父亲为了完成这幅国画长卷，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怀着对党的热爱和红军长征这一壮举的崇敬之情，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当这幅国画长卷完成之后，父亲很是激动与兴奋。”

这件巨幅画作的创作者，既有旧时代过来的老艺术家，又有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他们通过各自的人生阅历、气质修养，满怀着崇敬之情，加之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借助于丹青笔墨，将这种情这种意真实地反映在洁白的宣纸上。1957年7月31日的《甘肃日报》二、三版全幅刊登了《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这幅长卷共创作有正、副两卷，正本当时送总政参加了“八一”建军节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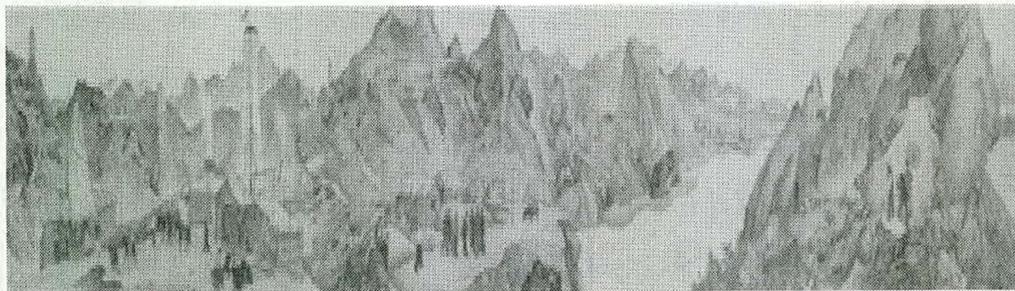
副本现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万卷云烟揽豪情

悠悠的丝路是带状的，滔滔的黄河是带状的，它们相交在了一点，从而诞生了一座城市，这就是兰州。兰州也是带状的，如果以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和反映兰州的城建，那首选的无疑是长卷了。

2016年年初，由中国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北京画院、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万卷河山”于1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合四馆之力，共展出了中国美术馆藏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李震坚与金浪合作的《兰州新风景》，关山月美术馆藏关山月的《山村跃进图》，北京画院所藏古一舟、惠孝同等多人合作的《首都之春》，以及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所藏林散之的《江浦春修图》共5幅长卷。这5幅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表现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名家长卷集中展示尚属首次，使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史诗般的万卷云山上得以再现。

“长卷”是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表现形式，我国历史上有



许多著名的“长卷”绘画作品，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长卷一方面表现在它具有丰富的容纳力，可以展现万千气象，表现内容更为完整，气势更为宏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在构图方面的优势，可以展现空间的多变与时间的流动，从而能更为全面地诠释一个主客观浑融的绘画境界。当然长卷也是艺术家创作功力的体现，当画卷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也置身其中，游历其间，心随物游，情由境生。

《兰州新风景》长卷是著名画家金浪与李震坚于1954年前往敦煌考察返回路过兰州时合作创作的。该长卷为纸本水墨设色，高39.7厘米，长646.5厘米，右下角款识为“金浪 李震坚合作 一九五四年六月兰州”，并钤有“金浪（朱） 李震坚（白）”印章，该长卷现珍藏于中国美术馆。《兰州新风景》画面采用对景写生与移步换景相结合的方式，以散点透视的开阔视野，描绘工地建设、资源勘探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典型图景，以西北特有的赭黄作为主色，烘托出画面中随处萌发的新绿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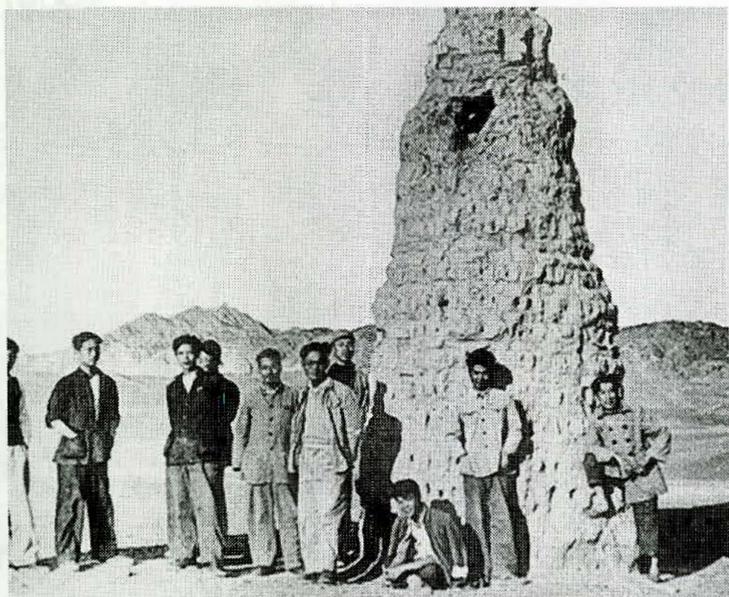


《兰州新风景》

《兰州新风景》作者之一金浪（1915年—1999年），原名朱维年，字风烈，浙江镇海人。其自小喜爱美术，可是因为家贫，主要靠自学。他1932年开始学中国画，后投师学工艺美术。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任教于晋冀鲁豫北方大学文艺学院、华北大学三部。1945年至1946年任《新星画报》总编辑，1949年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

李震坚（1922年—1992年），浙江缙云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就喜欢书画，并得名师指点。1947年，李震坚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在学校，他受业于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等大家，学习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后又跟从著名油画家、长期担任学院领导的莫朴学习素描、油画。

1954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联合组成敦煌



1954年，金浪、李震坚等在敦煌考察，学习古代绘画艺术时留影

艺术考察队。华东分院由金浪、邓白、史岩率领，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一行7人；中央美术学院由中国画系主任叶浅予率领，刘勃舒、詹建俊、汪志杰等一行4人。他们在古都西安会合，共11人一同前往敦煌，对敦煌莫高窟数百个洞窟进行考察、临摹，悉心领会传统绘画的精华，又选择优秀洞窟壁画细心临摹，并于当年11月将他们此行的成果编辑为《敦煌壁画临本选集》，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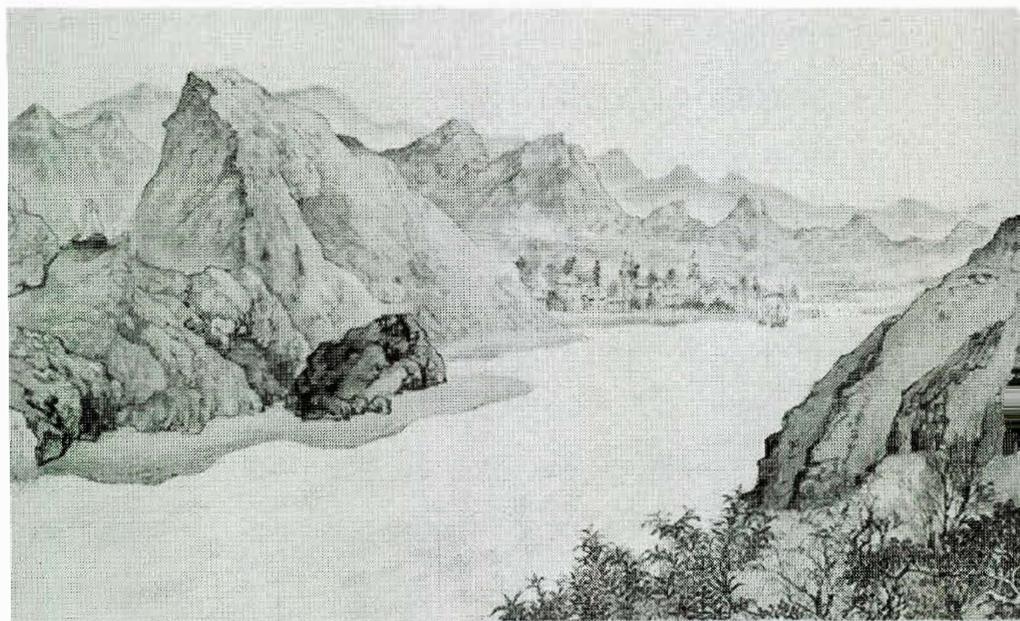


《敦煌壁画临本选集》

对于此次敦煌之行，李震坚曾在1983年《新美术》上发表的《传神与魅力——回顾历史艺术所引起的联想》中记述：“我们……沿途在兰州、威武、张掖、酒泉（河西走廊）一带随处耽搁一两天，顺便领略各地的风土神情。跋涉了半个月后，才到达敦煌莫高窟，那时已是盛暑蒸人季节，汗流浹背。在浩瀚无边的沙漠深处，见到了绿油油的钻天杨树，因风招展，带来清风阵阵，把旅途劳累的汗水都晾干了。这很像在黄宾老的《夏山深居图》前面，汗水会消失一样。晴空万里，天蓝得特别明澈深沉，与绿色的溪流相互映衬。当你听到莫高窟殿阁上高檐挂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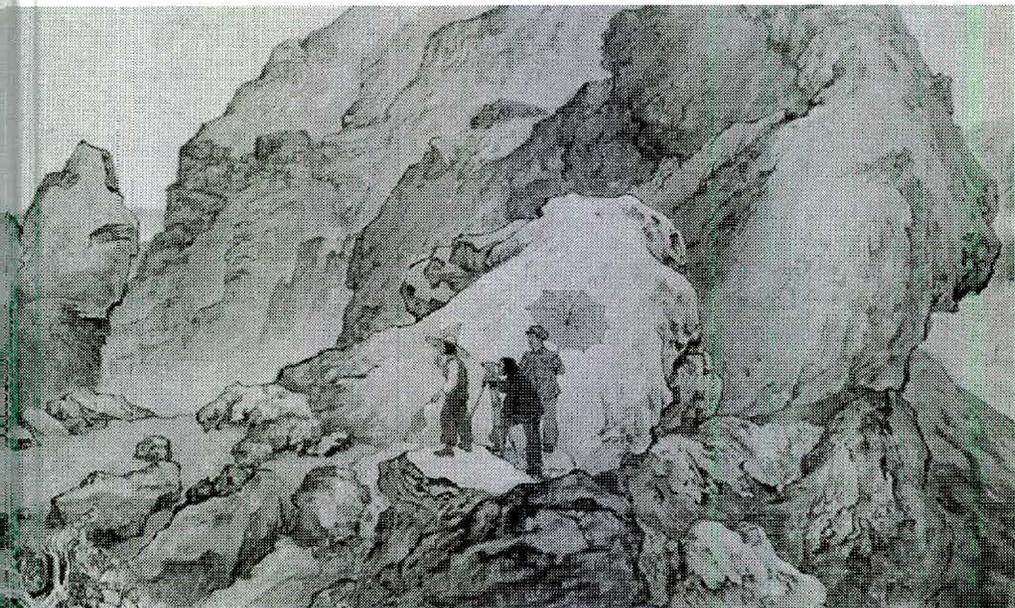
被风吹得叮咚作响，和看到一片高低不齐的、连绵不断的洞窟外景时，似乎它已预示着并吐露了如此珍贵壁画艺术的征兆，大家都有先睹为快的感觉。当你进入洞窟参观并经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负责人详细地介绍佛教艺术时，那种心潮起伏无法平静的状况，已被这历代优秀灿烂的壁画艺术所震慑了。”

画家能目睹辉煌灿烂的古代壁画艺术，那将在一生中留下永恒的记忆。叶浅予先生在回忆录《细述沧桑记流年》中也对此次敦煌之行做了记述：“四、五、六三个月在敦煌期间，白天临摹，晚上交谈，定期交换学术心得，最后结业，每人写了一篇总结。表面看来，大家对民族绘画的特点及古代画家表现生活的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从临摹过程中所反映



的学习态度稍加分析，便发现他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古人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壁画本身剥落斑斓和变色的现状；不是对壁画临摹，而是对壁画写生。在撤离敦煌中，他们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敦煌艺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回答。我只能带点神秘的口气说：‘将来你们自己会做出正确的回答。’”

从敦煌返回兰州后，金浪与李震坚合作创作了长卷《兰州新风景》。当时正值国家“一五”计划期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而一些艺术家也积极投身到这股热潮当中，他们深深感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情感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人民赋予他们的时代责



《兰州新风景》局部

任。因此他们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用画笔反映着人民的生活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金浪擅长传统的山水绘画技法，而李震坚专攻现代题材人物画的研究、创作与教学。李震坚在对中国现代人物画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学习、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继承中国画优良传统之余，又吸取了西洋画的长处，融会贯通，将素描的造型结构和适度的明暗关系融入传统水墨画中，通过用笔的变化把握形象特征，达到“应物象形”“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从而加强了传统水墨人物画的表现性，衔接了写实人物与传统水墨语言之间的隔膜与断层。另外，金浪和李震坚一行刚从敦煌莫高窟汲取到古代绘画艺术的精华，加之他们在美院从理论上学习、在教学中应用到一些西方绘画的原理和技巧，同时还有文人画、民间绘画等在内的传统中国画法，在多种力量碰撞、激荡、交融的情况下，他们创作出了该幅长卷。

《兰州新风景》在长达6米有余的画卷上，生动地记录了兰州黄河以北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甘新公路的情景。甘新公路早在抗战时期，为了接应苏联援华物资，国民政府将此作为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兴修。到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人民政府再次动员人民群众分段修整甘新公路。《兰州新风景》正是反映了兰州段的修建建设情况，画面上除了山河树木外，还有亭台楼阁，建设工地中奋战在各岗位的人物以及车辆、船筏和机械设备、牲畜等。因为绘画采用逼真细腻的创作手法，所以也是对当时修建过程的一个真实的记录。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者将黄河铁桥刚好处理在画面黄金分割的位



置。除黄河铁桥外，白塔山上的白塔、东风亭等都历历在目。

60余年过去了，但这幅长卷以它丰富的容纳力展现了万千气象，使人们感受到它所具有的磅礴气势，同时也看到艺术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笔法、墨法、色彩和造型创造性地表现形成的中国画的写实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而是在传统国画语言的基础上融入对生活的感受，以写生、默记为主的现实主义表达，营造出全新的图景，既波澜壮阔，又行云流水。

正因为应用了写实的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人们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而劳动人民与艺术家所共有、共同的激情又澎湃成了这一艺术珍品。

汇聚名家墨迹的《莫高窟访古图》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自20世纪初被发现后，一直是文人学者魂牵梦萦的地方。

张鸿汀先生系甘肃省著名的方志学家、金石学家，他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中己酉科拔贡，被分发于京城礼部任职。后又转任学部七品书记官，任普通教育司行走。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后，引起帝国主义的疯狂劫掠。后清政府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将劫余敦煌遗书运往北京，交学部图书馆妥善珍藏。当时的张鸿汀参与了接收与管理工。以后他在北京、天津、兰州又看到一些散落的经卷、图籍等，遂对敦煌心生向往，一直想亲临敦煌莫高窟考察观摩，但苦无机会。

1941年夏，张鸿汀终于与西北公路局局长宋希尚乘汽车由兰州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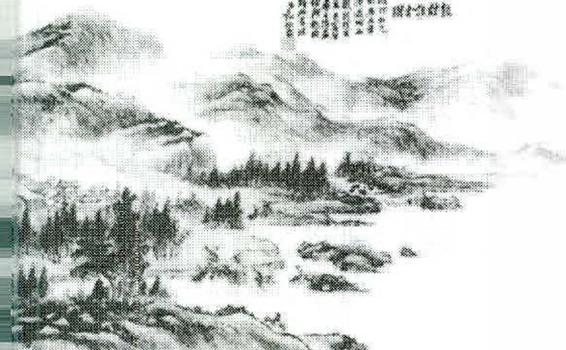
丛书

WENHUA CONGSHU

莫高窟訪古

圖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古稱千佛洞，位於敦煌市南，西距玉門關九十里，東距瓜州縣城六十里，北距嘉峪關四十五里，南距祁連山北麓。其始創於十六國西秦，後經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斷修葺，至唐代達於極盛，窟內有彩塑、壁畫、碑刻、石塔等，是研究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寶庫。

古窟訪古

心誠則靈

于右任

古窟訪古，心誠則靈。于右任

古窟訪古，心誠則靈。于右任

古窟訪古，心誠則靈。于右任

古窟訪古，心誠則靈。于右任

《莫高窟訪古圖》



《莫高窟访古图》局部

发，经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民乐、临泽、高台、金塔、鼎新、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各县，历时三月，遍览各地名胜古迹，考察民生与社会，著成《河西考古日记》一卷，详述考察经历，自谓此行对河西政治、地理、社会、风情印象殊深。

他路过武威时，正遇老友范振绪。范是著名画家，于是他与范畅谈了此行所见所闻，并请范作画以作纪念。范遵嘱绘就中堂《天山行旅雪景图》和一幅《秋色红叶图》，两图画工精细，堪为可传的精品。可是张鸿汀感到，两图虽精，但是立幅，不便题咏，于是又请绘《莫高窟访古图》横幅长卷。范振绪所绘莫高窟外景，青绿画面，景致错落有致，并有行旅数人。卷长 5.27 米，卷高 0.41 米，卷芯长 5.17 米，卷芯高 0.37 米。

1942 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由敦煌回兰，到张鸿汀府上拜访，张鸿汀遂请张大千在卷首题写了“莫高窟访古图”大字卷名。张大千又题诗两首：



其一

雁塔榆林一苇航，更传星火到敦煌。
平生低首阎丞相，刮眼庄严此道场。

其二

吴生习气未能除，识得龙眼此论无。
碧眼徙他夸重宝，神州随地有骊珠。

鸿汀先生教正，壬午初夏大千张爰题诗前后

并钤有“两到黄山绝顶人”“摩耶室”“张大千”等四枚印章。诗中“榆林”指榆林石窟，“阎丞相”是指唐代画家阎立本，其所绘《历代帝王卷》流入美国，故张大千有“碧眼徙他夸重宝”之叹。

高一涵先生是安徽六安人，他与陈独秀私谊颇深，胡适当年留美归国后，即由高向陈独秀介绍推荐给蔡元培校长，使之出任北大教授。1938年，高一涵到兰州任甘宁青监察史，张鸿汀时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因他任职机构也正是高巡阅检查部门，故二人公私交集颇多。如各种会议二人时有共同参加。每年夏季，二人奉命代表中央政府前往榆中兴隆山致祭成吉思汗灵寝。高一涵还曾为张鸿汀撰写的《兰州古今注》题二十绝附于后。当张鸿汀向高出示了《莫高窟访古图》，高在欣赏之后，特题跋《敦煌石室歌》一首：

阳关古道接天竺，西连佛国犹比屋。

沙门乐傅托鉢来，步入敦煌鸣沙麓。
榛莽蔽天无人室，独坐崖头看落日。
日光金光烛霄汉，幻作千佛森灿烂。
神僧到此悟禅机，缘以荒崖作彼岸。
鸠工凿石创一龕，开山大业烦圯墁。
物换时移几星霜，踵事增华竞辉煌。
前有刺史建平公，继起复有东阳王。
先后开凿千余洞，通以长廊间以墙。
一洞一龕一世界，千门万户疑蜂房。
苻秦经始犹椎轮，大辂之成自盛唐。
下逮宋元历千载，自檢以下无低昂。
画师一一逞意匠，妙到秋毫难穷状。
飞楼涌殿灿珠光，幡刹幢牙列仙仗。
梵呗咏歌如闻声，维摩说法花散帐。
一佛化作千万身，千万身上千万相。
就中圣手谁第一，右相宗派推至上。
洞中复壁尘封久，琳琅秘室富二酉。
西夏兵戈动地来，权作文物遁逃藪。
梨枣半属宋前鏊，经卷多出唐人手。
斯氏伯氏一顾空，毡芭席卷间关走。
后有好事者勤搜求，十存一二遗八九。
琅嬛富地一朝空，欧西书府栋为充。



石室遗书传万国，秘笈翻为天下公。
世界竞夸敦煌学，失马浑难罪塞翁。
我来又后四十年，烟熏壁坏损妍鲜。
篝火入室摩挲遍，粉墨剥落欢神全。
月仪墨迹西夏字，幸存灰烬见残编。
汤盘孔鼎器已渺，文辞述作尚连篇。
敦煌艺术卓千古，薪尽行当看火传。
张八画佛本天授，神妙直追吴道玄。
请君放出大手笔，尽收神采入毫颠。
嗟予十指无一枝，坐封至室空潸然。
夜深道院万籁寂，仰见秋月来娟娟。

敦煌石室歌奉题 鸿汀先生两正 六安高一涵

著名诗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维汉题诗两首：

其一

古窟曾闻屐齿经，吾宗渊雅有鸿汀。
携来一幅范宽卷，山与佛头照眼青。

其二

我亦敦煌访古回，萧萧斑马又相催。
倚装难为有声画，补作长篇俟再来。

壬午初秋奉题 即乞鸿汀先生吟正苑丞弟维翰

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诗人丁宜中题诗两首：

其一

竟数家珍问帝几，敦煌石窟向斜晖。

许多神物已西去，莫道丹青破壁飞。

其二

张侯访古入琅嬛，范叔抽毫出玉关。

空向卷中识轮廓，蜚余五载皋兰山。

鸿汀先生出禹勤先生绘赠敦煌访古图题漫书二绝以应

三十一年七月于兰州西园山房 贵阳丁宜中

著名诗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曹经沅，字纒衡，号宝融，四川绵竹人氏。他与张鸿汀同为清宣统己酉年（1909年）拔贡，同在京城学部任职，且同住一宿舍，又同岁，朝夕叙谈成为挚友。当时二人都爱好诗词，相与唱和，互相酌字。辛亥革命后，张鸿汀任国会众议员，曹经沅任内务部佥事，诗文往还又六七年。后来，张鸿汀回到甘肃，曹经沅则辗转任职立法院立法委员。1945年，张鸿汀赴渝公干，得以与曹经沅相会于重庆。张鸿汀出示了携至重庆的范振绪所绘的《莫高窟访古图》，曹经沅观后题诗四首，他们约定抗战胜利后，将北去兰州，同往河西，游览塞上风光。兹录曹经沅题诗如下：



其一

片羽零缣脱腕收，敬仰稽古两无俦。
及身已成千秋业，奚美车前拥入驹。

其二

时荒醉汉亦称祥，何荒醉汉亦佛场。
说与邦人应护惜，勿忘石窟与云岗。

其三

秘籍俄惊夜壑舟，洞天画壁至今留。
逆攀赖有扶轮手，许我披图当卧游。

其四

三十年中三度别，相逢谭未焕朱颜。
与君更订西行约，踏遍祁连万叠山。

鸿汀道兄同年重晤渝州，行将别去辄杂书所感题此图，并
订石窟同游之约，即希正句，乙酉四月经沅。

可是抗战胜利后，曹东还南京，没多久，竟因脑溢血病逝。张鸿汀闻知噩耗后，曾致电其家属，列名治丧，并函请曹在宁的生前好友，嘱将曹之遗诗早日整理出版。

著名书法家、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于1941年10月到敦煌视察。当时正值抗战的硝烟弥漫华夏大地，华北及中原大地相继沦陷，西北一隅尤显重要。于右任作为国民政府的要员，由陪都重庆西来敦煌，无论对于西北人文地理的考察，还是为全民族的抗战鼓舞士气，



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0月5日是中秋节，于右任在莫高窟前，与在此临摹壁画的张大千把酒赏月。席间，于右任作《敦煌纪事诗》八首，其中第三首为：“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龕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于右任在结束敦煌之行后，回到兰州，受到张鸿汀和慕少堂等人的欢迎，还应邀讲述了此次敦煌之行和张掖黑水国遗迹的考古收获，同时提出了筹建“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后来，常书鸿去敦煌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与于右任的倡议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对于敦煌的保护与研究，离不开于右任先生的奔走呼号，他对今天“敦煌学”研究可谓功不可没。当张鸿汀向他出示《莫高窟访古图》时，因他刚从敦煌回来，所以倍感亲切，欣然挥毫，题《黄钟人月圆曲》词一首：

功名万里天山路，白首到敦煌，徘徊不去，沙场绣壤，绣壤沙场。

伤心难话，莫高石窟，文物兴亡，阳关夕照，鸣沙夜月，也觉凄凉。

鸿汀先生嘱题莫高窟访古图及述所感以应于右任

于右任的这首词不知何因，并未收入《于右任诗词集》。

顾颉刚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来兰州。1937年8月21日，顾颉刚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实地考察西北的教育事业。9月29日，顾颉刚抵达兰州，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兰州。当时顾颉刚住在贤后街45

号，他还应甘肃教育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朱铭心之聘，准备第二年在该院开讲中国古代文化史。他在《皋兰读书记》中记载，他还准备开讲《左传》。有一次，有人晚饭后去拜访他，见他在灯下备课苦校《左传》。“点读皮鹿门《五经通论》，钞《左传》以试编《国语原本》，备讲学之用。”

著名学者顾颉刚题诗两诗：

其一

想慕敦煌四十年，劳劳人事几迁延。
者回到得皋兰下，又赋高山仰止篇。

其二

张侯访古写为图，石室洞窟记步趋。
陇右已成金石录，还将画壁入书无。

鸿汀先生教正 顾颉刚拜题

从顾颉刚的题诗可以看出，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亲往敦煌，因此诗中充满了怅然和向往。

著名学者、书法家，时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冯国瑞题长诗一首：

鸿汀朴学今张奂，力振坠绪棕宗风。
华夷竞趋敦煌学，流传玃羽海西东。
汲冢孔壁同鼎重，奋笔宁待车书同。

抚古拾零饶新意，知事辑逸欢会通。
我亦束笋如珍帚，商略微愿曾语公。
胜游惜未化仗履，伽蓝帷识画图中。
陇蜀张范有绝谐，同骋彩笔追化工。
列洞蜂巢蹊径异，此卷心折范迂翁。
何时精校寿梨枣，挂网珊瑚理残丛。

奉题鸿汀先生敦煌考古图，壬午仲夏仲翔冯国瑞

清末进士、诗人、文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的王烜题诗三首：

其一

文字因缘二十年，知新温故让君先。
壮游大有西来意，佛地庄严粉本传。

其二

萍踪未到玉关头，鹜岭当前作卧游。
只恨故人常寂寞，黄沙漠漠水悠悠。

其三

福缘匪易有前因，石窟依然万古春。
文物衣冠今尚在，画中仿佛骑驴人。

题故友张鸿汀先生《敦煌石室访古图》王烜



著名文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文史馆馆员兼秘书的韩定山题诗六首：

其一

披图重见旧丰神，犹是旁搜远绍身。
不用典型思北海，虎头妙技也传真。

其二

成佛莫教灵运先，风因遥想西花天。
多生曾遇无遮会，卓笠跨驴未偶然。

其三

迤邐阳关古道途，陂陀绵渺夹平芜。
未知踏遍鸣沙窟，得以鹤莱盛会无。

其四

神物深沉理太玄，几人宝气变遥天。
君家故有博物志，无奈胡僧早着鞭。

其五

媚古寻幽百虑竭，广收金石理遗篇。
名山盛业光芒在，撼树蚍蜉亦枉然。

其六

鸣沙久已胜云岗，新出炳灵又擅扬。
时代崇文堪告慰，不须闻笛怆山阳。

文县韩定山敬题鸿汀前辈莫高窟访古图

1950年，范振绪又索观此画，并题诗一首：

张侯西访后，沙磧一扬鞭。
驻足天山近，行径石窟遥。
嘱予写粉本，留此记征貂。
遗物应无恙，离魂不可招。
屋梁悲落月，枫叶带霜凋。
飞鸟归何处，渥洼化晚潮。

此仁兄于庚辰仲秋，漫游河西，观敦煌莫高窟壁画古迹，益增兴趣，早嘱制图，绘此以赠，迄今九年矣，而鸿汀已归道山，其少君令瑄巧识数语。呜呼，人亡物在，思之恍然。弟范振绪题，时年七十有八。

如今斯人已俱去，唯留此图珍存于省图书馆，历久而弥新，留下一代学人对于敦煌的向往与保护之情。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名匾寻踪



握桥上的匾额及其所附的文化元素

兰州地处黄土梁峁和盆地、河谷阶地三种地型之上，黄河穿城而过，发源于南北两山中的沟汊多汇入黄河，故兰州多桥。兰州除了著名的“天下黄河第一桥”——黄河铁桥外，最为有名的就莫过于“握桥”了。

兰州握桥坐落于金天观（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以东的雷坛河上。握桥采用巨木由两岸向河心错落前伸，层层递出增高，节节相衔，呈穹隆凸起的弓形。桥面上覆盖有拱廊，起到重压稳固桥面的作用，同时桥面亦可避风雨。在桥的东西两端各建有翼亭，恰似两拳紧握，故

称“握桥”。远观整座桥呈弧形，且涂以红色，犹如一道彩虹横跨于雷坛河上，故又称“虹桥”。茅以升称兰州握桥是“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

如今被称为渭水第一桥的渭远灞陵桥，其桥身造型与握桥如出一辙，其桥廊周身挂满了名人大家题写的匾额，有人称其为“桥以匾闻名，匾因桥显赫”。也许正因为这些名家题写的匾额，灞陵桥于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握桥的建造历史要远远早于灞陵桥，因此它原来也悬挂有一些匾额。

兰州握桥东西两端各建有翼亭一座，翘角飞檐，雕梁画栋，桥的东翼亭有题匾“空中鳌背”“彩虹”，西翼亭题匾为“天上慈航”“新月”。这几块匾额虽仅有两字或是四字，但对仗极为工整。非常惋惜的是这几幅匾额都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中。另外，匾额为何人所写，由于并无记载，所以这也成为兰州文化界的一个未解之谜。

握桥建成后，可以说是当时兰州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犹如一道彩虹，横亘在雷坛河上。它西邻华林山，山下有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九间楼。登临握桥，北望可见黄河白马浪滔滔东去，险关要隘——金城关傍河依山而建。近观可见北园梨花白茫茫一片，风儿一吹，馨香一片，大有“香雪海”之势。因此握桥在旧时也就成了“文人墨客”汇聚之地。

入冬后，由于雷坛河上游海拔较高，气候寒冷，河水结冰，而且随着缓缓的水流冰层不断加厚。到了春季，冰雪消融，阿干河就挟冰携水顺流而下，当水流穿越握桥时，水雾氤氲，握桥缥缈在似



烟似雾之中，仿佛仙境一般。这就是旧“兰州八景”之一——“虹桥春涨”。当时人们称雷坛河为浩门河，因此这一景观又叫“浩门春涨”。古人就此景曾有诗曰：“春桥春渡观春花，春水春山春景佳。河涨春桥桥春涨，流沙过客客流沙。”握桥可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桥。

新中国成立前，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来到兰州，在参观了握桥之后，还将握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雁归来》：

出门约有半里，走到了一道干河，这河床上虽是干的〔得〕一滴水也没有，但是河的形式，却是显然。在河的两岸，高高拱起，架了一座上面有盖顶、两面有拦〔栏〕杆的木桥。这桥的样子，活象〔像〕小孩用牙牌作〔做〕游戏，搭的空心桥一样。桥身与河床绝对不相联结，乃是两岸各伸出一截桥身；在这截桥身上，又堆叠向河心里伸出去。这样的层层堆叠，层层向外伸，两岸伸出去的桥身，在河中心凌空相就。燕秋指着说道：“这桥的工程，我觉得很巧妙。”

由于握桥造型奇特，所以 20 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丹青高手临摹描绘的对象。

吕斯百先生曾于 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法国，专攻油画。回国后，他与徐悲鸿先生一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系主任。1950 年，他来到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创办了美术系。1952 年，他利用工作之余，



吕斯百所绘《握桥》油画作品

来到雷坛河边，描绘了这座古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握桥。画布采用麻布，画面构图充实厚重，色彩明快、朴实，蓝天衬托下的握桥格外生动。此幅珍贵的图画现珍藏于中国美术馆。

甘肃省著名画家郝进贤也曾创作了一幅以握桥为主题的国画——《虹桥春涨》，画面上雷坛河水从上游奔腾而下，氤氲如烟，北园一带则是白茫茫的梨花一片。观赏此画，仿佛如临仙境一般。如今，画面上的山、水、花、桥已不知所踪，唯根据雷坛河河道以识当时旧迹。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兰州华陇烟草公司还生产了一种“握桥牌”香烟，烟标以握桥为主图案，呈绿色，再现了当年的握桥。虽然这枚烟标已残破，但能通过这枚烟标目睹握桥的风采已实属不易了。





握桥烟标

庄严寺匾额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兰州时曾作诗一首：

访僧入孤寺，一径苍苔深。
寒磬秋花落，承尘破纸吟。
潭光澄夕照，松翠下庭荫。
不尽古时意，萧萧雅满林。

这首题为《兰州庄严寺》的诗正是描写了兰州市张掖路原兰州晚报社旧址的庄严寺。相传庄严寺为隋末金城校尉薛举故宅。隋大业十三年(617年)，薛举在兰州称帝后，即改建为其皇宫。

后来，经过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大战，秦王李世民率军平定了薛举及其子薛仁果。唐朝建立后，由于薛举的皇宫原建筑群规模宏大，于是李世民命改其为佛寺，佛寺有山门、朝房、过殿、大殿、后殿，并建有东西配殿、厢房、钟鼓楼及跨院，构成完整的三院落及官园等四组建筑。据文献记载，后元、明、清各代多次进行修缮。到了民国年间，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代行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的刘郁芬，自1925年10月推行新政：提倡妇女放足，整洁环境卫生，修整兰州道路，改兰州庄严寺为民众教育馆。

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其创作的小说《燕归来》一书中对庄严寺也有描述：

约摸〔莫〕有一里路上下，就到了图书馆（张记忆有误，实为民教馆）。进得门去，那佛寺的原来情形，还十有八成是保留着。第一进大殿，横了长桌长凳，墙上的壁画和柱子上的标语，形成了两个极端。……燕秋指着屋脊下面横梁上的一块大横匾道：“你看，这是这里一绝，这是颜真卿的真笔字，现在还好好儿一点也没损坏。”……健生随着她踏阶后进，两廊的佛像，却都让许多陈列的古物和学校里成绩品，遮掩了不少。燕秋道：“你看这些佛像神气都塑得很好！有人说：正殿三尊大佛像，恐怕是后代改造的。唯有这两廊配殿，四五尺高的小佛像，那倒是真正的唐塑。”……燕秋道：“我们看了两绝了，再去看画绝吧。”……健生也不说话，只依了她手指的所在看去，



原来是佛殿背后照墙上，画了一尊站的观音像。那像画得面清目秀，骨肉停匀，虽是有许多地方已经把颜色剥落了；可是在衣服上披的那一幅白纱，每一个极细的纱眼，还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纱眼里，就透出里面的衣服来；那纱还是被风吹动着，飘飘然，要起要落。……燕秋道：“这是吴道子画的。”

从张恨水先生这段对庄严寺的描写来看，1934年的庄严寺还基本上保持着佛寺的原貌。庄严寺素以塑、书、画“三绝”著称，“塑绝”指正殿大佛塑像体态匀称生动，衣褶细致逼真，有迎风飘举之状；“画绝”指正殿后壁观音壁画，仪态端庄优美，身披白衣，宛然如纱，上覆宝髻，下垂至足，净瓶柳枝，翠色如新；“写绝”是指原山门匾额“敕大庄严禅院”六字，但并非小说《燕归来》中主人公燕秋所说的“是颜真卿的真笔字”，其实这一匾额为元代著名书法家李溥光所书。

李溥光为元代高僧，大同人，幼年出家为僧，字玄晖，又字元晖，号雪庵和尚。他喜读书，经传子史无不淹贯，并善诗、工书，笔法遒劲。在元代至元、大德年间以擘窠大字名世。一时宫殿匾额，皆出其手，与赵孟頫声名一时竞相埒天下。相传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赵孟頫发现了李溥光，并引荐给朝廷为官。明代李东阳《怀麓堂集》中记载：

尝闻赵松雪过酒肆，见其“帘”字，注视久之，谓：“当世书无我逮者，而此书乃过我！”问知为一僧书，则雪庵李溥光也。因荐之朝，累官昭文馆大学士。



李溥光书“敕大庄严禅院”

因元太祖崇尚佛教，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时，据统计，全国有寺院两万四千余所，一时梵音袅袅、磬声悠悠。其中一些寺院的匾额多出李溥光之手。现通过由其所书的碑志及时人诗文所记，知李氏在人翰苑之前，他的足迹已遍涉陕甘、江浙、福建等地。李溥光为庄严寺所书匾额有可能即为他云游来陇后，光临金城名刹庄严寺时所留。李溥光所书“敕大庄严禅院”为六字竖匾，匾额高约1.5米，宽约1米，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匾额四周镶木雕纹饰额边，字体雄浑遒劲，醒目庄重，酷似颜真卿真迹。原匾额旁有兰州书家金翼乾书写之考证木牌一块，上书：

考此敕大庄严禅院六字为元代李溥光所书，字体遒劲，直逼鲁公，邑乘称其写绝，洵非虚也。特悬之以供艺术家欣赏。



据甘肃省文史馆原馆员、已故文史学家张令瑄所说，20世纪60年代该匾额尚存，后来不知何故被卸下，放置于庄严寺一隅，后被周围住户劈砍当柴，用于生火、做饭，使这一名匾毁于一旦。

李溥光所作皆为颜柳为宗的擘窠大字，他在其所著的《草庵字要》中提出，大字要“如王者之尊，冠冕俨然，有威严端厚之福相”。所以其题匾大字恪守法度、齐整紧密、逸兴酣畅，字字撑满界格，而不能任意挥洒，恃才随性，必须要表现出端庄、威严的庙堂气象。故其笔画极为肥密粗壮，如苏东坡所说的“骨撑肉，肉没骨”。这样的书法创作也利于远观，同时也与巍峨高大的建筑环境相协调。

可是正因为李溥光所作大字多为匾额，悬挂于殿宇楼阁之上，所以不易保存。有人称其传世书迹几乎百不存一，其书名也随时代推移而渐为后人淡忘。

在山西省浑源县的永安寺，寺中大殿上也悬有一块匾额，同为竖匾，上书六字“传法正宗之殿”。相传亦为李溥光所书。原匾已毁，该匾是后来仿制的，从该匾上的文字可知永安寺的创建维修信息。该匾从右至左依次有五行小字为：

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掌诸路头陀教持赐圆通玄悟大师雪
庵溥光书传法住持嗣祖沙门月溪觉亮立；

昔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岁次癸卯五月吉旦山西行都司大同后
卫指挥使郭江重修；

昔大明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仲春钦后守备浑源城以都指挥
体统行事指挥使云中郭江子郭翰动孙郭恒禄重立；

昔大元国延祐二年四月日大功德主永安居士孙将仕郎前本
州判官高璞建；

昔大清乾隆二十六年重创并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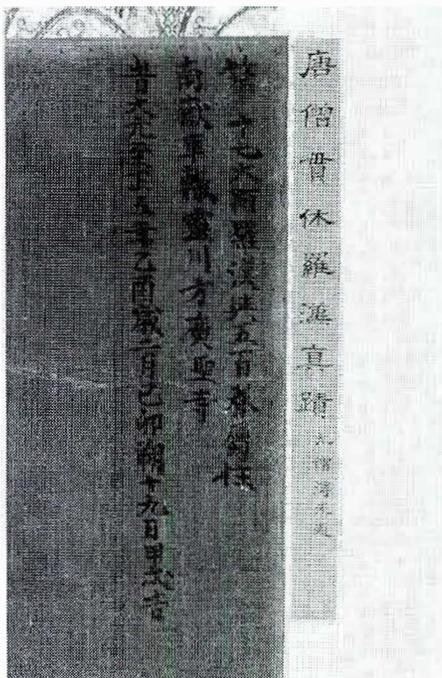
相传李溥光书山西省浑源
县永安寺大殿匾额

此外，在2014年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举办的“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苏州过云楼旧藏、李溥光书于“至元丙戌”（1286年）的《书韩昌黎〈山石诗〉》大字行书纸本长卷，拍出了3507.5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国内古代僧人书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这一拍，也将李溥光这一700余年前的书法家横空推到了人们面前。

五代前蜀僧人画家贯休，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省兰溪）人。他擅画释道人物，所画罗汉像，画法坚重，晕染得体。其笔下的罗汉，形骨古野，深目大鼻，浓眉巨眼，胡貌梵相，手法夸张，立意绝俗。其中他画有一幅《大阿罗汉尊者像》，现存于美国国立亚洲美术馆（美国弗利尔和赛克勒美术馆），在该图的右上角有李溥光的题跋：



贯休所绘《大阿罗汉尊者像》



溥光题贯休绘罗汉真迹跋

第十七大阿罗汉与五百眷属住南岳车辙灵川方广圣寺。昔
(时) 大元至正五年 (1345 年) 乙酉岁二月己卯朔十九日甲戌
吉。

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长卷为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的翹楚之作，卷后有二人题跋，一为宋代蔡京，另一人即为李溥光。能在如此长卷上题跋，足见其当时名重一时，以及在当时书画界的地位。

予自志學之歲獲觀此卷迄今已僅百過
 其功夫巧密處心目尚不能周遍者所
 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設色鮮明布
 置宏遠使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亦當短
 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
 殆衆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
 言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生魄昭
 文館大學士雪菴溥光謹題

溥光題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跋，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封疆大吏

那彦成碑刻心系民生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他在改组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大封诸子为王，让他们“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达到“屏藩王室”的作用。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其庶十四子朱模封为汉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改封肃王，驻平凉。二十八年（1395年），设藩于甘州（今张掖市）。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朱模由于“甘、肃兵变不常”，局面复杂，难以控制；甘州寒冷而多风沙，江南官兵不服水土等原因，请求内徙，获建文帝朱允文批准。肃庄王朱模遂带领王府官员、侍卫，以及来自江南的肃王随从和其他人员移藩兰州。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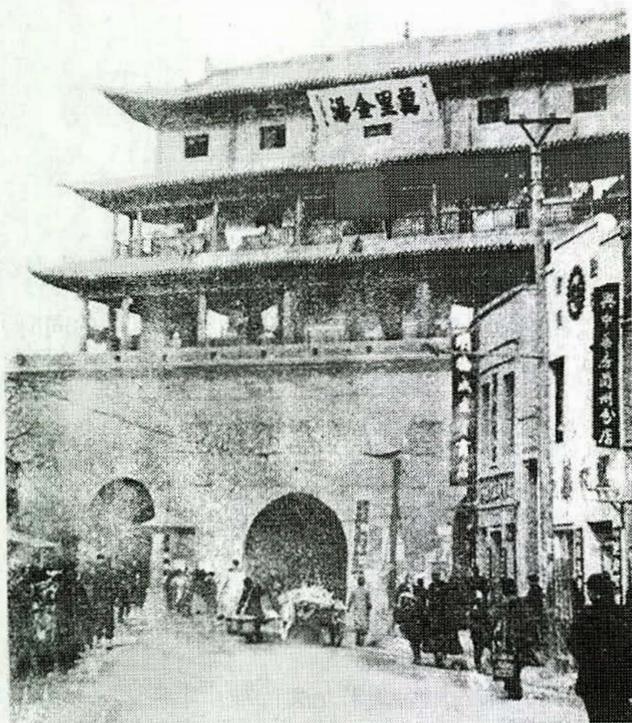
州也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活动。

兰州最早的大规模“城建”活动始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当时筑起了周长6里200步（每步五尺），呈东西略长的正方形内城，这也是兰州城的雏形。城高3丈5尺，宽2丈6尺。开四门，东曰承恩门（后改来煦门，在会馆巷口东侧）；西书永宁门（后改镇远门，在张掖路西口）；南镌崇武门（后改皋兰门，即南大门，位于南关什字）；北称广源门（俗称水北门，位于永昌路北口）。后在城墙外东、南、西三面各开挖宽3丈、深1.5丈的深沟，沟内引水，称为护城河。城北濒临黄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高悬于南城门楼的“万里金汤”匾额

河，为防水患，城墙上部用青砖，下部用巨型石条砌衬，并“筑石堤里许”。

其中唯有南门楼雄伟壮观，是城之中心。经明、清两代修葺，城楼下有三个城门洞，中间的一个门洞最大，宽约 20 尺，可通车马；在抗战时期，为便于市民的出行和防空疏散，在大门洞两边，兰州市政府又开两个较小门洞，宽十余尺，行人可通过。南门城楼共有三层，每层五大开间，层层翘角飞檐，明柱雕栏，建筑面积约有一千平方米。南门城楼矗立于兰州城中心，其重檐巍峨，楼上长年有野鸽栖息。到了清代，在城楼的最上一层的正南面悬有“万里金汤”巨幅匾额一块，黑匾金字，字迹遒劲挺拔、雄浑厚重，与城南的皋兰山遥相呼应。夏日，蓝天白云之下，鸽群盘旋翱翔，行人莫不翘首，叹为观止，故此楼可与西安钟楼相媲美。

其中匾额中“金汤”二字，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的《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中有：“自公倡议，而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金，是指金属；汤，是指沸水。“金汤”则是指金属造的城，沸水流淌的护城河，成语中有“金城汤池”和“固若金汤”，形容城池险固。

“万里金汤”巨匾为清代陕甘总督那彦成题写。那彦成（1763 年—1833 年），字韶九，一字东甫，号绎堂，满洲正白旗人，章佳氏，大学士阿桂之孙。乾隆进士，初任职翰林院。嘉庆初，擢工部尚书。嘉庆八年（1803 年），任礼部尚书。次年，为军机大臣。后又任陕甘总督。不久那彦成又调任两广总督。嘉庆十五年（1810 年）春，重莅兰州任要职。道光三年（1822 年）十月，那彦成三任陕甘总督。那彦成出身于官宦之家，



那彦成题写的“万里金汤”

其祖父阿桂，清朝名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父阿必达，官至工部侍郎。

说起那彦成，不得不谈到他的祖父阿桂。阿桂为清代名将，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同时，他还是一代名臣，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帝曾称赞他：“性颇捷敏。力请从戎，宜哉惟允。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材继出，为国之桢。”为此，中南海紫光阁曾悬挂有阿桂的功勋画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反对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员的贪污舞弊、欺压人民，自青海循化率众起义围攻兰州，乾隆皇帝闻报后，谕旨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由京城赴甘肃，速调陕西、四





章佳·阿桂

川、新疆等地兵将进击。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围攻兰州城，转移到华林山一带。和珅督军进攻，义军尽管人数少，“虽千余……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清军屡攻不下，固原总兵图钦保和近千名官兵都被击毙。乾隆又命军机大臣阿桂赴甘督师，阿桂抵达前线军营，和珅将失利责任归之于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认为如有这种情况，就应以军法处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诸将部署作战方略。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答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又羞又恨，说不出一句话，于是民间有“和珅

斗不过阿桂”之说。可见阿桂素善领兵打仗，指挥有方。

那彦成也秉承着祖父的这一特性，率军东征西讨，屡立战功。

那彦成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关心民瘼。遇有灾情，则向朝廷疏言，得以拨帑赈贫。清时，兰州每到秋节常遇秋雨连绵，淫雨霏霏，致使将待收割的庄稼遇雨天而无法收割。那彦成就命令军士在兰州城北的九州台山顶，用土炮击散云团，以避免阴雨雷霆天气对庄稼的破坏，同时还以土枪助威。当时有一句民谚就是：“那三爷，提着空枪吓天爷。”

那彦成兼长文采，又是一位书法家，他的隶、楷、行三体书法都有自己独特的字形、章法和精神。

他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在兰州城东门外建风云雷雨坛，撰文并书丹了《雷雨风云太白泉神庙碑记》。嘉庆十六年（1811年），该庙坛建成竣工，又称风神庙。那彦成亲往致祭，祈神佑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碑石原存兰州城东门外，如今庙与碑皆荡然无存。

那彦成本在第一次出任陕甘总督时就打算拓修兰州城，但由于任期较短，后来调离，所以这一想法未能实现。当他二次出任陕甘总督后，则实现了这一想法。

嘉庆十七年（1812年），兰州城池修葺竣工后，那彦成书就《重修兰州城碑记》，碑文如下：

重修兰州城碑记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管甘肃巡抚事兼理茶马那彦成撰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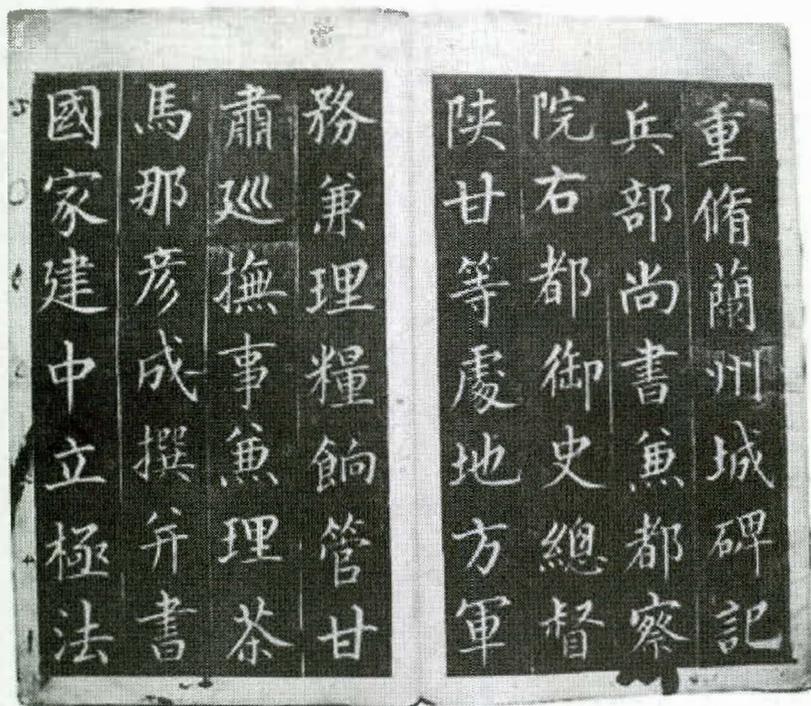


国家建中立极，法度修明。所在群邑城廓〔郭〕例得以时葺治。省会之区，金汤尤重，所以慎封守、隆体统也。兰州为陕甘督臣驻节之所，面山为城，倚河为津，形势最要。且自我高宗纯皇帝耆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版图日廓，琛赆来同。自回部、准部而外，若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青海之生番蒙古人等，凡年班入觐者罔弗取道于兰，往来络绎，岁以为常。至则督臣宣布恩德，谕遣北上，归亦飭属，资送出关，其所系于观瞻者尤不同。都会名区，层闾周郭，允宜完缮，以崇体制。考郡城建自隋开皇初，宋苗授复为修筑，有明因之。宣德、正统间，递增外郭。我朝改置省会，規制大备，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乾隆三年踵而新之，迄今七十余年，虽时补苴，未臻完固。余前任督臣时曾议修之，因调任遂弗果。庚午春，仰膺简命，重莅兹土，有司复以请，会固原州城亦议重修，核其事诚不可缓。而是年旱，民艰于食，虽赈贷兼施，恐来岁青黄不接，民食犹不给。乃建议乘时修补城垣，以工代赈，奏入得旨俞允。命既下，民知其活己，也相率欢跃争就役。爰遴负董其事。以十六年夏兴工，畚鍤如云，众力毕殫。次年秋告竣。用帑八万九千有奇。是役也，工举而民悦，城成而岁熟。于是垣墉高坚，雉堞鳞次，楼橹翼然。临于其上俯瞰洪流，远连紫塞。不独郡人士喜新斯城，谓言言侏侏，与古金城名实相副；即凡重译远来，縵属戾止者，获睹城之高、池之深，军旅之壮盛，闾阎之富庶，莫不怀诚归命，欣欣然向慕而肃敬。是

郡城之雄峙維新，固西域往來者之一鉅觀矣！雖然余于茲更有幸焉。憶修城之舉，前數歲已議及，願遲遲至今始得蒞其端，乃自救荒發之。即吾民以受佣得直免飢餓，其策又由修城及之，二事不相謀適以相成，若不期然而然。非仰沐聖主視民如傷之至仁，何克蒞此？余故曰：是役也，工舉而民悅，城成而歲熟。紀其實所以重為斯民幸也，是為記。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八月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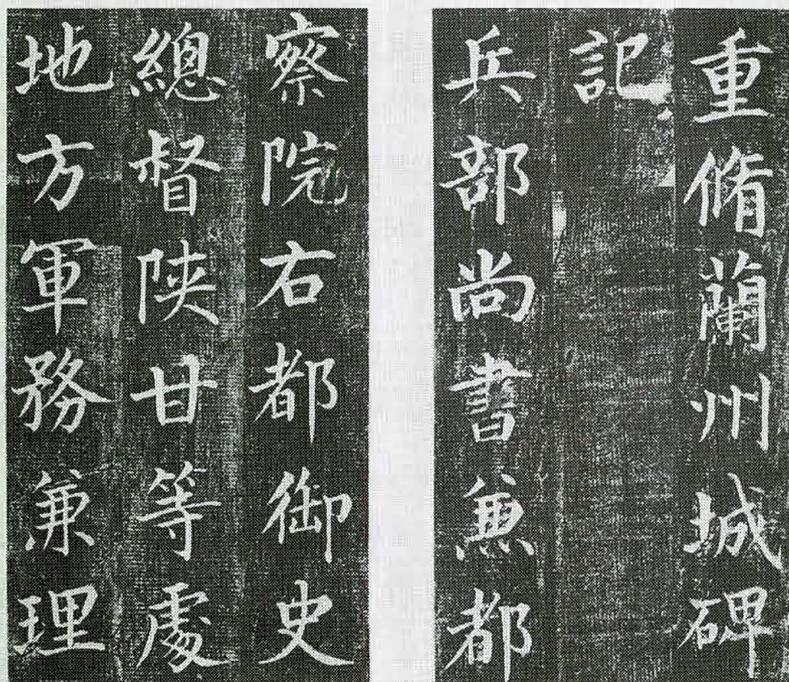
富平仇文發刻石



那彥成《重修蘭州城碑記》碑刻拓片版式之一

碑文记述了兰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历代修城概况以及嘉庆十六年修葺兰州城的详细经过，为研究兰州地方史提供了实物佐证。由当时名重西北的刻碑名手仇文发用陕西富平石镌成。据《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载：“仇文发，清代陕西富平人。善刻碑，所刻张横渠东铭，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陕甘总督当时辖制陕、甘两省，据文史学家、甘肃省文史馆馆员张令瑄先生说，当时该碑肇刻时是一式两通，一在西安，一在兰州。留在西安的就是如今矗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通《重修兰州城碑记》；而兰州的碑刻早已佚。而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只刻一通，因该碑采用陕西富平石雕刻，薛仰敬先生在《兰州古今碑刻》中提到，该碑刻成后，因故未将碑即运兰，后收藏于西安碑林。现从碑林博物馆的这通碑的拓片来看，《重修兰州城碑记》为楷书，18行，共698字，拓片纵1.83米、横0.77米。碑文字体遒劲俊朗，结体秀丽、工稳、庄重，颇有唐楷之气韵。每一个字，则笔势开张，清寒中透着圆润，瘦硬中弥散着充腴。正因为该碑有着这些特点，早年已有各种碑帖拓本装订成册流行市肆，供人临摹学习，因此拓片长期以来为书坛学人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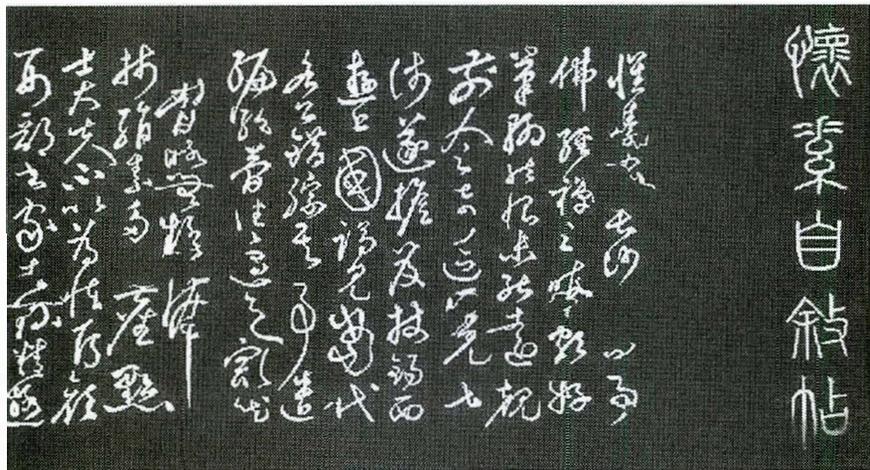
同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那彦成撰书《雷坛碑记》，碑矗于金天观（今市工人文化宫）内。碑文为行楷书，碑高280厘米，宽89厘米，共19行，满行66字。部分文字剥落。此碑记载了那彦成祭雷坛求雨灵验之事，祭后越日，雷鸣电闪，沛雨降落，是年丰收。根据此碑可考金天观历史、兰州气象史等。综观那彦成的诸多碑刻，可以看出他心系民生，关心百姓疾苦；同时，这些碑刻对研究其书法艺术成就以及



那彦成《重修兰州城碑记》碑刻拓片版式之二

兰州地方志均有着重要价值。

那彦成的祖父阿桂虽为一介武夫，戎马倥偬四十余年，但是他却酷爱收藏书画，以至“晚岁翰墨自娱”。他曾宦游各地，收藏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释怀素狂草《自叙帖》、宋代米芾行书《虹县诗帖》及明代董其昌行书《颜鲁公赠裴将军诗》等一些书法珍品。为了使这些珍贵的墨宝能够让更多的人一睹其风采，那彦成于道光四年（1824年）请富平镌刻高手仇文法将家藏的这些书法瑰宝分别摹勒上石。共用石43块，每块碑拓片纵36厘米、横25厘米。不仅刻工精细，刀法娴熟，而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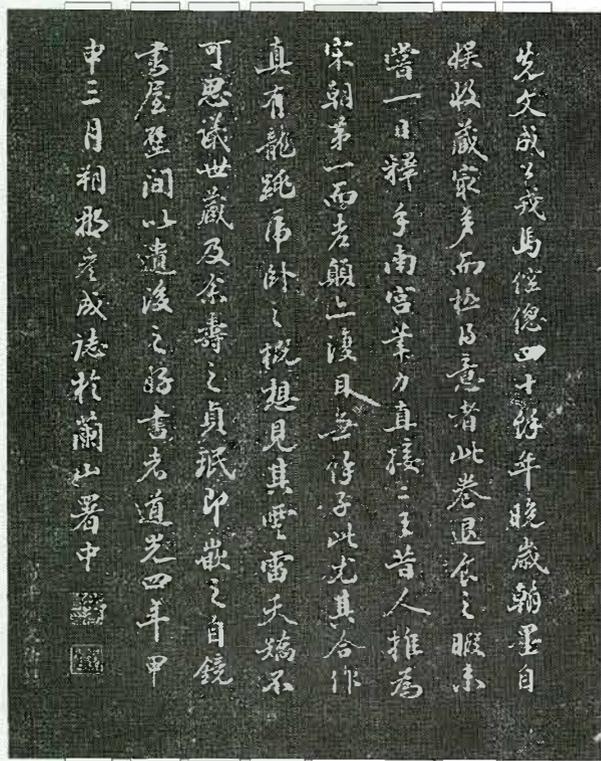


怀素《自叙帖》拓片

种书艺奇葩纷呈，各具特色。那彦成在各帖后分别述及墨宝来由、历代书法家评词等诸跋语。

那彦成跋怀素草书《自叙帖》后：

唐怀素自叙余见有二本，其一字微大，而行间略散漫。此卷先文成公旧藏，云飞飏举不可思议，而茂密沉着又复端严光明字字在人表而又如出意中。公昔爱美宝藏日不去手。迨公歿后此物最失，后百计寻得，以五百金售归。有唐至今几四千年，传者应不止一手，而于余家失而复获，既喜墨宝之不沦，更幸世守之不替，亟以寿之石垂于不朽，兼识其端末以示来兹。道光四年甲申又七月之望，那彦成书于兰阳公署之诚训堂。



那彦成《虹县诗帖》跋文

从这段题跋可知，那彦成曾见过两种版本的怀素《自叙帖》。《张思温文集》中也曾记叙：“怀素《自叙帖》，当时写非一本。”张思温还写道，他曾在书店见到影印的宋拓本，他觉得这大概是依清宫所藏而翻印。这与兰州碑洞所藏那彦成刻《自叙帖》相比较，“虽笔画不尽相似，而神采各有逸韵，未易轩轻也”。

跋米芾行书《虹县诗帖》后：

先文成公戎马倥偬四十余年，晚岁翰墨自娱。收藏最多，

而极得意者此卷，退食之暇未尝一日释手。南宫笔力直接二王，昔人推为宋朝第一，而老颠亦复目无余子，此尤其合作真有龙跳虎卧之概，想见其云雷天矫不可思议。世藏及余寿之贞珉即嵌之自镜，书屋壁间以遗后之好书者。道光四年甲申三月朔，那彦成志于兰山署中。富平仇文法镌。

跋董其昌行书《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后：

思翁书宗鲁公，故临颜更为超绝。尝见得意书必推崇松雪，寻常又不甚假许。盖推崇毋以自命耶！此临裴将军诗卷，精神魄力故应不让松雪。思翁云古人行不间一笔草，草不间一笔行。余谓大家一落笔圆，通幅皆圆；一落笔方，到底皆方。观此斩方笔力迅于风雨，颇亦不无所解。那彦成并识。

跋文后有“那彦成印”和“绎堂”二小篆印。

碑刻成后，那彦成将这些碑置于节园内“自镜书屋”。所谓书屋，实为地下式建筑，外有方形画舫式石门，入门为四方形地洞，四周壁间遍嵌帖石，故称碑洞子。

碑洞子为节园极具文化之景点，西去西域的名流多到此观瞻。道光二十二年（1824年），林则徐流成新疆时，路过兰州。七月三十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在督署设宴招待林则徐，并携林则徐游览了督署后花园——节园，先登拂云楼，纵目远眺黄河北岸重峦叠嶂，俯瞰黄河浊浪



翻滚，心潮起伏；后又进入城墙下碑洞子观看那彦成的碑刻。林则徐在《荷戈纪程》中写道：“（节园）有小碑林，镌怀素、米、董诸帖于壁间，皆那文毅公所留物也。”“文毅”为那彦成的谥号。后来碑洞子还嵌过陕甘总督左宗棠、陕甘学政吴大澂等高官的书法帖石。张鸿汀在《兰州古今注》中称：“俱为妙品。”20世纪40年代，这些帖石被移置中山堂壁间。1954年修整中山堂时，将帖石埋于堂东。

那彦成共襄翰墨的义举为人称颂，不仅方便了当时的学生，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至于这些珍贵的碑石何时能够挖掘出来，重见天日，以飨广大市民，流萤曾在《塔影河声》一书中写道：“但是现在要掘地寻找，诸多不便，只好等以后了。”

那彦成不光在兰州刻了这些珍贵的大家墨迹，后来他在道光十年（1830年）任直隶总督时，同样将家藏的、秘不示人的唐以来历代名贤墨迹和旧拓摹刻于石上，嵌刻在古城保定莲池书院南楼壁间，其中包括褚遂良、颜真卿、怀素、米芾等书法家的真迹或旧拓。这些碑刻共横石51方，后世将拓本分装6册，定名为《莲池书院法帖》。也许正是因为那彦成的这一义举泽被后人，莲池书院相继出现了黄彭年、张裕钊、吴汝伦、刘若曾、樊榕、刘春霖等一大批书法家。

陕甘总督升允桥畔留墨迹

滔滔黄河穿兰州城而过，中山桥横亘于黄河之上已逾百年，在铁桥北岸西北一角至今矗立着一通碑刻，这就是时任陕甘总督升允于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升允（1858年—1931年），蒙古族，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清光绪二年（1876年），由荫生报捐主事，签分吏部，九月到部，派充考功司兼稽勋司行走。升允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壬午科顺天乡试文举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补授陕西督粮道。是年八月，因节省道仓浮费，每年报效银四万两，用于开办旗屯，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九月，署理陕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布政使，实授陕西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陕甘总督。

从升允简要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最初是靠祖上功勋的余荫和纳捐走上仕途的。但升允却并非是个庸官，他重视教育，支持实业，任陕甘总督时还开办了不少“新政”的项目，先后设邮务、洋务、电信，修公路、铁路，办矿，兴浚河水利，建招商市场等。

虽然升允的官是用银子“买”来的，但他却不是个贪官，他通过节省浮费、报效银两，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正因为他的廉政，而“累擢遂至陕西巡抚”，在短短的时间内，升允由一个低级主事升至一品大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两宫西狩，升允及时带兵勤王，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从而青眼有加。当然这也绝非是升允的投机或钻营，因为他在给清末典礼院总务厅长端绪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况：“左右肩畔，枪子飞过如蝗，竟未阵亡，不知是幸是不幸也。洋兵经此一战，竟不过关，岂亦有戒心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升允也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升允还有着秉性刚直的一面，当他看到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和下级官僚，就予以制止，铮铮有声。而且他

从不买王公贵族的面子，多次凛然不惧弹劾权贵，得罪了不少人，但也换来了“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的美誉。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升允调任陕甘总督。甫一上任，雷厉风行，全面推行“新政”。是年五月，升允即在兰州创办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改初级师范），令各地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堂肄业，一年后毕业后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当教习。

次年三月，占地70多亩的甘肃农业试验场在甘肃举院、小西湖创设，升允命引进麦、豆、蔬菜等优良品种，予以培育、推广。此后，升允又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总局下设农工股（分管农业试验场和工艺制造厂）、商矿股（分管商品陈列所和矿质化验厂），在全省各地推行实业。其中在甘肃举院开办的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洋设备技术，当时较有规模的有绸缎厂、织布厂、裁绒厂、玻璃厂等四大厂，制造绸缎、铜、铁器等轻工产品。因升允厉行“新政”的铁腕做法，以致经费大缺。为弥补财政紧张，于是加重了赋税，致使绅民的负担加重，“呻唤”不止。这与升允的前任陕甘总督崧蕃宽松仁爱的施政作风大相径庭，于是民间有了“走了个松泛，来了个呻唤”的民谣。

当然升允最值得人称颂的还是他主持修建了黄河铁桥。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同时与德商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并授权彭英甲为始终经理其事



的总负责人。

架桥需要大量的钢材和水泥，以及建桥中所使用的锅炉、机器、沉箱、小铁轨等材料。德商泰来洋行将这些海运至天津，后由天津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火车站，再由丰台转京汉铁路运至河南新乡火车站。新乡至兰州，均由牲口拉木轱辘大车运输。因路途遥远，所以艰辛备尝。

正当升允的各项“新政”全面展开，铁桥的修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兰州曹家厅左公祠卧龙阁——当时兰州城内最豪华的宴会厅，举办了一次西式宴会，接待了一位来自欧洲的“洋人”，这就是曾任俄国上校、芬兰探险家，后来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的马达汉（曼涅海姆）。在这次宴会上，他和马达汉及与会者留下了一帧照片。我们从这帧照片上可以看到，雕梁画栋的暖阁内，悬挂西洋玻璃吊灯，长条餐桌上铺着洁白



升允（前排左一）与马达汉



的桌布，摆放着各色玻璃餐具及刀叉。肥硕的升允留着小胡子，顶戴花翎，身穿朝服，补服为绣鹤，袖口镶貂皮，项挂珊瑚朝珠，踌躇满志地坐在前排显要位置。其左侧即为马达汉，戴皮帽，着呢大衣，碧眼如鹰。

马达汉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升允留给他的印象：

总督十分肥胖，走路摇摇摆摆，完全是一种中国人惯常的鹅步姿态。他看上去不讨厌酒、雪茄，也不讨厌其他的生活乐趣。

马达汉还拍摄了一帧铁桥正在修建时的照片，这帧珍贵的照片呈现出当时热火朝天的工地场景。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辛勤劳动，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横跨于黄河之上的第一座铁桥竣工。为使这座黄河上游首创的永久性铁桥更加雄伟壮观，在铁桥南北两端各添建一座中华传统式古建筑——牌厦。每座牌厦均为三开间，雕梁画栋，蔚为壮观。牌厦前后共悬名人匾额四块：其中由升允题写“第一桥”匾两块，分置南北桥头；其他两块分别为“九曲安澜”“三边利济”。中式牌厦与西式铁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堪称中西合璧，蔚为壮观。后来随着汽车的日渐增多，桥北的牌厦已严重制约了道路的畅通，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北公路管理处兰州工务所递交给兰州市政府的公函要求：“查黄河铁桥北岸牌楼一座，已由前省会工务所连同该桥移交本所，兹据监工杨禄报称：以贵市警察局以该牌楼妨害交通，拟予拆除，除飭工于晚间

拆卸存料保管外，相应函请查照并转知警察局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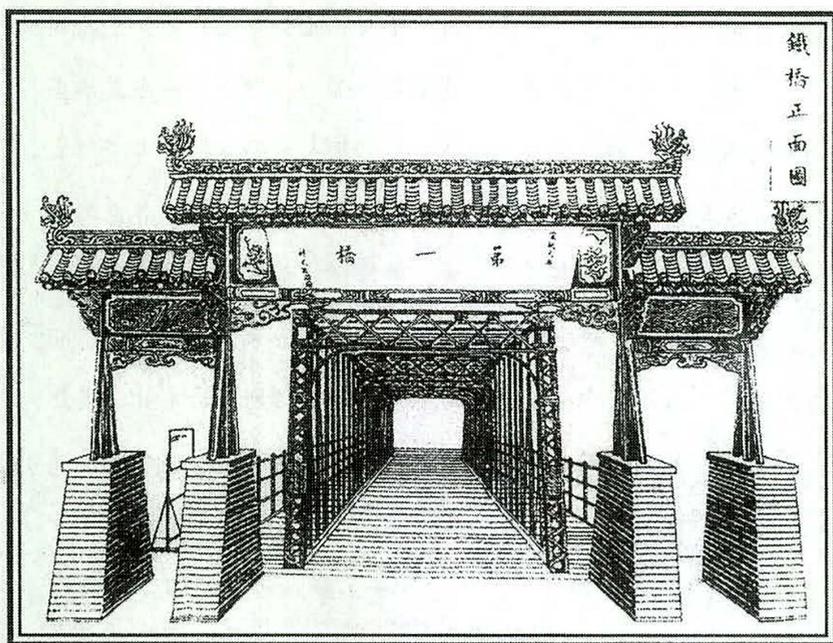
为永久纪念黄河铁桥创修这一重大工程，升允的继任者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蕃命人在铁桥两头刻立石碑两座，碑文即是由升允撰文书丹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

兰州城北滨临黄河，为甘凉宁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处往来大道。举凡輶轩、传符、商贾、征旅，肩摩毂击相望于途中，阻巨浸，行者苦之。每年春间，向由皋兰县鸠工搭造浮桥，以铁绳比系二十四舟，面以木板藉作津梁。入冬冰至桥拆，则又招舟以渡。迨腊月河水坚凝，改由冰上行走，土人谓之冰桥。开春冻解冰消，复建造浮桥如初。顾，浮桥当夏水盛涨时或中断，冬冰冲击亦辄断，断必溺人。而冰桥将开将结之时，人马车辆之失陷者尤多，病涉戕生，咸滋永叹。昔左文襄公督师度陇，固已怒焉，忧之，曾议修建黄河铁桥，因洋商福克索价过昂，事遂中止。余于乙巳夏持节西来，询悉情形，相度河势，每思重申前议，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游历来甘，爰饬司道商令包修，与之订立合同。集华洋工六七十人，料件悉购自外国，设法转运至兰，经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宣统元年六月而工成。桥长七十丈，宽二丈二尺零，架桥四墩，中竖铁柱，外以塞门德土参〔掺〕合石子成之，桥面两边翼以扶栏，旁便徒行，中驰舆马。计造桥工料共银十六万五千两，运费并



升允题写的“第一桥”



升允题写“第一桥”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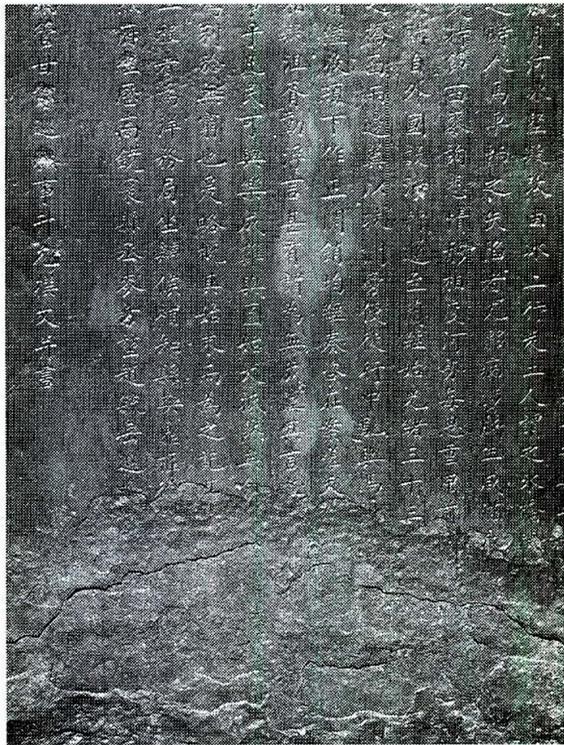


杆绳等项杂用，共银十四万余两。二共动支库平银三十万两有奇，由统捐溢收项下作正开销，均经奏咨在案。嗟夫！冬官既佚，考工失传。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辅我所未及，用人之长亦奚足异。乃上年筹建此桥，群相疑沮，胥动浮言，甚有谓为无成，冀其言之必验者。而及其成也，又咸以去险就坦，易危为安，称便如出一口。使向者感于众议，不能历久不挠，又安必克期蒞事乎？凡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大抵然矣。余既兴斯桥之成有以续前贤未竟之功，而可资一劳永逸也。又冀后来者之补修以时，俾此桥千百年如一日，而以为利于无穷也，爰略概其始末而为之记。其督办者为二品衔兰州道彭英甲；帮同照料者为兰州府知府刘振镛，署皋兰县知县赖恩培；监理工程师为洋务局坐办、候补知县樊鼎枢、徐登第；英文翻译县丞江连庆并孙照磨、贤林，巡检庆椿蒲，千总生禄；委运桥料者为候补知县张钟骏、沈潮云、刘启烈；府经历高镜寰，县丞麦方堃、赵毓岳；巡检傅畷；典名臧炳文；承修者为美工程司满宝本、德人德罗、华工刘永起。例得备书，因附名焉。

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尚书衔、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兼理茶马粮饷、管甘肃巡抚事升允撰文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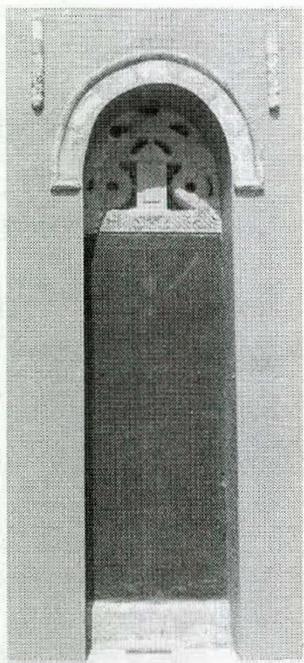
大清宣统元年仲夏之月吉日

碑文详细记述了修建铁桥的经过和施工人员的名字，同时阐明铁桥所在地兰州自明朝以来即已成为通向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交通要津，记述了镇远浮桥的修建及春设冬拆，人们过河的艰难，重点记述了黄河铁桥修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建桥概况。文章层次分明、用笔洗练，碑书清秀稳健、规整遒丽。



《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斑驳的碑面

至今该碑依然矗立于铁桥北岸西侧一角，石碑（碑亭）高约 4.5 米，宽近两米，由碑首、碑身、碑座几部分构成，外建方形碑亭。碑首正面镂空透雕二螭飞腾于波涛之上，两个螭首分列左右呈对峙状，风格粗犷，栩栩如生。中间篆额上方刻饰火焰宝珠。碑身高约 2.5 米、宽 1 米，碑文四周刻饰行龙祥云图案。碑身下为方形石碑座。碑亭经过修补，如今呈方形立体状，将石碑背面和左右两个侧面紧紧包住，仅留石碑正面供人观瞻。从碑亭上部年久剥蚀的砖雕垂花吊柱和磨砖对缝的拱



矗立在黄河铁桥西北桥堍处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碑

券圆顶来看，原来的碑亭精致而优美。

从这一碑一匾来看，升允国学根基颇深，文章文字凝练、言简意赅，书法则结体方正、谨严雄健，可以看到明显承袭颜鲁公雄浑宽博之笔意。此外，他还为望河楼撰有一联：“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这副楹联后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中。升允主政陕甘，驻节兰州时，还为总督府那彦成所修碑洞题联：“后匿景藏光嘉遁养活；循图访古志泰捐雕来。”为拂云楼题联：“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升允的这副楹联引用了古乐府《饮马行》中“饮马长城窟”的典故，读来颇有慷慨悲歌之气概。

升允一生忠于清廷，他与善耆、溥伟和铁良被溥仪视为四个“申包



胥”。因此他一切为朝廷着想，延揽人才，举贤荐能。1923年，就是由他举荐，王国维与罗振玉、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升允因是蒙古镶黄旗人，姓多罗特氏，因此他的子女多以罗为姓，罗振玉在书札中也常以本家同宗隐喻。著名国画大师溥心畲即娶升允之女罗淑嘉（字清媛）为妻，结缡后，罗淑嘉亦习书画，他们夫唱妇随、磨墨挥毫，颇似大画家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妇，仿若“管赵风流”在世。罗氏山水秀逸，风格颇近溥心畲，后来他们夫妇还一起举办过画展。1947年罗淑嘉因病去世，溥心畲曾为她作悼亡诗：

当年欢笑语，尽作断肠音。碧海留长恨，黄泉隔寸心。
山邱思故国，天地入悲吟。后死非良计，空教百感侵。

溥心畲还为亡妻写了墓志铭。溥曾将一件该墓志铭赠送给篆刻家陈巨来。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记载：

后竟以溥所自撰其夫人之墓志铭一篇，亦并以相贻，且曰：今世永无刊石希望矣，故用以奉贻作一纪念云云。

但似乎溥并非只写了这一篇墓志铭，因为在201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就拍出了一件同样为溥所写的墓志铭。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溥氏书画文物中，还有一件溥写的墓志铭。原来，溥有一文多次抄录之习，或纪念，或遣兴，或应人所求，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升允逝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的这位乘龙快婿曾为他作《神道碑》，称其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2005 春季上海崇源大型艺术品拍卖会溥心畬书画专场曾展出了溥心畬写给前清翰林陈云诰（字紫纶）的三通信札，其中谈到他为岳父写的《神道碑》：

昨作序文一首。又升文忠公孤忠亮节，没已数年，而山无坠泪之碑，墓少表忠之观，若无述作，何以垂后。乃为作神道之碑，居忧之中，悲惨枯涩，诚不可已而后作，非骋藻修辞可比类也。

当然这也是站在清廷的角度褒扬升允忠贞的文字。升允有一首《自述》诗，也许更能反映其真实个性：

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
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
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
美食鲜衣日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
单于犹是有君臣，中华乃为化外人。
王者迹熄匹夫责，吾欲藉此明彝伦。
呜呼礼乐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岂得已。



升文忠公 孤忠无死节 没
 已数年 而山岳隆峻
 碑墓少 表忠之 孰若
 公述 作何以 垂 尔 为
 作神道之碑 居 尔 意

二

初移不
 公果就 秉此 一 读 卷
 颜色 肃 然
 文 焉 至 矣
 隆 攝 制 博 信 精 毅

四

此 篇 未 艾 序 下 達 列 志 居
 瞻 幸 曾 已 伏 想
 此 序 中 榜 榜 榜 聖 之 集
 已 殷 躬 願 以 餘 生 奉 成
 早 書 昨 序 文 一 方 又

一

中 悲 慘 枯 澀 誠 不 可
 已 而 必 作 非 窮 萬 修
 辭 可 比 類 也 謹 上 可 信
 寄 拙 作 叩 求
 教 正 前 贈 鮑 君 敬 修

三

左宗棠兰州留墨

20世纪80年代初，王震将军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当年种下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那时，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老翰林，九十多岁了，他谈起了左公当年进军西北的许多事，可惜没有记下来。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左宗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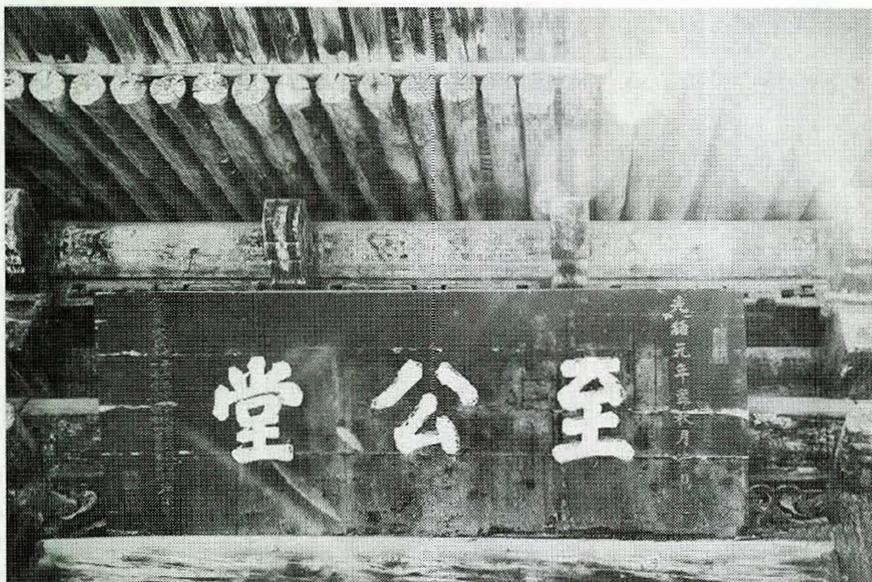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谥文襄，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亲率大军南征北战，历经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他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任陕甘总督入驻兰州，从1866年到1881年他在西北度过了15个春秋。他在兰州办洋务，创“二局”（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局），兴学

风，建举院，因此留下了许多墨迹，如匾额、楹联、题词、手札等。这些墨迹经过风雨沧桑、时光荡涤，愈发凝结出历史的厚重，散发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左宗棠甫来兰州上任之时，当地官绅就为他在五泉山建了一座生祠。颇有君子慎独风范的左宗棠立即制止，命令改为泉神霍神祠，即现在的清虚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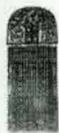
左宗棠一生清正廉洁，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自陕西划出，另设一省，可是乡试却仍与陕西合并举行。左公看到甘肃及西北地区士子参加乡试要远赴西安，甘肃最近的县也要七八百里，宁夏二千里，河西三四千里，至于新疆镇迪道则有五六千里，路途艰辛，费用更巨。但是自清建政以来，二百余年间，竟无一位巡抚或总督所能想到。于是左宗棠上奏朝廷，实行陕甘分闱。这一点也折射出左公的高瞻远瞩和体恤民情的高尚品德。

获得朝廷的恩准后，选址在兰州城西北郊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处）新修兰州贡院。兰州贡院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上悬“至公堂”三字匾额，为左公手书。匾额上款有“光绪元年孟秋月吉日”及阴文小篆“千古大文章”闲章；下款刻“钦差大臣太子太保 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书”，刻阴文小篆“左宗棠”及阳文“东宫太保恪靖伯”两方印章。堂前楹柱上悬挂着左宗棠撰写的一副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攀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至公堂匾额

至公堂前为三层楼阁的明远楼，原是贡院内的标志性建筑。后来在民国八年（1919年），兰州翰林刘尔斫将此楼迁于五泉山，改名万源阁，为五泉山中轴线上的一座重要建筑。明远楼左右为南北号房，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雨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闱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以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工字过厅，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北为监视道所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廉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



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东为录榜所。

清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秋闱，甘肃举行第一次乡试，三千余名士子参加。左宗棠以监临身份参加了此次乡试，代办监临为甘肃布政使崇保，正考官为国史馆协修董疏慰，副考官为翰林院编修胡聘之。通过科考取士第一名解元为兰山书院的安维峻。

在北京保利2014秋“古籍善本 唐宋遗书 古籍文献 翰墨菁萃”拍卖会上，曾拍出一件左宗棠的篆书书法作品，内容为“不薄今人爱古人斋”。这件左公的书法即为其题写于这次乡试科考考场上。

“不薄今人爱古人”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原文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左公这件书法与一般的书法作品不同，因为这是左宗棠以



左宗棠书“不薄今人爱古人斋”

胭脂篆体指书写就，也就是说并不是用笔墨写成的。清代甘肃名进士、书画大家范振绪和民国时期曾任甘肃省政府会计长的王廷翰均有题跋。

其中王廷翰的题跋为：

甘肃乡试旧与陕西合闱，左文襄公既平甘乱以民穷士苦始
请分闱，光绪乙亥举行第一次乡试，文襄以监临入场，此即闱

中所书之，足为重要文献。廷翰得而珍藏之久矣。安顺谷纪常先生来主世，政恤民重士，绥靖地方，与文襄治行先后媲美，爰为装池重贻，以志景仰，非仅以文襄文字之工足以不朽也。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既望。天水王廷翰谨识。

从这段题跋来看，左公指书的这件篆书作品，也许是应考场中某位同僚所嘱，即兴而题的书房斋号，后来到了民国年间，流传至王廷翰手中。后来，贵州安顺人谷正伦（字纪常）出任甘肃省主席。也许王想攀附、趋奉于谷正伦，所以又将这件作品装裱后转赠给了谷正伦，当然这段题跋也不乏对谷的溢美之词。

谷正伦得到这件左公书法作品后，也极为高兴，于是又请范振绪题跋。范遵嘱题跋于后：

左公善书尤精篆体，然天壤间流传者行草多而篆书独少。公治陇分闱取杜诗戏题六绝句中语，颜其监临之室盖隐有厘正文体之意，帖括文本属艺文末技，沿至清咸同间每况愈下，故公书此冀陇上人士学行兼重，攀屈、宋，而矫齐、梁，亦公所自况也。中秋前四日，正士子二场入闱时书用胭脂，故事闱中墨笔仅正负主考官用之，同考官用蓝，监临提调监试用紫，亦当时规例所定也。三十五年岁次丙戌初夏，纪公主席属题，范振绪敬识。



从范振绪的这段题跋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左宗棠要用胭脂书写？这是因为“闈中墨笔仅正副主考官用之，同考官用蓝，监临提调监试用紫，亦当时规例所定也”。从中我们也算收获了一些古代科考的小知识，也许是为防止作弊，科考的考场中墨笔仅正副主考官用，同考官用蓝笔，监临提调监试用紫笔。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范振绪解释为：这其中隐含有厘正文体的意思，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属于艺文末技，到了清咸丰、同治年间则每况愈下，左公书此希望陇上人士学行兼重，学习屈原、宋玉诸先贤，而矫正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文风，这也是左公自己所遵循的治学为文的准则。

左公善書尤精篆隸然天壤間法傳者行
草多而篆書獨少公治隸分闈取杜詩隸
六能中語類其豎臨（室蓋臨者聲正又終之
意杜詩又本為隸文未技臨上清咸同闈無從念
下故公書以冀隸上人士學行並重梁左宗鶴
齊梁六公所自沈也中稱前四日正士子二傳八闈
時書用照得校下闈中墨筆僅正副主考官用
之間考試用藍監臨提調監試用紫亦當時
規例所定也 三十五年庚午丙戌秋
紀公主席屬題 范振緒並識

甘肅鄉試卷典陝西合闈左文襄公
既平甘亂以民窮士苦始清分闈先緒
乙亥舉行第一次鄉試文襄以監臨
入場此馬闈中所書最為重而又獻廷論
得而珍藏之久矣安順
谷紀常先生來主心以沈氏重士編請地方
與之篆隸行後先婦羨羨為懷池寺臨
以志景仰非僅以文襄文字之正足以不朽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既會

天山王廷翰謹識



王廷翰和范振绪的题跋

如果说左公最惠及百姓的举措之一，那就莫过于他在陕甘总督任上修建了饮和池。《清史稿》中记载：“公自入驻兰州，著《学治要言》一编颁示各属，又葺署后园，建明肃藩烈妃庙、忠义祠。制机轮挹河流

注入园中曰‘饮和池’恣民汲饮。皆有文以记之。”文中所提到的“署后园”，即总督署后花园——“节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州市委所在地。饮和池就位于节园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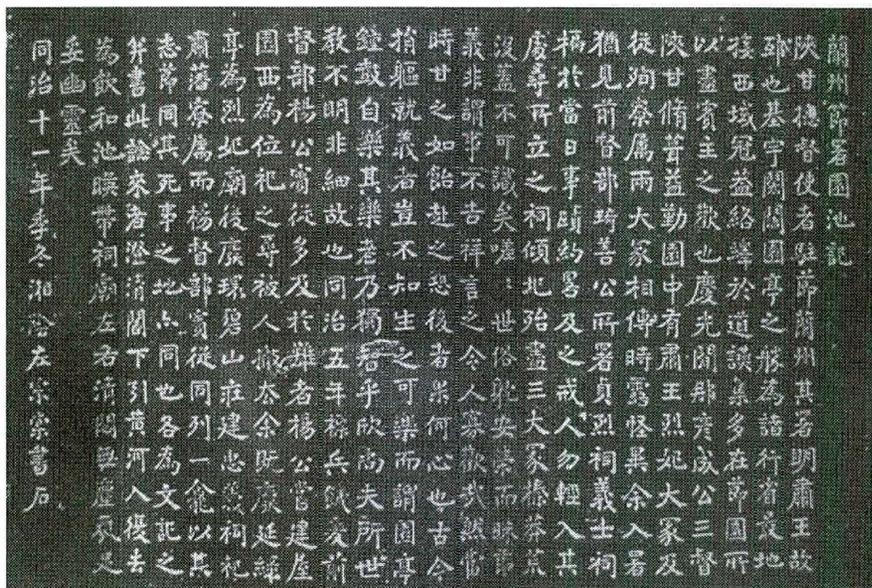
节园为明肃王府后花园，清乾隆年间，因陕甘总督驻节肃王府，故称节园。园内亭台楼榭、花木葱郁，风景十分优美。陕甘总督左宗棠开风气之先，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定期开放督署节园，任市民游览，成为兰州第一个为老百姓开放的官方花园，为兰州公园的滥觞。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左宗棠在节园作有一篇《兰州节署园池记》，文中对节园的历史与景物做了介绍。全文如下：

兰州节署园池记

陕甘总督使者驻节兰州，其署明肃王故邸也。基宇闳开，园亭之胜为诸行省最。地接西域，冠盖络绎于道，宴集多在节园，所以尽宾主之欢也。庆光间，那彦成公三督陕甘，修葺益勤。园中有肃王烈妃大冢及从殉寮属两大冢，相传时露怪异。余入署犹见前督部琦善公所署贞烈祠、义士祠匾，于当日事迹约略及之，戒人勿轻入其处。寻所立之祠倾圮殆尽。三大冢榛莽荒没，盖不可识矣！嗟嗟世俗枕安荣而昧节义，非谓事不吉祥，言之令人寡欢哉！然当时甘之如饴赴之恐后者果何心也？古今捐躯就义者岂不知生之可乐，而谓园亭钟鼓自乐其乐者乃独智乎！欣尚失所世教不明非细故也。同治五年标兵饥变，前督部杨公宾从多及于难者，杨公尝建屋园西为位祀之，寻被人





左宗棠《兰州节署园池记》拓片

撤去。余既废延绿亭为烈妃庙，复废环碧山庄建忠义祠祀肃藩察属。而杨督部宾从同列一龕以其志节同，其死事之地亦同也。各为文记之并书此，谗来者澄清阁下引黄河入复去为饮和池，映带祠庙左右清门无尘氛，足妥幽灵矣！

《兰州节署园池记》为楷书写就。左公楷书法法严谨，细察之下余味无穷，点划间似有千钧之力，用笔上形成金石气十足、结构华贵之特色。墨迹朴拙，趣味横生，予以遐想。

同年，左宗棠还命甘肃制造局（现兰通厂）制造火轮机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抽水机），通过“吸水龙”，越过水北门城墙，将黄河水汲取注入他所修建的饮和池中，“使之清，供城内居人食用”。左宗棠还在

园内“备香茗”，置“瓷碗百余”供游人解渴。“呼民取饮，则瓶、瓢、勺、罍盎之属早具，乏者，或以织柳之器来，或手掬而饮。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群熙熙然。”

据《兰州史话》一书记载：当时的抽水口就位于现在的兰州市委大门口以北的黄河边。通过清代所绘的《金城揽胜图》，还可以看到画面上绘有烟囱高耸的蒸汽机房和自堤上深入河内的抽水管。对于为何修建

饮和池，左宗棠在《与吴南屏同年书》中写道：“饮和池一篇实陇中一奇。余因全城缺水，居民艰汲，恐一旦有事，汲道断而城弗守。又浑流重浊，挟泥与沙，饮之者多愚鲁悍鸷。遂决为此。二十年后兹邦其昌乎？拓本奉寄，老人见之，将谓此件乃仿子厚也。”从这段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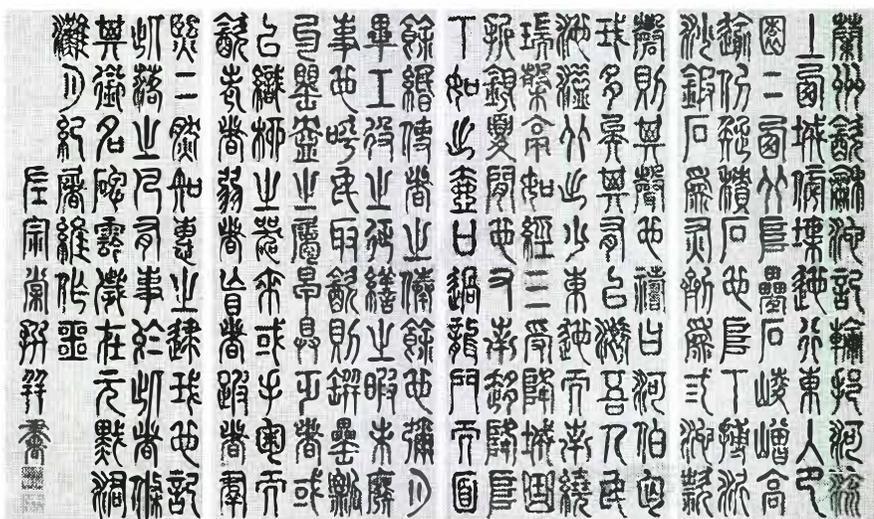


装订成册的《兰州饮和池记》

修建饮和池还有战备方面的考虑。

另外，饮和池建好后，左宗棠专门写了一篇《饮和池记》，以纪念这一“惠民工程”。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饮和池的开凿，为文襄公得意之作。他仿柳州文体，做成一篇记；又用他古茂的小篆写成刻石。”在《兰州古今碑刻》一书中，也有关于饮和池碑的记载：“碑文小篆，共14行，满行24字，碑文下少数字剥蚀。碑立省府后之节园，拓片高1.06米，宽0.67米。”可是此碑却荡然无存。从以上的文章记述中，可以看到，也许当时碑刻好后，留下了很多拓片，所以左宗棠在《与吴南屏同年书》的信中写到“拓本奉寄”。

对于修建饮和池，左宗棠也感到颇为欣慰，他模仿柳宗元的文体用篆书写了《饮和池记》，还刻石立碑，而且更眷念着二十年后兰州能否更加昌盛。可是后来这一珍贵的碑刻却因建筑电报局房屋而被铲除夷为



左宗棠篆书《兰州饮和池记》

平地，实在令人痛惜。

一日闲暇，笔者在网上发现数年前外省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拍卖有左宗棠撰写的《饮和池记》墨迹。墨迹为四条屏，纸张泛黄，但墨色黝黑、印章仍红。但不知《兰州古今碑刻》中提到的饮和池碑是否就是以此帧墨迹作为蓝本镌刻的，还是当时左公书写有多幅，而此为其中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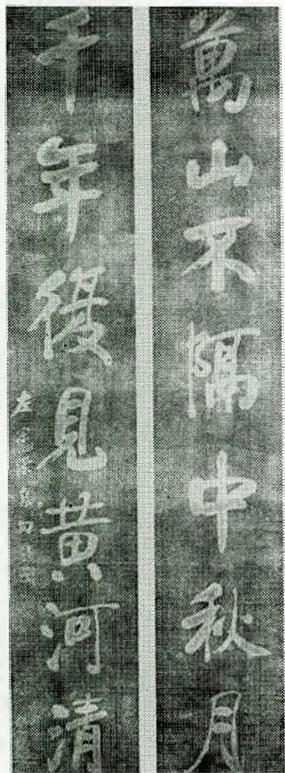
就在饮和池旁边，左宗棠还建有“澄清阁”，从阁名可以看到是指黄河水由浊变清之意。同时他还为澄清阁题写了“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的楹联。这副楹联，落款为“左宗棠集句”，并钐有两枚印章，一为“青宫太保”，一为“恪靖伯章”。可是这副楹联后来与澄清阁一起毁之无存。

但从左宗棠的落款可知，这副楹联并非左公自撰，而是集前人先贤的诗句。其中上联为苏东坡所写，出自《苏轼集》第三十卷中《和黄龙清老三首》之一：

万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传寄远书。

深密伽陀枯战笔，真诚相见问何如。

读了上联，不由使人浮想联翩，中秋之夜，一轮明月升起在东方，皎洁的月光并未因关山阻隔，而是越过崇山峻岭，将轻纱般的银辉洒向大地。当然每逢佳节，也是最令



左宗棠集联

人怀乡思亲之时。左公自 1866 年督师入甘，为了平定战乱及维护祖国疆域的完整，他运筹帷幄，6 年间，竟从未回过老家。而两年前他的贤内助周诒端又因病去世，此时此刻，望着天上的圆月，为人夫、为人父的他不由得又产生了思家念子之情。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左公的胸襟多么的宽广与不凡，而苏东坡的阴晴圆缺喜与愁则是不能与之相比拟的。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企盼黄河能够变得清澈、温顺，能够为人所用，以出现“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人们也视“黄河清”会带来幸福和祥瑞。明代罗贯中在《平山冷燕》中有诗云：“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明代程登吉编撰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有“圣人出，黄河清”之句，人们更是将黄河变清这种美好的愿望写进童谣，以期传播深远，同时甚至稍带有迷信的色彩，盼望有圣人出现，黄河会变清。另外民谣中还有“千年难见黄河清”之说。可是看着饮和池中随掬可饮的甘冽的黄河水，左公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下联“千年复见黄河清”，足见左公大有澄清黄河之志。这副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写景抒志的集联，如今已成为中华名联。可是遗憾的是，左公的这一佳作随着澄清阁而荡然无存。流萤先生在修建兰州碑林时，在 2000 年 6 月，从兰州古玩城一书画商处，以 1200 元购得这副楹联的拓片，翻刻后悬挂于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北门，供游人欣赏，从而使大家一睹左公墨迹的风采。

陇上学者张鸿汀编著的《兰州古今注》记载：“节园城北有楼曰拂云，其初为远源楼，下临黄河，故俗谓之望河楼。楼西旧有二碑，皆为

明代诗刻。崇祯末流寇陷城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天阴雨淫则血痕斑然，故所称为碧血碑也。妃墓在节园西隅，其上有亭，前数年称亭中，易亭名‘韬碧墓’，前有石刻‘贞烈遗阡’四字，左文襄公书也。”也许每一个时代衡量人生观、价值观的尺度也不一样，就像文中所说的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的碑刻被称为“碧血碑”一样，这似乎本身就涵盖有一定的褒义在其中。左宗棠作为一代封疆大吏对封建时代的一个弱女子之死同样感慨颇深，他为此修建了烈妃庙，并撰写了一篇《烈妃庙记》，以褒扬颜氏等肃王妃的节烈。

烈妃庙记

明建肃藩兰州，崇西陲也。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遣贼陷兰州，执肃世子识铨东，不屈被害。三年明亡。方贼之陷城也，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卒〔促〕率宫人二百余，由邱园上北城将投河殉。贼追急，颜氏遽以首触肃先王所书碑死。诸妃嫔宫人刎毙、缢毙、自掷毙，顷刻立尽。贼退，邦人棺殓诸妃嫔，瘞诸宫人作大冢园北。维时郡县官吏、王府、僚佐或死或遁，无以其事上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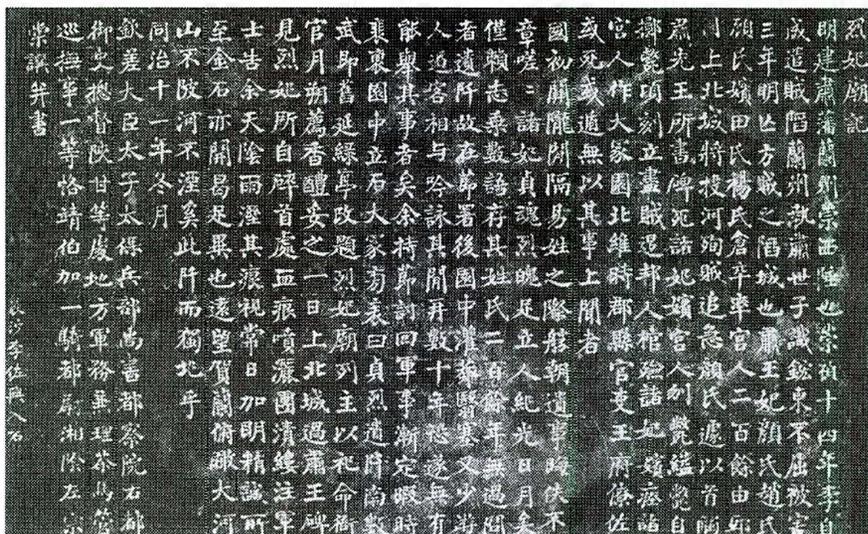
国初关陇间隔，易姓之际，胜朝遗事晦佚不章。嗟嗟！诸妃贞魂烈魄足立人纪光日月矣。仅赖志乘数语，存其姓氏二百余年无过问者。遗阡故在节署后园中，灌莽翳塞又少游人，过客相与吟咏其间，再数十年恐遂无有能举其事者矣。余持节讨回军事渐定，暇时徘徊园中，立石大冢旁，表曰“贞烈遗阡”。



南数武即旧延绿亭，改题“烈妃庙”，列主以祀，命衙官月朔荐香醴妥之。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远望贺兰，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湮，奚此阡而独圯乎！

同治十一年冬月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理茶马管巡抚事一等恪靖伯加一骑都尉湘阴左宗棠撰并书 长沙李佐兴入石



左宗棠撰书 《烈妃庙记》

左宗棠还为之撰写了一副楹联：“一杯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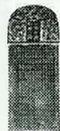
但是有人说这副对联并不是左公为韬碧墓而写。甘肃省文史馆编的《陇原鸿迹》上有一篇《左宗棠书联》写道：“清光绪五年（1879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凯旋兰州时，路过抚彝厅（今甘肃临泽）平彝堡（现板桥乡友好村），特地看望其部将陈善勇之兄陈善亨。”“陈善勇……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参加左宗棠清军入新疆，在多次战役中英勇善战，以军功从士卒升为管带。在战役中被洋枪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为昭示陈善勇的忠义、勇猛，左宗棠亲笔书联一副‘一杯荒土

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横额‘功在千秋’。陈善亨将对联镌刻在石碑上，供奉于族庙的文昌宫。”“此碑一直保存到清宣统年间，后因山洪暴发，冲毁了文昌宫，碑从此不知去向，但该村有人保存着完整的拓片。”

其中上联中的“苍梧”原是指地名，在湖南境内。典出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舜之二女洒泪而成斑竹之说。唐代刘长卿的五绝《斑竹》即写道：“苍梧千载后，斑竹对湘沅。欲识湘妃怨，枝枝满泪痕。”杜甫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也有“日斜鵬鸟人，魂断苍梧帝”句。旧有湘水之神湘君葬于苍梧之说。下联中的“碧血”典出《庄



左宗棠《碧血碑》联



子·外物》：“苾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后多指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颜氏若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生价值观来衡量，够得上是节妇烈女，因此颜、顾等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张扬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并且被当时的理学磨砺得熠熠生辉，所以被称为碧血。

文怀沙曾自认为“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其中所谓的“三十三字真经”为：“正清和，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其中“孔子尚正气”是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而绵延两千余年。到了清朝晚期，左宗棠作为中兴名臣，一代封疆大吏，虽统兵百万，戎马倥偬，但他本色是儒士。既为儒士，当然也崇尚一个“正”字。

弘扬、崇尚“正”，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儒家也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做人准则，这也是立人之基。左宗棠当然也恪守这一准则，后来他官居高位，但却清廉一生。他不仅分文不取薪俸以外的钱财，即使分内的薪俸收入，除少部分被寄回赡养家小，大部分仍被他用于公事。光绪初年，正当左宗棠宵衣旰食，调兵遣将，指挥平定新疆之战时，又逢陕甘大旱，他拿出薪俸捐给受灾地区。他驻节兰州时，为了巩固城防，指挥部下修缮兰州堞楼，而所需材料费用同样是他用自己的薪俸支付。上善若水。作为一位正直的、具有正义感的人还要有善心、仁爱之心。左宗棠关心民瘼。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学治要言》《四书五经》

《种棉十要》等等，分发各地，指导百姓发展经济，加强生产。

正，还要体现在正义的方面。中亚浩罕汗国的一名舞师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悍然侵犯我国新疆。就在我西北边疆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廷当中甚至有人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补为海防之用。但左宗棠据理力争，表现了寸土不让的爱国情怀，打响了一场正义的反侵略保卫战。他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以及作为南方人对地理环境的不适应，如风沙的肆虐、天气的奇寒，却毅然异榛（抬棺材）出征，挥师前进。最终击败了阿古柏，收复了失地，确保了祖国疆域的完整。

左宗棠崇尚“正”，更多的是从他遗留下的墨迹中反映出来的。左宗棠虽过着“誓扫匈奴不顾身”的军旅生涯，但闲暇时仍以挥毫泼墨自娱。他真草隶篆兼擅，行书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稍参何绍基、李阳冰，而不矜姿作势。他崇尚“正”，故多写“正”。在西安碑林就珍藏有一通左公的手泽碑刻“天地正气”，今观之，字迹凝重肃然，有人说，这幅字见证了左公的浩然正气。

另外，在兰州市工人文化宫的西南一隅，也矗立着一通左公的墨迹碑刻，这就是左宗棠篆书《正气歌》碑。这通碑刻与西安碑林中的那块碑遥相呼应。左公虽各体兼擅，但尤精篆书。他所作篆书点画粗细均匀、结体匀称，正如“笔底龙蛇走篆虫，胸中豪气贯长虹”。

《正气歌》原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想必也受到左公的景仰，所以他手书了《正气歌》，并勒碑上石。可是此碑由于石质不是太好，碑料为兰州近郊的砂页岩，民间又称为油酥饼子石。因此风化严重，碑上字迹漫漶。如今仅存右上角和左下角数



十个字，随着时光的推移，后来者也许连这数十个字也看不到，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数年前，国内的一些大型拍卖会上，曾有《正气歌》碑刻初成时的拓片见拍，价格已高达数千元，足见人们对左公的崇敬和对其墨迹的喜爱。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们的确该重温先贤的诗句，以养浩然正气。但是，我们首先是否该对这通集左公精神与墨迹于一身的碑刻进行有效保护了，否则如此珍贵的文物也将消失殆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终年74岁。因左宗棠在陇上民众心中有崇高的地位，当左公病逝噩耗传至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左宗棠病逝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令在左宗棠出生地湖南及他立功的省份建祠。次年，甘肃遵敕在兰州府文庙东侧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头上称“左公祠”。兰州除修建左公祠外，还将兰州城的西关大街命名为“宗棠路”，将兰州城的西稍城门命名为“宗棠门”。抗战时期为了军事运输，将今之民主西路和白银路一起称为“国际运输联络线”。民国31年（1942年），为纪念左宗棠，将之又命名为“左公东西路”。



乡贤遗墨

彭泽的真贋书法

彭泽（1459年—1530年）是兰州理学家段坚的外孙，初名郦，后改为泽，字济物，早岁号敬修子，晚号幸庵。其先祖江西卢陵人，高祖彭成，元末归附朱元璋，因功升为飞熊卫副千户、武略将军，后调陕西兰州卫后千户所，遂定居于兰州。曾祖彭斌、祖彭瑄、父彭錠，四世皆诰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彭泽幼年由外祖父段坚发蒙，曾在庄严寺苦读，并题壁“坚忍”以自勉，明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

彭泽故居位于兰州东关（今兰州市庆阳路东端）路南，20世纪50

年代初尚保存完整。大门坐南向北，为一典型的兰州四合院建筑。据说大门的门楣上有彭泽手书的“诗礼传家”四字，墨迹朴拙茂密。进大门后正面为一影壁，全部用精雕细刻、磨砖对缝镶合的融合多种砖雕工艺的部件构成。上部有一斗三拱仿木建筑及蝙蝠、戟、如意等砖雕图案。其蝙蝠的蝠与“福”谐音，戟与“吉”谐音。

转过影壁后，即可见坐南朝北的厅房五间，明间六柱，廊檐深远，原为四门八窗，后来改建的痕迹明显。东西厢房各五间，院内有砖雕看墙四处，紧邻大门西边的看墙镌彩带缠绕的大笔一支，仅笔头长达 20



彭泽墓志铭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厘米，比例协调匀称，并有祥云两朵。象征着大笔如椽的文人之家。西看墙锈戟一柄，象征手握重兵，乃文武双全之家。可是彭泽故居在1995年拓宽庆阳路时被拆除。

据《明史》记载：“泽体干修伟，腰带十二围，大音声，与人语若叱咤。”明正德年间，霸州人刘惠、赵鏊等跟随刘六、刘七起义，官军镇压连遭失败。朝廷命令彭泽与咸宁伯仇钺军务，前往讨伐。彭泽军纪严明，作战勇敢，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屡战屡胜。

彭泽之所以吏治清明，严以自律，也许与他父亲彭锭的教诲有关。弘治十三年（1500年），彭泽任徽州知府。他女儿在兰州将要出嫁，彭泽为其置数十件漆器作为嫁妆，派人送回。其父彭锭得知后，怒将所购的漆器全部烧毁，并徒步到徽州。彭泽得知老父前来，惊慌之中出衙迎接，并示意从人代背其父行李。彭锭怒斥道：“我能背数千里，你不能背数步吗？”进入衙内，



彭泽墨迹



彭泽墨迹

彭泽跪拜请安，彭锭提杖就打，打完后，背起行李昂然西归。

彭泽是一代文武全才的名臣，别具儒将的风范，因此他的书法也自成一派，雄健潇洒、酣畅淋漓。他随外祖父段坚读书时，曾题“坚忍”二字以自勉，后来这两个字也成为他的座右铭。在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内珍藏有彭泽所写“坚苦”两字，墨色如漆，敦厚沉稳，落款“辛庵”，并钤印“辛庵彭泽”白文印和“柱国御史大夫”朱文印，引首还钤有一枚闲章“家在兰山一水间”。

另外，在兰州坊间还曾流传着一幅彭泽的墨迹，内容为唐代诗人李白《王右军》一诗中最后两句：“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落款为“成化七年秋七月彭泽书”。并钤有两枚正方形小印，一为“辛庵彭泽”，另一为“柱国御史大夫”。这幅墨迹中落款“成化七年”即1471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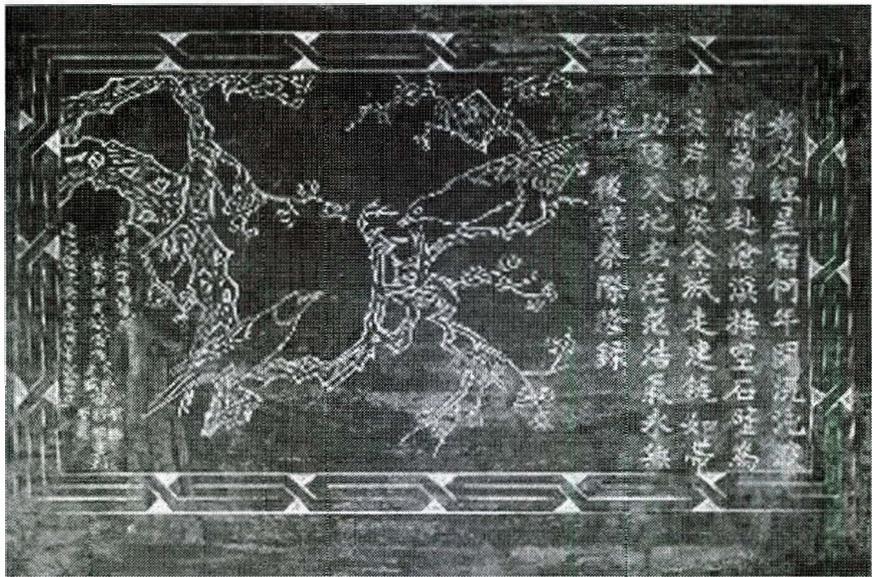
彭泽生于 1459 年，即明天顺三年。试想，当时彭泽仅 12 岁，是否可写出如此书法作品，还官擢“柱国御史大夫”，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邹应龙的《喜鹊闹梅图》

慕少堂在《甘宁青史略》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杀，首级传到兰州，悬挂在东门城楼。少年邹应龙放学后，见杨继盛双目闪动，就作揖说：“先生请瞑目吧，为先生报仇的责任在小子身上。”话刚完，杨即瞑目。

后来，民间又将这个故事进一步演绎，成为戏剧《打严嵩》的主要元素。

据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皋兰县志》载：“兵部侍郎邹应龙祖坟在皋



邹应龙的《喜鹊闹梅图》



兰山赵家寺侧，凡九世。”同时该志书还指出：“邹应龙读书处在五泉山西麓，旧有楼，今废。”从这两点记载可以得出，邹应龙为兰州人，可是《明史·邹应龙传》则说邹应龙是陕西长安人，不知何因？原来，陕甘同属西北，明代兰州属于临洮府，而临洮府又归陕西，所以《明史》修纂者张廷玉附会为邹应龙为陕西长安人。

邹应龙，字云卿，号兰谷，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他无畏强权弹劾权奸严嵩及其子严世蕃贪赃枉法、吞没军饷、卖官鬻爵等种种行径，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如臣有一语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严）嵩父子”，终使祸害嘉靖朝的奸贼严嵩、严世蕃父子覆没。

邹应龙能文能武，明隆庆初，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将无法无天的黔国公沐朝弼绳之以法。万历初，统兵平定铁索箐叛乱。而且他为官清廉，《明史》中指出，其卒后“遗田不及数亩，遗址不过数楹”。在皋兰县中心乡兰沟村一户人家中藏有一副邹应龙画像，邹应龙头戴乌纱，身穿明代朝服，坐于虎皮太师椅上，威严庄重，目光炯炯，令人肃然起敬。此画像为清代中期丹青高手所复绘。原画有清早期鲁人牛运震、钱塘人徐杞的题诗。其中徐杞写有“父子济恶声烜赫，沈杨踵戮谁更论。先生嫉邪本素性，要将忠悃酬枫宸”等诗句。可惜原画已佚。

其著作结集为《邹中丞集》，但早已散失，仅有《弹劾严世蕃父子疏》传世。邹应龙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但他鲜有书画作品传世。

虽然邹应龙留传下来的书画墨迹极少，但是有一幅他画的《喜鹊闹梅图》的残碑却保留了下来，这通碑的拓片就保存在临夏州档案馆里。拓片的右侧以楷书题：

考《水经》：星宿何年开混沌，波澜万里赴沧溟。插空石壁为长岸，绝塞金城走建瓴。如带功随天地老，茫茫浩气永无停。后学蔡际隆录。

蔡际隆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兰州贡生。只见碑中部画喜鹊闹梅，一株屈曲横斜的梅树，虬枝盘旋，梅花或绽蕊怒放，或含苞欲开，婀娜多姿，似有阵阵馨香袭来。碑左下角落款：

嘉靖三年（1524年）应龙写。后裔邹国斌偕侄文畛、法盛，孙裕祖、学聪、学明重刊。道光癸未（1823年）桂月中浣吉旦。

张思温先生对此拓片还有一段跋文：

此碑原在兰州黄河北岸金城关之西金山寺壁上。本世纪五十年代，天水冯国瑞字仲翔见之，以告兰州王烜字著明，曾拓以寄先质生公一本，冯、王二先生并有题咏。“文革”中失之，不知即是此幅耶？邹应龙，字兰谷，兰州人。明嘉靖朝官御史时，奏劾奸相严嵩之子世蕃贪贿非法诸款，世蕃终被诛死，嵩亦被革职。应龙遂以直谏闻名当世，明名有传。殁葬关中。今兰州金山寺及金城关均已拆除无存，此刻石亦不知下落。蔡际隆所录之诗，当亦邹之所作。乡贤遗墨，仅此而已，

宜珍存之。

1988年4月26日河州张思温阅后附识

原来在1951年的一天，冯国瑞登临兰州金山寺时，发现悬楼背后石窟中，嵌一方石碑，碑中部画一株梅树。一般碑刻图画较少，这引起了冯国瑞极大的兴趣，经过仔细辨认，原来是邹应龙所画之梅，冯不禁大喜。高兴之余，冯国瑞偕兰州进士、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王烜一起考察，并墨拓数本传世。张思温题跋的那幅《喜鹊闹梅图》即有可能是冯、王二位拓后寄给张思温的父亲张质生的。

王烜还写了一首长诗记之：

老梅一株屈曲垂，邹公手笔留芳徽。
寒山古庙掩重扉，百余年来识者稀。
天水冯子考古师，芒鞋每好访藓碑。
相将蹑屐危楼上，偶然寻得愿不违。
拂尘剔蔽手摩拓，顿令韞玉生光辉。
邹公风节世所希，批鳞敢犯殿廷威。
奋简一击贼胆破，闲写红梅映赐绯。
云初珍重寿金石，至今长与山崔巍。
分携画本笑相谢，兹游喜得不空归。
黄流浩浩动逸兴，更向卷首读遗诗。



王烜感叹邹氏作品“百余年来识者稀”，多亏“天水冯子考古师”的发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冯国瑞意犹未尽，不久又邀西北图书馆馆长顾问刘国钧、省政协委员王新令等宴饮金山寺，共赏邹应龙《画梅诗碑》，深夜始归。冯国瑞并赋五言长诗记其盛：

万山东横流，一舸脱疾箭。雉堞落深谷，梵宇穿飞栈。
石角镰东向，霞尾愁西咽。石级最上层，俯睇发微眩。
形势俨金焦，仿佛南徐岸。夕阳诚可惜，皓魄坐待换。
薄雾抹棱开，不旋踵而散。一道陡通明，洒金织澄练。
波卷光生棱，空喧气扑散。寥寥数点烟，夭矫倏忽见。
放言无所拘，惊鸿怀明艳。美人秋水隔，爱才皆左袒。
呼灯指幽窟，明贤迹初辨。句足钐山敌，秀润老莲健。
异彩照山河，风节天下先。怱愿同来人，幸不愧直谏。
寺门受月多，立久有余恋。

诗中“万山”四句写黄河东流，羊皮筏子疾驰，兰州城池低矮，以及金山寺各处悬楼由栈道连通的情景。“石角”即突出尖锐之石，形容金山寺西侧的石峰如飞镰掷向东面。“霞尾”描写长长的晚霞染红龙尾山与金城关之间黄河咽喉地带，令人产生一缕淡淡的愁绪。“石级”四句写金山寺之高峻险要，犹如镇江（南徐）金山、焦山之天险。“夕阳”十句，写夜幕徐降，皓月当头，黄河浮光掠影的美景。最后介入主

题，秉烛入石窟观赏《梅花诗碑》，赞许邹应龙的奏疏令严嵩（钤山）丧胆，所画梅花有明代画家陈老莲秀润劲健的风格。

只可惜 1967 年金山寺古建筑拆毁，此碑消失。但是通过这通残碑的拓片，邹氏直谏的风节光照山河，令后人景仰。

颜刚甫酷爱颜体书法

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被称为“复圣”。颜回为春秋时期鲁国人，可是在西北兰州却生活着一支颜回的后裔。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是在明朝初年，颜回的第十五世孙颜胜，随大将徐达西征，以军功被明太祖朱元璋赐为武德将军，遂落籍兰州城南，世人称之为颜家沟。

明朝末年，李自成的部下贺锦率部攻克兰州，为免受辱，肃王妃颜氏以头触碑而死，颜氏即为颜胜后裔。在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为褒扬她这种节烈行为，后人将其以首所触之碑称为“碧血碑”。到了民国年间，这支颜氏后裔还出了一位学者，这就是颜刚甫先生。

颜刚甫（1895 年—1979 年），名永桢，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颜学重则是颜回七十一世孙，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廪生，在兰州设帐授徒 30 余年。颜刚甫 7 岁入父亲所设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5 岁入皋兰县兴文社两等小学堂，19 岁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当时刘尔炘、杨思、慕少堂等进士、举人正在该校任教，他们提倡修身养性，严谨的书法训练当然是必修课。颜刚甫就是在这里，受到儒家先贤的良好教育，欣赏到大量的碑帖拓片。他如醉如痴地临池不辍。颜刚甫毕业后，先后在南园小学、皋兰县立高等小学当教员。



1939年，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普事业的先驱袁翰青被调到兰州，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并担任馆长。袁翰青甫来兰州，把建馆宗旨确定为普及民众科学教育。他不仅组织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科普文章，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撰写。而这些科普文章，他则请善于书法的颜刚甫先生用工整的楷书抄写，作为壁报定期贴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一时万人空巷，争睹壁报。大家既学习了科学知识，又欣赏到端庄俊秀且法度谨严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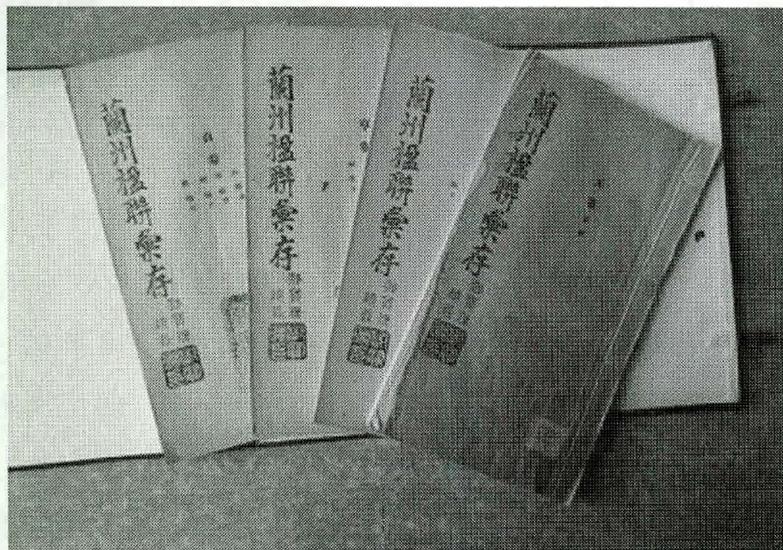
颜刚甫一生钟爱颜体书法，他遍临颜鲁公的《多宝塔感应碑》《麻姑仙坛记》《东方朔画像赞》《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墨迹，汲取其中精髓，经终日临摹，深得其妙。笔者曾在省图书馆得见其于1953年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兰州八景丛集》。该集字字精爽，细腻而不纤弱，秀美却无散漫之处，法度严谨又绝不呆板，读之令人赏心悦目。《兰州八景丛集》是颜刚甫参考各种版本和不同朝代的兰州地方志，摘录本地及外地诗人吟兰诗词，撰写成介绍兰州八景的文章，于1933年连载于《西北日报》，定名为《兰州八景丛集》。1953年，西北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主任李



颜刚甫撰书对联

华堂嘱颜刚甫用毛笔将其旧稿抄录一份，以庋藏于馆内，供读者查阅。颜刚甫抄录完毕后，题七绝一首于后：“廿年旧稿今重抄，野菜那能供酒肴？不惜衰朽承雅命，任人参阅任人嘲。”

其实颜刚甫不光注重书法的练习，他认为书法只是一种载体，故而更注重对各类知识的汲取与学习。他终日伏案，孜孜以读，其涉猎范围广博，包括兰州地方名胜研究、兰州方言研究、兰州物候学研究、甘肃楹联及诗词的搜集整理、甘肃经济资料的整理、经学研究等。当然最值得后人称颂的莫过于他对兰州楹联的搜集整理。他不辞辛劳地登临名山，遍游寺庙，出入城内衙署、学校、会馆，辨认名碑古碣，随时抄录楹联匾额，经过整理，编辑为集楹联大成的《兰州楹联汇存》（简称《汇存》）。《汇存》共收录清代、民国年间兰州寺庙衙署书院会馆名胜



颜刚甫《兰州楹联汇存》

楹联 1206 副，以《易经》的卦辞“元、亨、利、贞”四字为卷次，故 4 卷 4 册。元卷收录名胜楹联；亨卷收录公署、会馆、祠堂楹联；利卷收录庵堂、道观、佛寺、庙宇楹联；贞卷收录园亭、春联、寿联、挽联、杂联。这样编排，归类得当，井然有序。每副完整抄录联语、匾额及题跋，借此可以考知撰联者、书法者的行止与故实。并详考每处寺庙衙署名胜等的沿革特点及今址，并附有掌故、逸事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兰州城建、宗教、文化等史料，因此贡献颇巨。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颜刚甫先生于 1953 年为龙尾山梨花馆自撰的楹联：“龙山游罢且归去；玉雨洒时应再来。”这副楹联颇具颜体的风范，其用笔浑厚强劲，迢峻紧结，峭拔奋张饶有筋骨，亦有锋芒，正如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评价颜鲁公之书法：“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

胡宝耕印坛玉臂手

胡宝耕（约 1853 年—1933 年），湖北武昌人，字志笠，号楚渔、黄鹤楼矶头亦渔翁。他出身诗礼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擅诗文，长于金石文字训诂，尤精书法、篆刻。早年随父迁居宁夏中卫县（其父时任中卫县知县）。他性情清高、耿介，行侠仗义，洒脱不群，时人称“胡少爷”。胡宝耕曾追随孙中山、黄兴，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后因事败露，遭清朝政府缉捕，于清朝末年只身逃抵兰州，在辕门街开店治印（今中央广场东南角，原“北京包子馆”旧址），号“辑雅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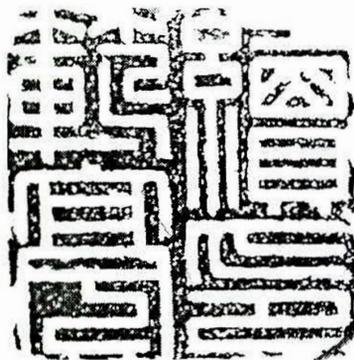
宝耕先生学养深厚，治印气息古雅，意蕴醇厚，擅长秦汉印风，亦以甲骨、金文乃至魏碑入印；执刀如笔，正锋紧持，直送缓结，旋切入石；印作意趣典雅，富有书卷气。其金石篆刻为艺苑贤达、社会名流所激赏，上门求印者络绎不绝，艺林人士往往以得胡氏一印为快事。每遇慕名登门求印者，先生皆精心刻制，一一酬答。当时范振绪、续范亭、马麟等名流、政要的印章皆出自胡宝耕之手。

胡宝耕性情豁达，乐交友朋，辄与刘尔炘等文人雅士诗书唱酬，乐此不疲。20世纪20年代，在一个初秋的上午，胡宝耕外出会友，其弟子李泽夫在“辑雅山房”独守门店。此时，来了一位一袭青布长衫、发蓄髯髻、谈吐儒雅、气度不凡的学者模样的长者。他得知胡先生出门在外，便从兜襟中掏出两方上好的寿山冻石交给李泽夫，说道：“我叫刘果斋（刘尔炘号果斋），你师父回来后交给他，请他为我刻两方图章。这我先前给他说好过。”随后给宝耕先生留了一个便条，便扬长而去。因李泽夫此前未见过他，不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大人”。后来，胡宝耕先生很快将印精心刻好并亲自送与刘尔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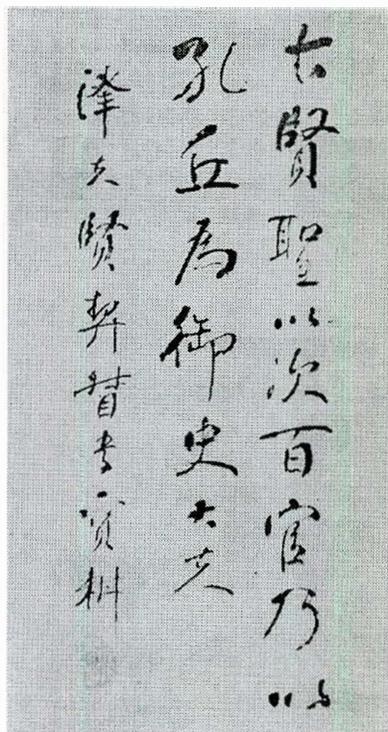
胡宝耕先生治印态度严谨，对印石选择很是讲究，非质地温润之上等印材，绝不轻易奏刀。所刻印章字口既深且陡，拓出印蜕刀锋毕现，生动鲜明，意味醇厚，甚是美观。兰州李时珍先生所存印谱中有一方为兰州老字号刻的公章，中间字体为北魏体，其边栏为笔画极细的二连套叠图案组成，均布于3cm×5cm的印面四周。详细观之，图案线条纤若游丝，既密又细，连续自然，浑然一体。真是难以想象，如此近乎微雕的精细线条是怎样以手工刻出来的，令人不能不佩服先生不凡的目力和

精深的刀笔功力。

胡宝耕先生书法诸体皆擅，尤精于行书、金文。行楷宗法颜鲁公，魄力雄强，结体宽博，运笔厚重。晚年喜作榜书，大笔开合，放笔直扫，枯笔飞白处精神飞动，尤显功力。金文胎息于散氏盘、毛公鼎，摄墨蹲锋，朴茂典雅，气象浑穆，意态奇异。其时，陇上字号匾额楹联多出其手。他为老字号“庆仁堂”国药店所题匾额，20世纪70年代尚悬挂于张掖路旧址（原甘肃省警备区对面）。此匾黑底金字，“庆仁堂”擘窠大字，笔力遒劲，神完气足，深得平原精蕴。过路识者往往驻足观看，不忍离去。可惜后因店面拆迁，此匾不知落于何处，今日难再一睹



胡宝耕篆刻



胡宝耕墨迹

其貌，殊感憾甚。

胡宝耕先生少负奇怀，习文之余精研武术，志在弘扬国粹，强身振国。他少年时期便精力过人，能在六月天正午时分端视炎炎骄阳片刻，而其目力不为所伤。先生自幼年投师武当门名师，经数十年勤学苦练，及至壮年已精通武当内家各种拳剑功夫，身手不凡，尤长于技击之术。花甲之年功夫更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与人对练起来，四五个年轻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当年被清朝官兵追捕，先生依仗多年练就的轻功，从中卫县二丈余高的城墙上纵身跃下，毫发未伤，逃出重围，免遭罹难。

胡宝耕先生一生从不轻易收徒，择徒甚严，首重品行，后察天性。徒弟上门一年内不教任何治印技术，先在家中充当杂役，观察其品行和耐心；品行端正、有灵性且能吃苦耐劳者，方才收徒施教。

李泽夫铁笔生辉

李泽夫（1905年—1987年），名福善，字泽夫，晚号遣叟。甘肃省永登县红城镇进化村人，出身贫寒，父母早逝，靠兄嫂抚养。幼年读私塾四年，后因经济拮据无力供读，辍学在家务农。16岁投师于陇上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胡宝耕先生门下学艺。从师十年，尽得胡老薪传。恩师逝世后自立门面，先后于兰州民众教育馆（原张掖路兰州晚报社旧址）、城隍庙挂牌治印维生。

20世纪30年代，李泽夫先生所刻秦汉篆印、北魏汉隶印中规中矩，精纯圆熟，通俗实用。40年代初，随着政、军、文化界人士的逐步增多和商业贸易活动的日渐繁荣，兰州地区社会文化中开始出现南北



文化交汇的现象，人们对印章文化的需求已不满足于以往平实、古板的秦汉篆印，而转向对清新典雅、风流蕴藉印风的追求。李泽夫顺迎社会文化变革之形势，开始研究以钟鼎、甲骨文入印。他克服资料缺乏、文化低的困难，竭力探索三代鼎彝碑版文字之奥秘，虚心求教于专家学者。他白天工作，晚上在油灯下刻苦钻研金石资料。有时为查清几个篆字的来源，或刻出自己满意的钟鼎文印，竟彻夜不眠，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至东方既白也不知觉。他常用的一部《六书分类》，竟被翻阅得破旧不堪，其中甘苦真是难以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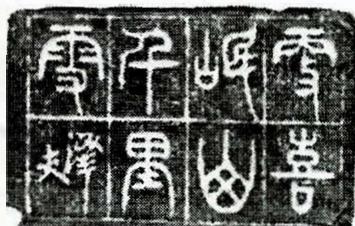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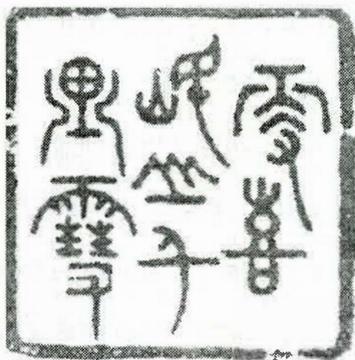
经过数年艰苦磨炼，李泽夫先生所刻钟鼎文印章别开生面、清峻典雅、朴茂大方、雅俗共赏，为艺苑贤达、社会名流所推重，也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当时山西、陕西等省金融业人士以先生功力深厚、难以仿冒，对其钟鼎文印章尤为推重，大量用于财务印鉴。常常整批订货，少则一二十方，多则上百，门庭若市，“刻”不容缓。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闻知先生篆刻技艺，特遣副官登门请李泽夫刻田黄印二方。印刻好后，李泽夫亲赴府邸面见朱绍良交印，朱对先生篆刻技艺极为赞赏，以重金谢之。

李泽夫数十年如一日，苦心孤诣，积年累月，探求籀鼎秦汉之渊源，采撷皖浙诸贤之精蕴，植根于传统，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遂形成其典雅清新、苍润秀逸、雅俗共赏的篆刻艺术风格。先生执刀如笔，切刀入石，字口既深且陡，锋芒毕现，金石味十足，极为生动传神。李泽夫治印态度极为严肃认真，先磨平印面，再设计印稿，然后反写到印面上，最后动刀。无论印石大小一律不用印床，左手握印，右手执刀，

若賢課延見心喜
 此為早子色善慶
 庶官完孫而欲不
 乎心即家起人可
 近存釁門淫見生
 焉君纛和心不妒
 國無順報是嫉心
 守餘雖左真善人
 外自得殮女疑賈
 安命至不匿恐禍
 順樂繼而用便不
 時讀書餘暗是生
 聽志左歡箭大喜
 天為左歡箭大喜
 為人聖國禍戾幸

錄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
 壬戌仲秋澤夫書於金城

李泽夫墨迹



李泽夫篆刻

由浅入深，从容运刀。每一方印章都要反复修改，甚至磨平重刻，直到自己完全满意才交付顾客。其所刻印章印面非常平整，能在衬着玻璃的单层纸上拓出清晰的印蜕。观其作品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印底为芝麻粒状，二是边款很讲究，以黄米粒大小行书刻出，一丝不苟，看得出先生刻制全程澄心静虑，无丝毫浮躁苟且之意。得之者除欣赏印文精美外，对刻工的精、细、深、峻多有赞誉，把玩摩挲，爱不释手。20世纪60年代，陇上著名学者叶寓尘先生曾有评价云：“泽夫先生之篆刻铁笔生辉，独步当今陇原，朱文如春花舞风，白文犹寒山积雪。尤其秦汉铁线篆、浙派白文愈显儒雅蕴藉，鲜有与之比肩者，以‘印坛圣手’誉之当

不为过。”确实道出了他篆刻的深厚功力和神采意蕴。

李泽夫一生治印数量在两万方以上，大者寸许，雄浑苍厚；小者只有筷头大小，清秀雅逸；无论大小务求认真、精粹，从不马虎应付了事。由于长年刻印，左手握印虎口处和右手拇指、无名指磨出厚茧，足以见证先生为篆刻艺术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心血唯有同癖知”，当代国学大师文怀沙对先生篆刻技艺非常赞赏：“真没想到西北还有这样出色的篆刻家！”

李泽夫治印之余醉心翰墨，朝夕临池，孜孜不倦。他诸体皆擅，尤精行楷，早年力追羲、献、子昂圆通秀雅之神髓；晚年参以鲁公笔意，得其骨力。其书作苍劲朴茂、拙妍互见，惜其书名为印名所掩。

李泽夫一生清正谦和，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每逢学者方家造访则相与切磋文字、印学，互为砥砺，与魏振皆、叶寓尘、牟月秋、雪祁诸名流结为知交。先生一向奖掖后学，举荐、鼓励青年参加各项展览活动，自己却谦让少有参与其中，唯其《毛主席长征诗篆刻》八印（附边款）于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省展，以后鲁迅诗句四方人编《甘肃省书法篆刻集》。先生耄耋之年仍日作蝇楷千字，操刀恢恢不辍，其恪勤精神足可风范后学，晚年所制《文天祥正气歌刻石》六十方印（附边款）为其代表作品。

字里行间看人生

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他所著的《书概》中写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自东汉末年书法就以

艺术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沉淀出的特色，无论是端庄凝重的隶书，还是潇洒飘逸的草书，无不折射出书家的精神风貌。

马廷秀先生，字紫石，他曾给我省地方史学家张令瑄先生书写过一副对联：“立身卓尔青松操；后代声华白日悬。”这副对联为隶书写就，通观此联，古雅雄强、体态朴逸、堂宇宽博且蔚然以深之感跃然纸上。马廷秀先生之所以写出如此之好的对联，还要与其身世阅历相连，正所谓“字如其人”。

马廷秀先生为回族，1900年出生于兰州互助巷，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侵入我国。其自谓：“历经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民国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军时代和南京政府时代。”在其所著的自传体著述《百年见闻录》中，他感慨地说：“出于忧患、长于困贫、中年惶惑、老有所归。”

马廷秀先生青少年时就读于甘肃省立第一中学（今兰州一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幸得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资助，得以考入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成为兰州第一位回族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他曾聆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演讲。大学毕业后，他跻身政坛，开始为马福祥父子两代做幕僚。

因马福祥与其兄马福祿当年血溅北京正阳门，抗击八国联军对北京的侵略，所以人们都非常敬仰马福祥先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派员持亲笔信联络马福祥，当时马福祥身为北洋政府官员而不便表态，马廷秀便建议马福祥可以复函转交来人，以示对孙中山先生的问候。后来



马鸿逵又委派他去南京，亲自面见蒋介石陈述一些有关宁夏的情况。

而马廷秀先生最为辉煌的就是 1949 年解放大军挺进西北时，他以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厅长的身份同十几位厅处长代表已是一盘散沙的政府，在马鸿宾将军的率领下通电起义，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欢迎。1949 年 9 月 23 日，马廷秀作为国民党宁夏方面和谈代表之一，与解放军代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

1957 年，他被错划成右派，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在九死一生的困境中，他幸存了下来。

马廷秀先生一生道德高尚、治学严谨、为人热情仁义，晚年尤爱奖掖后学，深受人们的尊敬。

他给张令瑄先生撰写这副对联时已 85 岁高龄了。他对张令瑄先生说，他将“走”在前面了，先提前给他撰写这副挽联。这件事情表达了两位老人的豁达、开朗和幽默。张令瑄先生一目近盲，但身残志坚，一生撰写各类文史文章 200 余万字，并将其父、陇上著名学者、金石学家张鸿汀遗留下的各类稀见图书 1280 余册捐献给有关单位，甘守清贫。这副对联正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张令瑄先生的一生。如今，张先生也已作古。

对于书法，马廷秀先生早年曾临摹刘墉（字石庵）行草，字迹遒劲敦厚，晚年则多作楷隶。他曾说：“写毛笔字是很有益处的，写字时思想集中，祛除杂念，还须运气。”

现在我们来看这副对联，不难看出马廷秀先生的文化底蕴、书法功

底以及透过文字所看到的他饱经沧桑、历尽坎坷的一生，而所有这些又凝聚升华成一种“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立身处世之道。

魏振皆书法逸事

魏振皆（1889年—1974年），名继祖，别号睫巢、洞叟岩、冷岩等。其髫龄即喜书法，寻师求教，如饥似渴。那时清末翰林刘尔忻先生主讲五泉书院，名冠西北。魏振皆为学习刘先生的执笔、运笔，常为其磨墨抻纸，伺候左右。刘先生挥毫写字时，他则在一旁屏气凝神静观刘先生转折换锋的奥秘。他白天观察学习，晚上则马上予以实践。就是睡觉时，仍用手指画被进行揣摩练习，简直可以说是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种对书法的挚爱可以说伴随了他一生。魏振皆先生晚年时，有一次和书法家何裕到城关区曹家厅某处，在刚进门的地上，有一块铺地的砖石，因长时间被人踩踏，那上面形成了古朴自然的纹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原来他从中联想到书法中的线条。这不由使人想到怀素观夏云之变化、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由此可见书法家应是师法自然造化，处处留心观察生活事物，吸收优点、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书法创作中。

为了让刘尔忻先生点评指正他的书法，年少的他有一次鼓起勇气将自己的习作拿给先生看。刘先生看后颇感惊讶，没想到这个木讷拘谨的乡下少年在书法上竟达到如此水平。此后，刘尔忻先生对魏振皆青眼有加，颇为赏识和器重。凡是有请刘先生写字应酬之作，则由魏代笔。到后来，若有人请刘先生写书写牌匾对联之类，刘尔忻先生则直接推荐由



魏振皆书写。魏振皆后来在回忆青少年时这段跟随刘尔炘习书过程时，还充满感激地说：“晓岚先生是我研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更是我步入书法艺术堂奥的引路人和导师。在书法上我一开始就走正道，没有走邪路，是晓岚先生正确引导的结果。”

此后，魏振皆先生又游学京师，因“码头”的转变，他得以广结书法界名流，如李瑞清、曾农冉等人。他喜欢并钻研魏碑也许是受到这些人影响。后他又东渡日本（日本的书艺源于中国），在日本他又细心研究文字的流变，对他的书法创作大有裨益。

正因为他转益多师，从而使他的书体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当然他在用笔上也似乎与众不同。据曾见过他写字的何裕先生回忆说：“魏老在用笔上，是很有特点的。他用笔时蘸墨以后，先在砚盖上反复调墨，必使墨汁均匀含于笔毫之中。在即将行笔时，却将原来调好的圆笔，在砚盖上调成扁锋，形如刻刀。魏老自称这是他不传之秘。按我后来实践体会，这是魏老在用笔过程中，节省了一道程序。因为圆锋入纸，必按锋铺毫，既铺毫，则锋必成刻刀状。所不同的是刻刀形的笔锋直接入纸，则峻利明快。魏老行笔过程中的另一特点是侧锋入纸，按锋轻提，迅即转换为中锋。驻笔以腕外旋或以腕内旋，即成外方内圆之形。”

1951年土改时，魏振皆先生被定为开明地主，他将在兰州官园（今城关区民勤路粮站附近）的家产变卖，捐献了大量现金支持土改。然而，十分令人痛惜的是，乡政府从他家中收缴了一马车古本字帖及碑文拓片等书艺珍品，却当作“无用之物”付之一炬。要知道这些字帖拓

片得来不易，是魏先生自青少年就于北京甚至日本等地苦心搜求得来的，没想到却化作缕缕青烟，扶摇直上。

“文革”之初，省文史馆撤销后，停发了魏振皆先生的生活费，他与家人被下放原籍。他的故宅在皋兰县文山村，当地人称为“拉牌”，在征得父老同意后，他亲题“文山”作为村名，以图文风大兴、厚重如山。就在文山村东崖根，在他的屋旁，距离地面六七米的石崖上，有一个天然的洞窟。后来他请工匠又进行了开凿和整修，并在洞窟前树立了木梯。此后他就缘梯而上，在洞中练习书法、休憩、会客和兼理佛事。他还在洞窟前撰写了一副楹联：“关启门户，需要小心；上下阶梯，谨防失足。”这突出了老人谨言慎行的特点。现在他遗留下的一些书法作品落款多有“洞叟”“睫巢”等字样。当时自然灾害不断，连年歉收，备尝生活艰辛的他，仍具有盎然的童心，对生活乐观自持，表现了一个书法家穷且益坚的品性。

刘尔忻的德行励后人

1955年秋，董必武自新疆返京路过兰州，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五泉山公园，并写了一首《游兰州五泉山》五言律诗以志此行。诗中前两句为“兰州名胜地，共说五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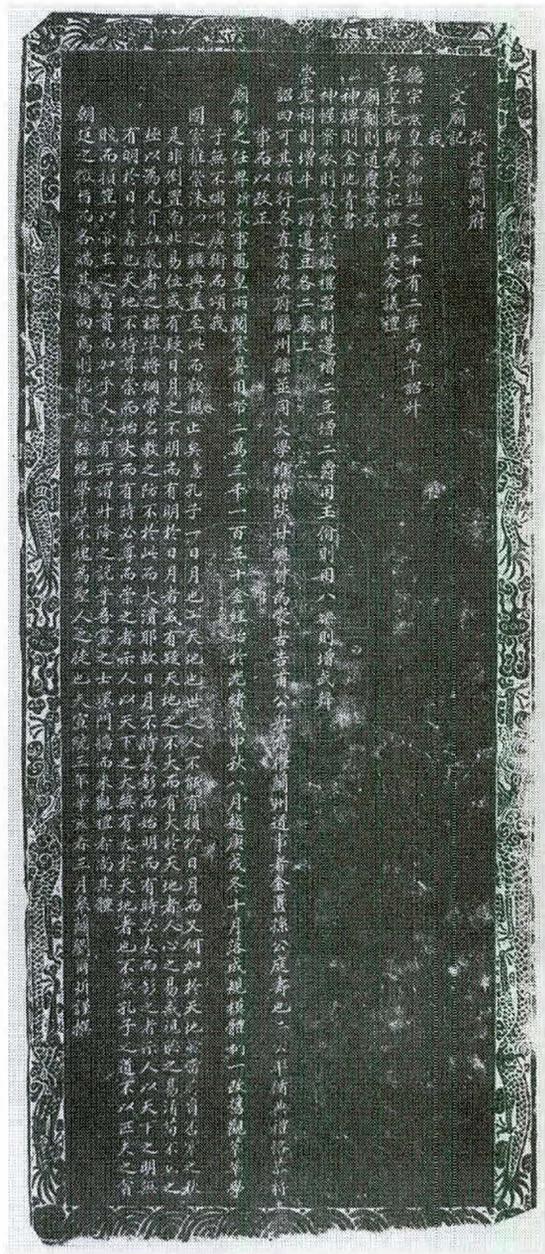
五泉山的确可以说是兰州一处绝佳的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这里山势巍峨，飞泉成瀑，溪流潺潺，树木葱茏，琳宫绀宇，参差错落，有着清静古幽的如画美景。

在五泉山的入口处，有一坐南面北的四柱三间三楼全木结构牌坊，



高 9 米，面阔 12 米，庀殿顶（四面坡顶），翘角飞檐；楼顶青砖雕甍，脊饰鸱吻。牌坊正中额枋间有“五泉山”三个隶书大字，每个字均有一米见方，上款为“辛酉冬月”四字，下款为“刘尔炘”，并钐有印章一枚。“五泉山”三字厚重古朴。书法家何裕曾说：“这三个大字气象雄伟，结体厚重，如无榜书功力，是很难达到的。”如今刘尔炘先生题写的匾额及牌坊已成为五泉山的标志性建筑。

刘尔炘先生为兰州大儒，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因募款修葺五泉山，晚年又号



刘尔炘撰书《改建兰州府文庙记》

五泉山人，祖籍陕西三原。清康熙年间，其高祖刘世英迁兰。父亲刘桐，字峰山，曾任甘肃藩司钱席二十余年，所以家道小康。刘尔炘于清同治四年（1866年）出生于兰州黄河北盐场堡，后求学于兰山书院、求古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在封建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能够做官跻身上流社会，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刘尔炘先生因博览群书，根据历代王朝更迭的特点，他已预见腐朽的大清王朝即将灭亡，所以他辞官归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地方文



刘尔炘撰书《重修皋兰县文庙记》



化和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之中。

因为五泉山在明清时屡建屡毁于天灾兵燹，到了清宣统初年，山中庙宇已颓败不堪、坍塌凋零，且互不相连。1908年，刘尔忻先生以个人名义募得白银4万余两，决定“补其旧毁，增其本元”，重修五泉山。

在修建过程中，刘尔忻先生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其中一个包工头来向刘尔忻先生汇报工程的进展，看到刘先生的一个小炕桌非常破旧，于是没过多久给他扛来一个新炕桌。但是被刘尔忻先生谢绝了。刘先生告诉他说：“虽然一个小炕桌不算什么，但是我收了它后就无法向外人说清楚。”另外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据说是马步芳的父亲马麒自青海专程来拜见刘尔忻，见刘连一张方桌都没有，就派人送来一张方桌。可是送桌人前脚一走，刘尔忻先生后脚就将桌子背到山上，改做了窗棂。据说，五泉山“卧佛殿”的匾额就是用刘尔忻先生的书案改制的。



刘尔忻撰书楹联

新修后的五泉山在殿宇楼阁、桥头洞口有楹联匾额 229 副，其中刘尔忻自撰自书 135 副。这些楹联匾额因景立意，全部抛开深奥难懂的文言文，而为生动活泼的白话文，且极富哲理性，浅显易懂。因此深为邵力子、顾颉刚等学者名流推崇称道，在劳动人民中间也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这些对联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刘尔忻先生为木制牌坊“青云梯”而撰写的对联：

高处何如低处好；
下来还比上来难。

青云梯是一座木制彩绘的三间坊楼，矗立于半山腰。人们拾级而上，气喘吁吁地走过 72 级台阶，来到近前，仰首可见一块匾额，上书“青云梯”三字，乃是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的手笔。喘息未定，目光接着往前递进，又可见一匾额，为“若登天然”四字，此则为刘尔忻所书。这两块匾额所立之处，可谓恰到好处。牌坊两侧立柱悬挂有一副楹联：“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而刘尔忻所书的这副著名的对联，则是在牌坊之阴面，也就是说它朝向山坡一侧。上山时人们不会注意到它，只有在下山时，人们才可见到这副楹联。这副楹联还有一特别之处，即它不像一般楹联立式对称悬挂于大门两侧或两边立柱上，而为横式匾额一样镶嵌于牌坊的梁上。

这副名联还受到了许多名人学者甚至是国家领导人的称赞。



1958年7月初，朱德乘坐飞机抵达兰州。当天下午，他就不顾疲劳，登临五泉山，鸟瞰市容。当朱德与随行人员拾级而上，路过“青云梯”牌坊时，看到了这副对联。朱德反复看了几遍后，若有所思地说：“这副对联意味深长啊！”

他端详了一阵后，继续拾级而上，边走边对随行人员说：“这两句话很富有哲理。本意是劝世人安贫守拙，不求上进，无所作为。其实高与低是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绝对化，要辩证地去看。比如说，晚上行军，你说在高处好，还是在低处好？如果走在山顶上，人影映着天空，易暴露目标；如果走在山下，就容易遭到敌人的伏击。这样看来，高处不安全，低处也不保险。所以，夜里行军特别是接近敌人时，最好是不高不低，在半山腰里走。”他的几句话，生动形象地讲清了高低的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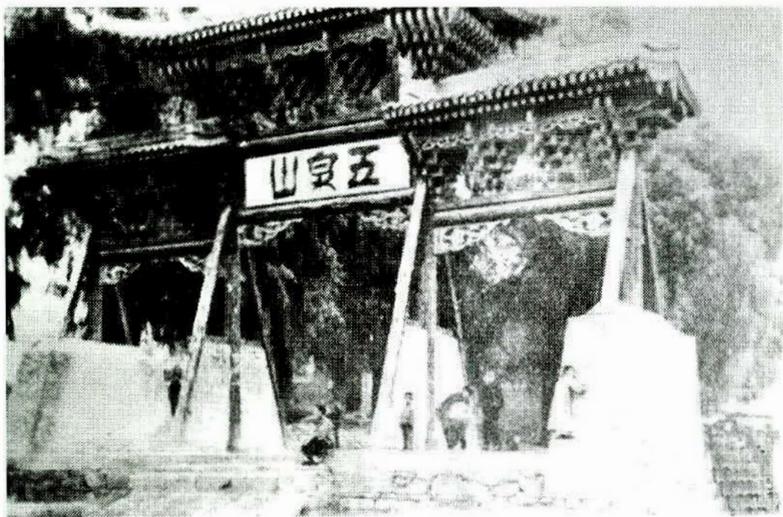
他又说：“讲到‘上来’与‘下来’，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那句流传久远的俗语‘上山容易下山难’。古人把‘下来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等等。目的就是告诫我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接触实际，了解下情，解决问题。”同行者听到这里，都频频点头，打心里钦佩朱委员长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导。

当他们一行人登上千佛阁，俯瞰市容时，朱德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站得高，看得远！王安石不是有一首《登飞来峰》的诗吗？他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话也是很有道理的。站在高处可以统揽全局，这就是高处的特点。”

在下山返回的路上，又看到那座牌坊上写的“下来还比上来难”，朱德意味深长地说：“比较起来，向上去，是攀登，总是困难一些；向下去，是后退，总要容易一些。我们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去攀登世界高峰！”

在2008年第11期《人物》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将军书法家魏传统和五泉山这副楹联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

1958年“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一些干部头脑发热追风逐浪，魏传统则始终冷静而清醒。他两次顶风前往西北调研，一路上，他看到人们都去砍树炼钢，没有人收割，粮食都烂在了地里。在他爬上兰州五泉山时，公园管理处干部请他题字，魏老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高处何如低处好；上来容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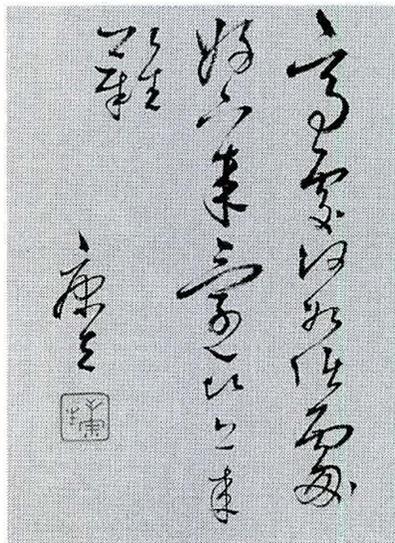


五泉山牌坊

来难。”回京后他向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汇报工作，并讲述了自己的对联。肖华主任沉吟了一下，拍着魏传统的肩膀说：“老魏，你的对联好啊，你在讲真话。”

其实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未进行详细的考证。但是，实际情况是魏传统将军确实来过兰州并登临五泉山，也曾格外关注过这副楹联。我省著名书法家徐祖蕃先生在2001年时曾对笔者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去北京，魏传统还向他谈起这副对联，并关切地询问这副对联还在不在？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位老将军、老书法家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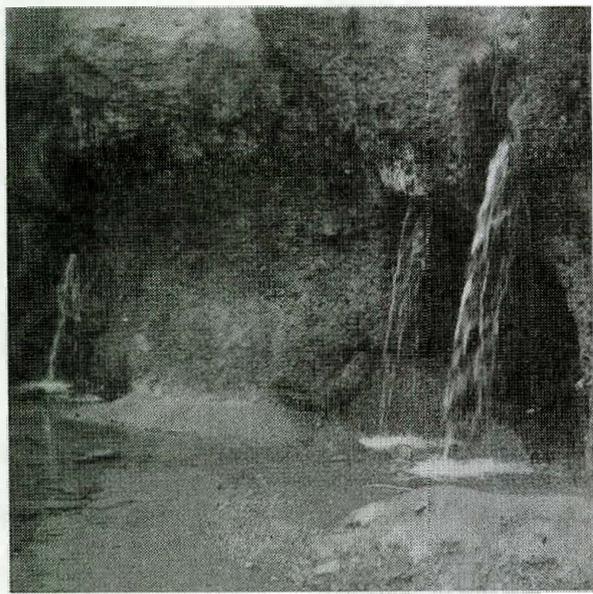
康生来兰州时，也许也见过这副楹联，他曾手抄这副楹联送给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写道：



康生所书对联

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至半年不和他讲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家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家英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五泉山顾名思义就是因山上有五眼清泉而得名。泉涌为瀑，自然别有一番景致，兰州八景之一即为“五泉飞瀑”。兰州学者颜刚甫以优美的笔触对此景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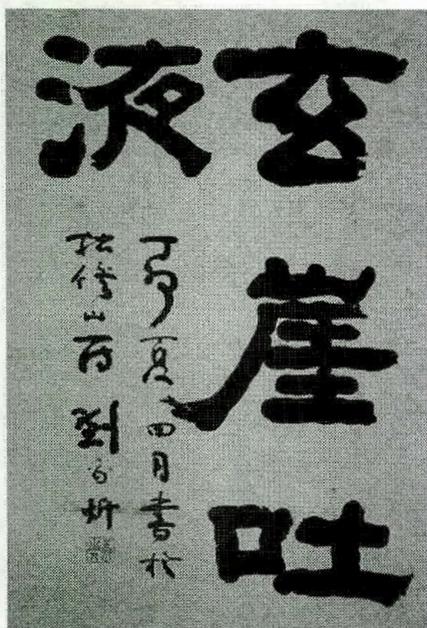
五泉山瀑布

崖悬欲坠，瀑音如吼，飞泉倒泻，声振于耳，直似“浴鹤盘空下，溅地水成珠”，崖前又有大石错落，如坐如文。崖檐滴雨如丝，游人身临其下，颇觉凉爽宜人，直似温州梅雨潭所题“瀑布半天晴亦雨，寒潭终古夏如秋”。为夏日避暑纳凉最佳之地，前人有“溪行不归去，依石弄潺湲”，又云“时来听泉响，独坐爱岩悬”。正是自然风景吸引游人留恋山水的情态。

如今在五泉山东龙口崖壁上镶嵌着的“玄崖吐液”四个古拙遒劲的隶书大字，就是刘尔炘先生于1927年写就。其中“玄”字通假于“悬”，仅这四个字就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面：清泉从悬崖石壁的缝隙中倾泻而出，飞溅起一颗颗水珠，假若迎着阳光，还可看到若隐若现的彩虹。特别是其中一个“吐”字，形象地描绘出瀑布飞流这种美的意境。

刘尔炘先生所写的“玄崖吐液”四个字，由衷地使人感叹古汉语的简洁之美，以及刘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基。这四字为隶书写就，明显可以看到先生隶书取法于石门、西狭、郾阁“三大颂”，以及汉曹全碑、史晨碑等，并融以清代皖派大师邓石如之风范，故雄浑端庄、遒丽淳质。在品评刘尔炘先生书法神韵的同时，可是这种悬崖飞瀑的景象却已不复存在，无处可寻，只给人空留下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美好只能留在回忆和想象中了。

《山海经》中有：“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这里用“绳”来形容水流很细。如果用来形容如今“玄崖吐液”下的几股细小的清泉，也很恰当。因为昔日兰州“老八景”之一的“五泉飞瀑”的壮观场面，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崖根处的“诸绳之水”，可是这也不由让我们



刘尔折墨迹



摩崖石刻“玄崖吐液”

在心里默默祈祷，这些“诸绳之水”千万可别变成“诸线之水”。

五泉山公园西侧“西龙口”长廊南端有一处形状若初上新月的砖亭，名曰“半月亭”。半月亭造型优美，其东段还有一葫芦型门。当年刘尔折修缮五泉山时，曾聘兰州名画家曹蓉江为半月亭绘有一幅《松风秋月图》，画面上 18 棵松树昂然挺立，清泉漱石有声，松间明月如盘高挂，颇有唐代诗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诗意。30 余年后，因墙皮受潮起皮，加之壁画色彩斑驳脱落，曹蓉江的侄儿曹陇丁又对壁画进行了修复。

1984 年刘尔折先生所撰书的八块碑刻《兰州五泉太昊宫记》被移置镶嵌于半月亭的后壁上。内容为：



兰州五泉太昊宫记

借山水名胜地，起点缀亭台，以表章吾陇上三古以迄有清六千余载帝制时代之圣贤豪杰以示游人。经营者阅两寒暑，募而支出者万八千四百余两。后之人春秋佳日挈提壶歌于斯、啸于斯、登临瞻眺于斯者，当有以注其精神念虑而不致入宝山空回也。

中华民国十年夏正辛酉冬十一月既望

皋兰刘尔炘五泉山人

这八块碑刻刘尔炘先生以隶书写就，字体浑厚凝重。刘尔炘先生当初在修建五泉山时，就确立了既要五泉山的亭台楼阁修建如新，使其美景如画，同时还要融入一定的人文思想，以弘扬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太昊宫原为燃灯寺，刘尔炘先生在此基础上顺沿山势由下而上建成四台殿宇：一台为回廊花园三楹砖门，至今门首题额历历在目，中为“高山仰止”，右为“奋上兴下”，左为“继往开来”，个中意蕴登临此宫此山自然明了；二台为秦子祠，主祀孔子弟子秦祖，配祀景清等 13 人；三台为壤驷子祠、石作子祠，主祀孔子弟子壤驷赤、石作蜀，配祀赵充国、张轨等 22 人；最上面四台为伏羲殿，主祀太昊伏羲氏，配祀女娲氏、黄帝轩辕氏。此外刘尔炘先生还将原萃英门旧举院内明远楼搬至五泉山，更名为“万源阁”，以奉祀周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等历代理学家。由此可见，五泉山不光以明山秀水成为兰州人休憩的好去处，它更是中华民族及陇上传统文化集结展示的一处胜地。



为了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以及赈灾济贫，为社会劳苦群众及无依无靠的人募集棉衣、棺木、医药等，从1906年到1927年，刘尔忻创办了“兰州修学社”“陇右乐善书局”“陇右实业待兴社”“全陇希社”“五泉图书馆”“丰黎义仓”“皋兰同仁局”“兴文社”等8个社会团体，称为“兰州八社”，从文化、医疗、工业等方面开启民智、改善民生。

1920年12月6日，宁夏海原发生8.5级地震，甘肃省长亲自致函刘尔忻，请其主持赈务。刘尔忻遂与高足王烜、李蔚起等人在兰州组建了“甘肃震灾筹赈处”。刘尔忻多方联系，奔走呼号，至1923年5月底，共向全国10余个省市的军政要人、救灾组织、慈善团体以及日本东京同乡会筹募捐款现银30余万两，所募款项，笔笔入账；项项支出，一一明记。分别用于急赈万余两，工赈3.3万余两，冬春零赈1.7万余两，赈济外省（陕西、直隶、江苏）、外国（俄罗斯）5000余两，拨建各县丰黎义仓基金13.1万余两。还先后刊印了两期“征信录”，将收支账目全部向社会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

1924年春，甘肃省省长公署为表彰刘尔忻办赈异常出力，特请民国大总统曹锟颁题“痾瘵在抱”匾额一方。其中《尚书·康诰》中有“恫瘝乃身”，“痾瘵在抱”这四个字也是指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里。面对如此高的奖励，刘尔忻却拒不接受，第二天就致函省长公署，请示退回奖匾。省长公署觉得刘尔忻授匾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仍将匾送给刘尔忻。刘尔忻接匾后，又再次退回，并附函说：“当初应办赈，并不是为了扬名和荣誉嘉奖，而且当省长公署调取办赈人员履历时，我就声明不受嘉奖，余不能食言，贻人笑柄。”

刘尔忻先生的信函情真意切，高风亮节可见一斑。他用实际行动矫正了追名逐利的颓风。

刘尔忻先生作为一介儒士，他认为教育可以启民智、厚人伦、滋教化，故他将教育看作终身事业。对于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刘尔忻也深深地崇敬且服膺。祭祀孔子的孔庙，也称文庙，是儒家思想的凝聚和沉淀，构成了东方文化的主题。在兰州也有两座孔庙，分别为旧址在兰州二中校园内的府文庙，和旧址在今张掖路东段路南附近的皋兰县文庙。刘尔忻先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分别为兰州府文庙和皋兰县文庙撰写了《改建兰州府文庙记》和《重修皋兰县文庙记》，彰显了先生尊师重教的思想。

民谚书画



家家音得正 户户李友桃

位于兰州市解放门以东，今临夏路西关清真大寺南侧的三眼井，据说开凿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了。兰州地下水多含卤碱，所打井水都极为苦涩，唯独三眼井的井水甘冽异常。据说，用三眼井的井水煮的羊杂碎，味道极为鲜美。三眼井凿在浅浅的一间铺面内，三个水桶打水，供给西关街车马店、饭馆、居民饮用。铺面上面镶嵌石额，镌刻“三眼井”三字，厚重遒劲，为嘉道间兰州庠生音得正所书。

音得正，字立夫，号柳庄，皋兰（今兰州）人，生卒不详。其雅善书法，《甘肃新通志·人物志》中记载：音得正“书法用力最深，初习



颜真卿，后摹赵孟頫，故婉媚之中饶有筋骨，一时榜联多出其手”。他曾为兰州关岳庙戏楼题有一联：

着意摹来，镜花水月传色相；
闲情看去，清歌妙舞绘升平。

为原曹家厅附近的皋兰书院题写了一副楹联：

汇众力以续前功，一志同心，幸得重开广厦；
原萃英而尚实学，尊贤取友，定然高步云程。

老一代兰州人崇文尚雅，家中堂屋有悬挂字画的习俗。音得正因为人谦和，老百姓极易求字，所以他与另外一位兰州书法家李友桃在当时民间流传着“家家音得正，户户李友桃”的说法，可见他们的书法在当时是名满金城。这二人的书法之所以受兰州老百姓的喜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继承了传统书法的精髓，不恣怪恣肆，不以奇、险、丑取胜。他们创作的书法作品多承袭了颜真卿、赵孟頫之笔意。颜真卿为名贯古今书坛的巨擘，又是一代忠臣，故成为引领后世楷书的“大纛”。《新唐书·颜真卿传》赞曰：“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而赵孟頫为宋朝皇族后裔，他诗书画印皆能，《元史·赵孟頫传》中称“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音、李二人因心追手摹颜、赵作字之法，故他们所书字体结体方正、端庄俊

此外，他还为兰州金山寺、药王洞等处的寺庙、道观题有匾额。其中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为金山寺山门题写的楹联为：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
信心时用何物供养；

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询问这头陀
乐意处有什么来由。

他还在旁边落款为“左幅是福州梁章钜中丞曾辑《楹联丛话》是载福州涌泉寺无名氏题弥勒佛一联，信士廖正明移挂于河北金山寺山门，属作代书”。

近年来，在兰州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出一幅李友桃的作品，内容为其写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落款为“右书唐人五截句挥笔于幸存轩之中李友桃”，钤印两枚，分别为“友桃之印”和“李伯子”。在拍卖简介中仅有“李友桃，清金城人，工书法，宗法米襄阳，有名于时”字样。

家有冷字、明画不算穷

兰州是一座移民城市，在明朝初年曾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移民潮，这主要是当时都城南京及江苏、安徽、山东、山西一带的民众，作为随侍官员、护卫、仆役等，随肃庄王移驻兰州。因此，兰州的一些生活习俗尚存明代遗风。

兰州文史学家张令瑄曾撰述：



靖远县博物馆藏冷字

兰州旧家多系明初随肃藩护卫而来之江皖人士，故习俗有同南方，院落多莳花木、善饲鱼鸟，能赏鉴字画。晚清时代，尤重视吴人冷文炜书法及满族明福绘画，二人均系甘肃老州县官数十年，而以书、画驰名当时，作品流传甚广。兰州民谚谓：“家有冷字、明画不算穷。”

其实张令瑄先生也许记忆有误，冷文炜并非吴人，而是山东胶州人。他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字彤章，号艾

西，乾隆九年（1744年）考中副贡生，历官皋兰、秦安、两当、通渭、西宁知县及秦州知府。

冷文炜在任上本着育人兴学、改善民风的宗旨，格外重视书院的建设。他常说：“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培养人才，使之专于所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冷文炜在任秦安知县时，对原鸡川书院进行修葺后，更名为“龙山书院”。

乾隆五十年（1785年），冷文炜任西宁知县时，看到书院日渐破旧，认为“讲学既无场地，安望学业之相与有成”？他便不辞劳苦地开始选择校址，积极筹建书院。当他在西宁城南发现有一座从明朝时就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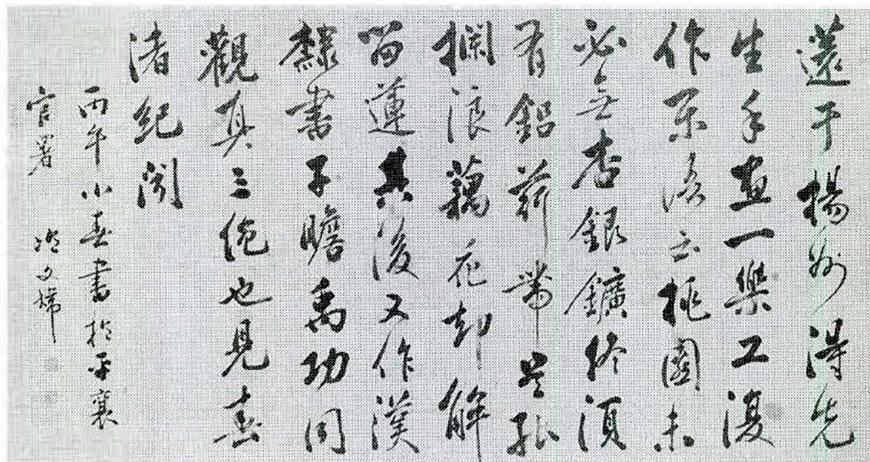
的古南寺，院落宽阔，“轩敞而深靓”时，遂下决心，要移梵宇为书斋，将古南寺改建为湟中书院的书斋房舍，后于其东辟地为射圃，建成书院，“聚诸生而考课”，招收禀、贡、童生肄业其中。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冷文炜任通渭县知县时带头捐资，在县城东南隅“养济堂”创建成立了“近圣书院”，并对考入书院的生员提出：“能学有本原，不专以记诵词章为务。”

冷文炜还工于诗词联赋，他曾在两当县任上，为当地香泉寺题有楹联：

泉脉初开，百里桑麻赏德水；神光普照，万象烟花仰慈灯。

冷文炜因参加过科举，所以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后来他又学习了《圣教序》和赵孟頫的《天冠山》帖，得其要旨，名重一时。在冷文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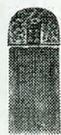
冷文炜墨迹



胶州天后宫

的老家胶州，有一座古庙宇——天后宫，天后宫门前有一座牌坊，正面上有“威镇咸孚”四个字，背面写有“海不扬波”，就出自冷文炜的手笔。据说冷文炜为写好这四个字，矢志不渝、废寝忘食地练习，光纸就用了两刀之多。书成后，果然神采焕然，熠熠生辉。一位南方书法家看到这几个字后，自愧弗如，竟然幽幽愤懑成疾。冷文炜后来与胶州的另几位大儒法若真、高凤翰、林凤官、柯劭忞并称为“胶东五凤”，并在胶州西门立有“五凤牌坊”。他的儿子紘玉、绣瑞传其家学，也能书画。冷文炜在西宁任上时，其子冷紘玉随侍在侧。书院建成后，在众人的请求下，学问渊通的冷紘玉被聘为湟中书院的第一任主讲。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1778年），冷紘玉考中三甲九十五名进士。

兰州民谚中“明画”的“明”则是指乾隆年间官甘肃知县的满人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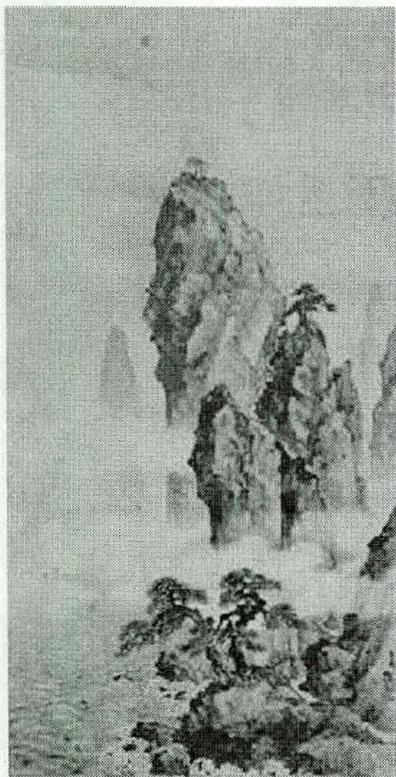
福。明福，字瑞仙，号间山，雪峰道人。他擅长指画，即以手指代替传统绘画工具中的毛笔蘸墨作画，别有一种特殊趣味和技巧。他曾指画一幅长达一丈、高三尺余的《索扈特投诚图》长卷。图中人物栩栩如生，驰犬射雁，携女载妇，抱幼驮老，或加鞭策马，或回头瞭望，在茫茫大漠中行进，不远处是玉门关关隘，欣欣然远离沙俄回归祖国。该图再现了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



岷县博物馆藏明福人物画

摆脱沙俄统治，跋涉万里回归大清的场面。图中大小人物 32 人，骆驼、马匹、猎犬无数。因“长泰命案”被贬伊犁的长洲顾琰，见到此图后，为之赋长歌。清末满族学者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中记载，明福还画有一幅《兰山图》，“皆可宝爱”。

另外，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域图志》系明福所绘且著文，成书于乾隆年间。图册分为两部分，前部分为文字说明，后部分为图画。明福在《西域图志》前部分的自序中写道：“余系凉州驻防，丁丑岁随中堂舒征口外，己卯回凉后，于甲申重携眷驻防伊犁，塞外驰驱者十有三。新疆风土人情，颇经阅历，嗣后随保公绘新疆地輿图，所有未经之



明福所绘山水

处亦俱游览焉。余早日微晓画意，因绘成一则十二幅，其各处山川道路、土产、人物、各国实记，及本朝所设官兵俱略备于其中。非敢言工也，特为欲知其地者聊图一大略云耳。”从自序中可以知道，明福曾随舒赫德平定准噶尔，又在伊犁驻防，还参与了绘制新疆地域图。可见他对当时西域的风土人情应该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当然，他在自序中还谦虚地说“非敢言工也”，只是“特为欲知其地者聊图一大略云耳”。

因冷文炜的字和明福的画在当时即已名重当时，加之这二人皆宦游陇上，留下来的字画较少，所以价钱自然较贵。因此，在当时有民谚“家有冷字、明画不算穷”。

名画遗兰

WENHUA QINGSHU

兰州最早的书法墨迹

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对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一座东汉墓葬进行考古挖掘，发现墓中有两具尸骨；另外还清理出两千多枚“剪轮五铢”和“东汉五铢”钱币，白金饼一枚，银簪一枚，漆妆奁等文物十多样，铜盆、铜壶、铜镜等铜器六件。特别是还出土了3块直径17.5厘米的圆形纸片，除一块破碎外，其余两块保存完整，其中最完整的一块有40余字，异常清晰；另一块有霉烂，约有60余字。纸面上均沁有绿色的铜锈，圆形纸的边缘有不少破损，但留有明显或不甚明显的剪刀剪过的痕迹，若不是在原物上亲眼所见，只看印刷品是很难看出这些剪痕的。



东汉纸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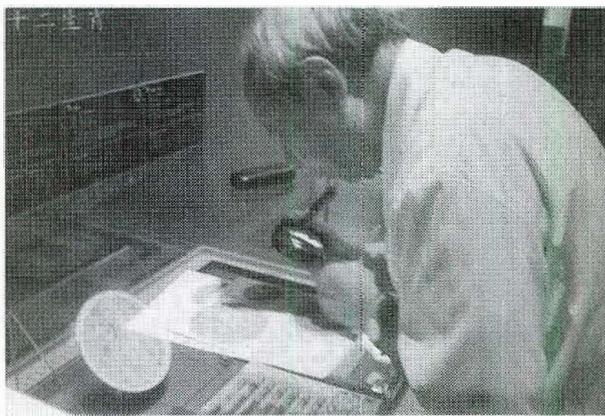
东汉纸 二

这三块纸原叠放在一面铜镜中，为镜囊的衬垫物。这些出土的墨迹纸，后来也被称为“伏龙坪纸”，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墨迹纸之一，同时也是“蔡伦纸”的实物证据。这些纸张出土后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柔软有韧性。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为麻、草和树皮等植物纤维，强光透视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较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这些记载基本与蔡伦造纸使用植物纤维的方法相同，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符。

“伏龙坪纸”的出土，是当时我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同时对于兰州历史沿革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综观我国的书法发展史，可以看到，书法艺术正是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一路跌宕起伏地发展而来。西汉以前的书法作品大多是镂刻于金石之上，而此次出土的东汉纸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上面的墨书字迹，从中又可窥见文字的演变及书法发展的脉络，这些字迹可谓真正来自于民间

的书法艺术。纸上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可辨识者有“妇悉履……医药……奈何当奈何……”等几个字。专家认为，文字内容与死者身份、经



王伯敏正在对东汉纸进行研究

历无直接联系，似是信函或药方，后作为垫衬物而被剪成圆形置于铜镜囊中的。

我国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诗人王伯敏先生认为，剪刀在汉代早已被广泛应用，而这三块东汉圆形纸上留下的剪痕，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情况。正因为是模糊、不清楚的，倒反而合乎逻辑地揭示这是东汉人留下的剪痕。圆形的、留有剪刀痕的剪纸品，虽然称不上是一件剪纸艺术品，但足以见证“汉代是剪纸产生的时代”。这一见证，使中国剪纸史上的“剪纸产生”之说有了实质性的圆满答复。在中国民间剪纸史上，说“汉代是剪纸产生的时代”，终于有了剪纸实物的出现。

留在陇原的孔子像

孔子，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开创的儒家学说早已融进了民族的起伏兴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

生有异质，学无常师。尝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苾弘，学琴于师襄。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景仰，历代就不断神话孔子，将孔子传说为“四十九表”，即反首、龟背、隆鼻、骈齿等，后来人们将孔子画像简括为七露：嘴露齿、眼露睛、鼻露孔、耳露窿，奇丑无比，这也表明后人寄托在孔子身上的是“仁”与“礼”，而并非“相”与“貌”。孔子诞生于曲阜鲁源村，在曲阜东南 30 公里的地方有座尼丘山，加之孔子在家中行二，所以其父叔梁纥为其取名为丘，字仲尼。后来为避孔子圣讳，尼丘山改名为尼山。

公元前 479 年 4 月 11 日，孔子病逝。鲁哀公感到有点悲凉，就写了几句悼词以表哀思。第二年，鲁哀公又下令把孔子生前居住的三间房子改为孔子的祀庙。这便是最早、最原始的孔庙。

孔子的学生曾子会画画，他画了一张孔子像来寄托对老师的哀思。这也是最早的孔子像。以后的孔像就是在曾子所绘的基础上演化来的。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社会达到了空前繁荣，汉武帝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采纳了博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并波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而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也被尊为“圣人”“至圣先师”。

除曲阜原为孔子故宅的孔庙外，各地也纷纷建起了孔庙，以祭祀孔子。到了唐代，太宗诏州县皆建孔庙。《旧唐书·礼仪志》载：“高祖武德二年（619 年），国子立孔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封孔子为文宣王，故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为与“武庙”（关、岳庙）相对应，称孔庙为文庙。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对祀典社庙的祭祀十分严格。当时尽管各地建有文庙，但为了巩固统治，统一思想，在这方面又有着严格的规定，即除了皇帝敕准外，任何地方官员不得从事添修和装饰。因此，在文庙的建筑艺术上，一般殿宇规模都比较宏大，雕刻彩绘的艺术品较少，以示师道尊严崇高之意。

相传最早的孔子像是东汉元嘉元年（151年）武梁祠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图》。到了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画有《孔颜二圣像》。在曲阜的孔庙圣迹殿，北宋时增加了相传临摹的顾恺之所绘的“先圣画像”，习称“夫子小影”，据说“小影”在孔子像中最真，最接近孔子原貌。

其实谁也没有见过孔圣人究竟长得什么样，他的学生颜回称其“威而不猛”，据说孔子身材魁伟，当时被称为“长人”。关于孔子的形象，我们只能从《论语》和《史记》中得到关于孔子的简短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的描述。而后世流传的孔子像大都以“画圣”之称的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孔子像为蓝本。在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帧《孔子像》的拓片，相传为吴道子所绘。原石在四川南溪，刻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11月1日。此帧《孔子像》裱轴装，拓片长194厘米，宽62.1厘米，画像以白描线条勒刻上石，线条明快，碑精拓细。在拓片的左下方题有“吴道子笔”字样，在碑的上端题有“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16字，这取自于明代陈凤吾的《孔子赞》，原文为“道冠古今，德侔天地，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统承义皇，源启沫泗，报功报德，百王崇祀”。由此可见，此碑刻应不早于明代。



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像拓片

此幅画像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孔子的形象，他身躯稍微前倾，表现了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德行，两手相握，手背向外，腰带佩剑，表明一代圣人文武皆娴。

历史上除了东晋顾恺之的《孔颜二圣像》、唐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司寇像》外，其他各朝代一些著名画家也都绘过孔子像，如南唐董源的《孔子哭虞丘子》、南宋李公麟的《孔见萇弘》和马远的《孔子像》。

其中马远所绘的《孔子像》为绢本，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画像中

孔子拱手而立，沉静肃穆，似乎若有所思，神态极为传神。特别是全图采用秃笔写衣纹，孔子所着长袍又用钉头鼠尾法，线条长而劲利，寥寥数笔即形神毕现。

孔子为至圣先师，是读书人所景仰的偶像，所以一直为历代读书人、士大夫所描绘、祭拜，直到清代乃至民国依然如此。在西安碑林就有一块清代孔子像的碑刻，此碑为清代果亲王（允礼）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送达赖喇嘛还西藏，路经西安时在碑林立石。碑额有篆书“至圣先师像”，碑刻上的孔子头戴发冠，浓眉长须，特别是额头上的三道皱纹更增添孔子的慈祥仁和和温文尔雅。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马远绘孔子像

在《刘尔炘书法集》中有一幅刘尔炘先生题于元代画家赵孟頫所画孔子像的墨迹，内容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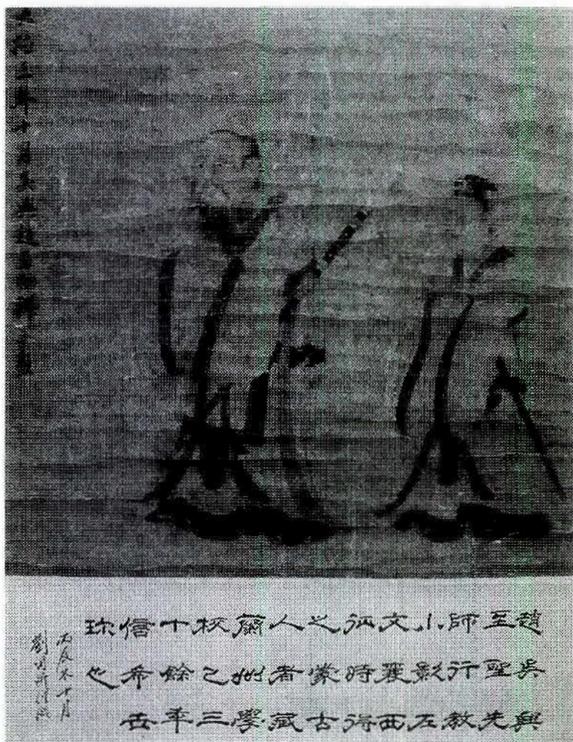
赵吴兴《至圣先师行教小影》，左文襄西征时，得之蒙古人者。藏兰州学校已三十余年，信希〔稀〕世珍也。

丙辰冬十月 刘尔炘谨识

文中所提及的赵吴兴，即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因其出生



西安碑林所藏清代孔子画像拓片



赵孟頫画刘尔忻题跋的《至圣先师行教小影》

于吴兴（今浙江湖州），故又别号赵吴兴。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可见其艺术成就。这幅图刘尔忻题跋中写到“左文襄西征时，得之蒙古人者”。左文襄即左宗棠，刘尔忻题跋落款时间为“丙辰冬十月”，也就是1916年，但左宗棠得画已是30多年前，大概也就是清同治、光绪年间。赵孟頫的这幅画左侧有落款为“大德三年十月吴兴赵孟頫拜手画”。大德三年为1299年，此画虽历经700余年，但“赵氏子昂”的印记依然鲜红清晰。图中所画孔子腰悬佩剑，躬身作揖施礼。身后侍立一人，似为书童。

几千年来孔子在中国人心中几乎渲染上了神话的色彩，因此一人心中一个孔子，所以不必拘泥于一种形象。但无论如何我们尊崇孔子是为了传承他的思想精髓，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论，经过数千年的打磨，已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光芒，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无促进作用。

张大千所绘《青灯课子图》

范振绪（1872年—1960年）是清末甘肃名进士，字禹勤，号东雪老人，又号太和山民，祖籍为甘肃省靖远县。其出身于商缙之家，其父范万选，清同治中经商于北京，故其出生于北京。范振绪幼年就读私塾于京，9岁时父亲病故，则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其贤母娄太夫人有孟母之德，卓有见识，教子有方，督课其兄弟三人甚严。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



范振绪字禹勤，号东雪老人，又号太和山民，祖籍甘肃靖远县。其父范万选，清同治中经商于北京，故其出生于北京。范振绪幼年就读私塾于京，九岁时父亲病故，则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其贤母娄太夫人有孟母之德，卓有见识，教子有方，督课其兄弟三人甚严。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

范振绪字禹勤，号东雪老人，又号太和山民，祖籍甘肃靖远县。其父范万选，清同治中经商于北京，故其出生于北京。范振绪幼年就读私塾于京，九岁时父亲病故，则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其贤母娄太夫人有孟母之德，卓有见识，教子有方，督课其兄弟三人甚严。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

范振绪字禹勤，号东雪老人，又号太和山民，祖籍甘肃靖远县。其父范万选，清同治中经商于北京，故其出生于北京。范振绪幼年就读私塾于京，九岁时父亲病故，则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其贤母娄太夫人有孟母之德，卓有见识，教子有方，督课其兄弟三人甚严。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癸卯科进士，初任工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

回国后，范振绪历经了宦海沉浮，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1936年，他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41年，国画大师张大千西去敦煌，途经武威。他们在武威相遇，一见如故。因范振绪要比张大千年长27岁，又因张大千的老师曾熙与范振绪为同榜进士，故大千先生尊称范为“禹老、师宗、禹丈”。张大千曾为范振绪作诗云：“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螟。”因二人志趣相投，范振绪不顾年高，陪同张大千前往敦煌。

他们在敦煌莫高窟考察、编号、临摹。闲暇时，范常流涕回忆其幼年在京苦学，感念母亲教诲之恩。张大千闻之也颇为动容，就为范振绪先生绘了一幅《青灯课子图》。

这幅画卷从左端起笔，绘有山石、池塘，池塘中水波不兴。依次往



《青灯课子图》

右则绘有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树木掩映的三层小楼一幢，环境深邃幽静，风景旖旎。小楼窗户敞启，可见娄太夫人在灯下正督课三子。娄太夫人神韵慈霭，她与一子面窗而立，似在背诵先贤佳作。另两子则伏案苦读。这幅《青灯课子图》山水、人物皆绘，当为大千先生精品佳作，当然更给范老幼年苦读以及对母亲的怀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寄托。

在画的左端大千先生还题词云：

巍巍怀清台，高节重彤史。百世播流风，唯母良足企。范公幽介士，清华知所以。欧阳泂岗文，千秋嗟并美。昔共先师李与曾，英年挟笔动觚梭。黄尘海水清庙屋，公为生民谢不能。小子年来须亦白，李公曾公墓木拱。西来叩谒登堂上，容颜稚子健曳踵。人前每颂白华诗，树静风摇泣罔极。永忆高堂寸草心，百年留照丹青色。肃穆拜公命，载笔为斯图。明贤唯有母，在昔慰醇醅。癸未秋应禹勤道长命，谨写娄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

蜀郡后学张爱

在张大千的题跋之后还有曹蕴鉴题词：

轧轧机声激〔彻〕夜鸣，慈亲训子望成名。果然平地一声响，三击龙门浪始生。

寅愚侄曹蕴鉴拜题



另有张寒杉题词：

禹勤老学长八秩高年，海内灵光，与余相别五十年矣，白头重见，喜可知也。顷由京归来，出示伯母娄太夫人青灯课子图一卷，图为友人大风（指张大千的大风堂）所绘，敬书短句，藉记仰赞。画笔清苍仰大风，画中喜见一灯红；文章华国灵光迥，灯下书声是此翁。旦暮承平在眼前，三星列曜照诸天；沉喑五十年间事，清浅蓬山沧〔沧〕海田。

张寒杉敬题 壬辰冬西安寓斋

张寒杉原名张靖，字寒杉，号仲民，别号金筑村民、木鸡散人、传砚庵主人、梅影万树庵主人等。陕西咸阳人，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贵阳。张靖先生一生精于书画、文史、诗词、金石。早年受业于杨守敬先生，留学日本时与宋教仁为同学，与陈师曾是好友。他擅长写绘花卉，偶作山水、人物，皆栩栩有生气。张靖所做梅花、山茶、水仙、牡丹等，构思巧妙，笔力沉着。其精于书法，篆书作品以石鼓文为宗，隶书取法于石门颂，魏碑得力于石门铭，晚年书写以行草为主。1969年在西安与世长辞。

通过这幅具有史料性的画作，我们知道了范老之所以青年时代金榜题名，以及后来诗、书、画传神的造诣，都与他幼年时的苦学是分不开的。同时，也看到他奉母至孝，认为自己所做出的一切都与慈母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直至垂暮之年，他还总是“人前每颂白华诗”，并深

感“树静风摇泣罔极”，这也是他为报“三春晖”的内心真诚的表白。

1960年，范振绪在临终前数日，在兰州市南昌路故宅中，委托夫人杜郁文将其珍藏的宋徽宗《山水图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以及他所绘的《祁连山色长卷》和这幅张大千所做的《青灯课子图》捐献给国家珍藏。如今这幅珍贵的画作就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高一涵为郭维屏画作题跋

“卖水夫，卖水夫，终日挑水黄河头；朔风凛冽天方晓，万里寒波卷雪流；枯树梦寒鸦，荻港眠沙鸥；两桶满盛天地泪，双肩担尽古今愁……”这是陇上诗人、画家裴慎目睹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水客子”悲惨生活有感而发所写的一首《卖水谣》。可是尽管一些卖水夫家境贫寒，却在含辛茹苦中培养出一些优秀的子女，其中郭维屏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郭维屏出身于甘肃武山县一个贫寒家庭，窘困的生活像寒冬一样令人战栗。为寻找到一丝冬日暖阳，他们举家逃荒到了兰州，做生意既无本钱又无长技，于是其父仅以一根扁担两只水桶作为本钱，开始了卖水生涯，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就这样在贫寒中供他上了兰州贫儿小学、皋兰高等小学堂、兰州第一师范。

郭维屏体会到家庭生活的艰辛和父亲供他上学的不易，通过刻苦努力学习，加之天赋异禀，他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殷切期望。1920年，他18岁时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成为甘肃赴外省学习的少数官费生之一。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继续深造。



郭维屏酷爱翰墨丹青，曾在大学期间师从傅抱石、高剑峰等名家，而且还与何香凝、于右任、张大千等大家切磋画艺。在武昌、北京期间，郭维屏一边上学，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创作字画出售。别人上大学，需要家里寄生活费。而郭维屏靠鬻画不仅支付了自己的生活、学习费用，还经常寄钱给家中，赡养父母双亲。



书法家徐祖蕃 1963 年为郭维屏作漫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创办于 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当时已更名为北平师范大学，为避日寇燹火，辗转西迁，于 1941 年底自陕西城固迁往兰州。当时已在甘肃学院和省参议会任职的郭维屏，和校长李蒸一起在兰州勘察地址，使得开创了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先河的北平师范大学，最终确定以兰州黄河北的十里店作为新校址，这就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195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将于第二年举行的“八一”建军节 30 周年，向全国征集美术作品。郭维屏会同范振绪、马文江、吴绍镛、郝进贤、米瑛等画家共同创作了一幅长达 3 丈 6 尺的长卷——《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该长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既描绘

了祖国壮丽的河山，更歌颂了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郭维屏曾绘有一幅斑斓猛虎：虎从危石险涧中健步跨过，并龇牙咆哮，声震山谷；老虎毛皮鲜亮，骨气内蕴；周围所绘危石险绝，衬托着猛虎不为困境所阻隔，天地任我游的豪迈气势。郭维屏题款为：“不据山河据平地，天地为之久低昂。”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西洋画中只有签名，而没有题款或题跋之说，概因为书写与绘画工具之不便。而传统中国画则提倡“书画同源”“以书入画”，即在画幅上挥毫写字或作诗，这就需要有一个天然基础：绘画、写字使用的工具皆是毛笔。在画面上题写诗文，不仅有助于补充和深化绘画的意境，成为画家借以表达感情、抒发个性、增强绘画艺术感染力的途径，同时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诗文、书法和绘画相结合，历来被称为“三美”和“三绝”，这也是中国画普遍追求的艺术境界。

好画要有好的题跋。曾任甘宁青监察使的高一涵在这幅画上题跋：

苍天何故生猛虎，金睛眈眈钩爪舞。炳然蔚为大人仪，却攫肉血恣吞吐。明月沉山万壑冥，南风呼啸一林腥。在山尚可庇藜藿，出柙翻使祸生灵。而今谁是神箭手，为我引弓扫群丑。不然惟祝皇天速使变麒麟，生物生草不入口，表瑞含仁居效藪。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安徽六安人，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早年在北京大学期间，他曾与陈独秀一同编办《新青年》，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从1931年开始，高一涵开始了宦海生涯，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首批监察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监察院两湖（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甘宁青（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直到1947年3月。



郭维屏画虎，高一涵题跋

当年张大千自敦煌临摹壁画返回兰州时，即住在高一涵家中。想必郭维屏这幅画上的题跋，亦是作于当时吧。

杨虎城墨迹留兰

在2013年举办的嘉德第33期拍卖会上，一件杨虎城将军写给国民党元老梁寒操的楷书墨迹，估价仅为8千至1.2万元，可是经过激烈的

竞拍，最后竟以 264.5 万元成交。从中可见人们对这位爱国将领的景仰和爱戴。

杨虎城，1893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幼名长久，被称为“久娃”，参加革命活动后，自己起名为忠祥，字虎城。史称杨虎城为“刀客”出身，据《陕西省志》记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关山镇今属阎良区）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 3 尺，宽不到 2 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故群众称之为刀客。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辛亥革命以后，刀客逐渐销声匿迹。”

杨虎城幼时家境贫寒，仅读过两年私塾，便为人佣工。所以他取得的文化知识全靠后来自修得来。他写给梁寒操的这件书法作品仅 14 个字，内容为“千顷澄波黄叔度；一时文采阮元瑜”，但是却章法严谨，布局合理。作品落款为“廿四年冬书应均默先生 弟杨虎城”，钤白文“杨虎城印”。

因陕、甘相邻，地域的邻近使得两省交往特别是高

千頃澄波黃叔
度一時文采阮
元瑜

均默先生

弟楊虎城



廿四年冬書應

被拍卖的杨虎城墨迹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撷萃



层的交往颇频繁，所以甘肃也留有杨虎城将军的一些墨迹。兰州历史文化研究者杨楠曾收藏有一帧杨虎城将军赠予俞方皋的相片。俞方皋（1893年—1981年），字九如，兰州沙井驿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任国民军第十三军参谋长、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俞方皋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特派员。而杨虎城于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们大概就是在此时产生交集。杨虎城将军送给俞方皋的这帧照片，与1993年发行的杨虎城将军100周年诞辰纪念邮票中的主图案颇为相似，均为杨虎城将军身穿戎装、气宇轩昂的立像。相片右侧有杨虎城楷书题写“九如吾兄 惠存”，左侧落款“杨虎城敬赠”字样。

此外，杨虎城将军还给时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著名的金石学家张



杨虎城照片



1993年发行的《杨虎城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维先生鸿雁往来，畅叙心绪，探讨时局。

张维（1890年—1950年）又名张国钧，字维之，别号鸿汀，甘肃省临洮县人，清宣统己酉科（1909年）拔贡，授学部书记官。早年参加同盟会，历任甘肃通志馆副馆长、《甘肃通志稿》总纂、甘肃省参议会议长等。其中在1932年3月11日，杨虎城将军给张维写来一封信，内容如下：

鸿汀仁兄勋鉴：驿程修阻，晤教末由。企慕之忱，与时俱积辰维，鼎祺集祐，履纒延釐，引睇商云，曷胜藻颂。斌丞回陕，藉悉磐才展布，硕望增隆，言念荃劳，至深钦佩。倭奴暴横，国步艰难，沪战延长，外交棘手，全会决策，仍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际此一发危机，胥赖同心努力，共拯国难。比者行都在洛，西北地方益关重要。尚祈硕画规度，悉力筹维，以纾国难。虎城不敏，愿共勉之。兹因斌丞西上之便，特泐芜函，藉候兴居，顺颂勋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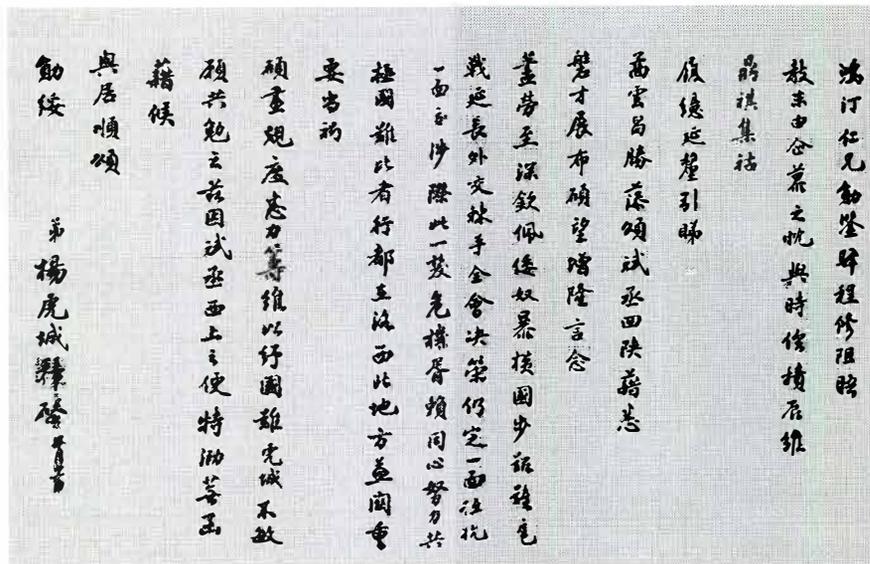
弟杨虎城拜启 三月十一日

杨虎城将军信中提到的杜斌丞（1888年—1947年），原名丕功，字斌丞，陕西榆林米脂人。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侵占东北，觊觎中华，杨虎城将军为抗日救国，主张西北大联合，他委派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联络，杜回陕后向杨虎城汇报了此次甘肃之行。杨得知张维在甘肃威望颇著，且致力于学术研究，所以称赞张维“硕望增隆，言念



荻劳，至深钦佩”。另外，1932年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因受日寇的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届二中全会提出，临时迁都洛阳，将洛阳定为“行都”，所以杨虎城指出“比者行都在洛，西北地方益关重要”。正因西北地方益关重要，所以希望张维“硕画规度，悉力筹维，以纾国难”。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虎城将军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为了国家的安危，并且希望“一发危机，胥赖同心努力”。

杨虎城将军的这封信函以行楷字体写就，通篇流畅通达，无任何涂改痕迹，在信的落款处钤有朱文“杨虎城印”。乍看此信，绝想不到其为“刀客”出身，因为这封信用词谦恭，摘翰振藻，且笔法严谨又不失生动气韵，锋棱婉转，进退裕如。杨虎城将军这一通两页的信札，左下侧有竖印的“西安绥靖公署”字样。如今这封珍贵的信函就珍藏在甘肃



杨虎城致张维信札

省图书馆。此外，杨虎城留在甘肃的墨迹还有一副楹联，那就是他为渭源的霸陵桥题写的：“鸟鼠溯灵源，雪浪云涛，东行汇泾洩黄河，函关紫气；陇秦资利涉，月环虹跨，西望是金城杨柳，玉塞葡萄。”从杨虎城将军留下的墨迹、楹联可以看出，其也可堪称“一代儒将”。

于敏中夫妇的书与画

传说乾隆皇帝的一个女儿，聪明伶俐、端庄俊秀，深受乾隆帝的宠爱，只是脸上长了一颗黑痣，后经相师说这“主灾”，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赫的人家才能“免灾”。乾隆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府才是世代公认的大贵族。可是孔氏乃汉人，当时有满汉不通婚的禁令。于是乾隆想出一个办法，就把这个女儿送到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家里，做于敏中的干女儿，更名为“于珊兰”。这样，公主就“成为”汉人，名正言顺地嫁给了孔子第七十二代嫡孙衍圣公孔宪培。现在，到过山东曲阜

孔林的人都会看到，除孔子墓外，还有几座墓饰规格较高、比较有气派的墓，其中在孔子墓东北有一个豪华墓坊，名为“于氏坊”，这就是乾隆女儿的坟墓。其实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足可见于敏中身居高位，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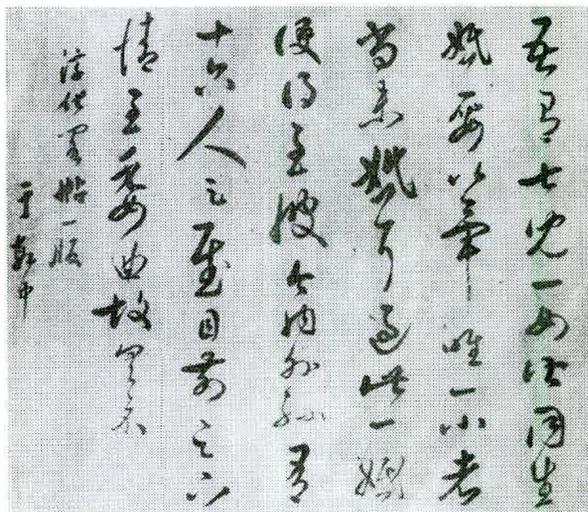
于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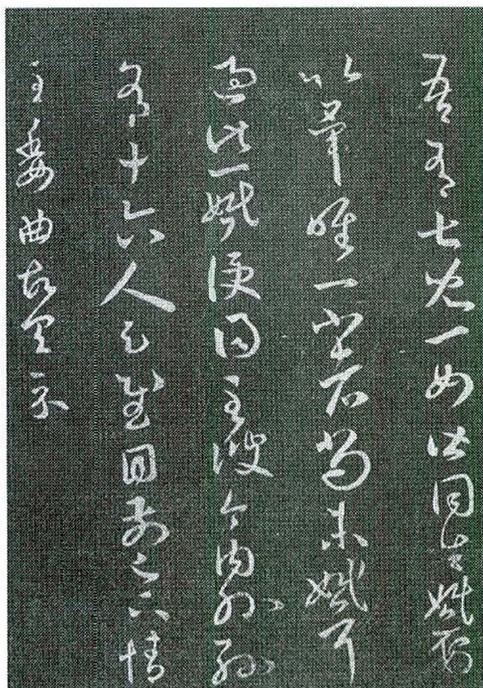
金声玉振

城关碑刻墨迹摹本





于敏中临《儿女帖》



《儿女帖》

于敏中何许人也？于敏中（1714年—1780年），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重棠。其在清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考中状元，时年23岁，可谓春风得意，坦途一片。因其诗文书画的才华，颇受乾隆帝的赏识，屡屡擢升。乾隆十五年（1750年）入上书房，一度升迁到内阁学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任军机大臣，成为乾隆的股肱大臣。于敏中能以汉人的身份成为清廷的高官，其能力和手段都是不可低估的。乾隆三十年（1765年），于敏中又任户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于敏中因平定金川受到乾隆帝的褒奖，除了赏赐黄马褂之外，还命人为其画像一帧悬挂于紫光阁上。

甘肃收藏家、画家邱希高在其出版的《明清百名进士墨迹》一书中收录有一幅于敏中临摹王羲之《儿女帖》的墨迹。《儿女帖》又名《同生帖》，是王羲之《十七帖》丛帖第十九通尺牍，王羲之以草书写给他的朋友益州刺史周抚。内容为：“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王羲之在帖中叙及他共有七儿一女，一待小儿王献之办完婚事，就可去益州见老朋友周抚，并游历蜀地。

于敏中的这幅临摹作品落款极简洁，只有“淳化阁帖一版”六个字和署名。对于临帖，清代书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先能察，后能拟。察进一分，拟近一分；拟近一分，察进一分，终身不复止。然察总在拟之先。”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意在笔先，字居心后”。我们品评于敏中所临《儿女帖》全篇结构，丝毫看不出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可谓气、韵、神俱佳。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出其扎实书法功底线条痕迹之



美。观其笔势，如涓涓流水，似淙淙小溪，恰似魏晋时从茂林深山间缓缓流出，惬意而畅达。或许正因其书法的才华才使乾隆帝对其青眼有加。

于敏中权倾一时，因此引来一些下级官吏的逢迎、献媚。昭槿《啸亭杂录》一书中写道：于敏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时，翰林等无不奔走其门下。有一名汪姓探花，让其妻曹氏拜于敏中的妾为干妈。于敏中一死，人走茶凉。这位探花见梁瑶峰掌权，又命其妻拜梁为义父，还馈赠梁珊瑚朝珠。后来纪晓岚作诗讽刺：“昔曾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父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牟尼”即朝珠，据说冬日上早朝时，这位探花妻子怕“干爹”挂上这串冰冷的朝珠，就先在自己怀中焐热，故“探来犹带乳花香”。

其实这位探花妻子所拜的干妈为于敏中的小妾俞光蕙。俞光蕙（？—1750年），字滋兰，海盐人。清康熙间户部侍郎俞兆晟孙女。《国朝画征续录》记载：“（俞光蕙）年七岁写折枝花于壁，其祖见而异之。长受业于陈书，自是画益进，笔致清颖古秀，布置大雅。”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从中可以看到俞光蕙“长受业于陈书”。陈书（1660年—1736年），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南楼老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她善画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用笔类陈道复而飘逸过之。山水人物亦擅长，间绘观音、佛像等。陈书早年丧夫，家境清寒，后以卖画自给。陈书虽为女流，但可称得上画品人品俱优，她待客热情周到，有时家里拿不出钱，只好典了衣服招待客人。《清稗类钞》中有记载：“陈太夫人节艺双绝，鬻画养亲。”于敏中扈从乾隆皇帝第二次巡

幸江南时，乾隆闻知嘉兴著名女书画家陈书知书工画，就想欣赏陈书的画作。此时，陈书已去世多年，陈书之子钱陈群已任刑部侍郎，于时他在于敏中的陪伴下向乾隆帝进献了《夜访授经图》《陈太夫人画册》等画作。乾隆赏罢御题“嘉禾欲续贤媛传，不愧当年画获人”，以褒奖之。

俞光蕙早年拜在陈书门下，可知其出手不凡。兰州市博物馆藏有一幅俞光蕙所绘的《上林春色图》手卷，该手卷绘于1748年，纸本设色，长128厘米、高27厘米。画面上杏花嫣红，柳枝碧绿，燕子斜飞其间，一派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象。画中题有长款：



俞光蕙绘《上林春色图》



《上林春色图》局部

审渊孝廉贤世侄台将付春闹，且偕淑配入都行有日矣，索画制别，因仿明人画意，为《上林春色图》赠之。首画柳者，当古人折柳赠行之意也；红杏春燕者，预卜得捷之兆也；殿以棠梨者，借曰别离亦借祝利试也。图中景物各有取义，焉不必论画之工拙矣。乾隆戊辰新春东海俞光蕙并记。

铃单字印“蕙”。从落款可见，俞光蕙书法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对于赵孟頫和董其昌书法的偏爱，使这二人的书法在清初被捧为书学楷模而成为书坛正宗，这也构成了后来作为科举答卷所盛行的馆阁体。俞光蕙的书法在时代书风的影响下，也师承赵、董，通篇志气平和，墨迹古雅，浓润圆熟，绰有余妍意溢于褚墨之间。但毕竟女流，铅华姿态又远超馆阁体。

陇上白石画艺传人赵西岩

书画艺术讲究师承。齐白石为一代绘画大师，因此其弟子众多，静宁人赵西岩则为齐派艺术在甘肃的第一代传人。

赵西岩，原名锡坤，字子厚，号西岩，1901年生于甘肃静宁县城南街。1925年，赵西岩进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在该校执教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因为赵西岩勤奋讷言，所以齐白石对这位来自西北的学生格外赏识，多次为其画题词。经齐白石的耐心指导、细致点拨，赵西岩深得其真传。赵西岩毕业后到山西美专任教，一年后到西安第一师范教美术。此后，又任兰州中学、兰州女师、兰州女中、兰州农校等

校美术教员，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美术系讲师。他在教学之余，依然伏身画案，创作大量国画作品。先后在其家乡静宁及兰州、太原、西安、银川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其中部分作品在省内外报章杂志上发表，深受同道称赞。早在1931年，北平京都书局就为他出版专集《赵西岩画册》（齐白石题鉴）。

赵西岩除了向先贤前辈学习绘画技艺外，还广泛地与文艺界的名流、同道交流切磋。国画大师张大千到兰州，与赵西岩谈论国画技艺，他们相互题字赠画。张大千在看了赵西岩的画作后，以“雄强朴茂”四字条幅相赠。也许听了张大千对敦煌莫高窟的讲述，赵西岩也产生了去敦煌一看的念头。1947年夏，赵西岩到敦煌莫高窟临摹，与我国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观摩壁画，纵论画技，收获颇多。

赵西岩的绘画艺术功力深厚，造诣精深。国画之人物、花卉、鸟虫皆擅，无论工笔、写意，都达到了“妙笔天成，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笔拙朴含蓄，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艳浓郁，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真切自然。

赵西岩曾绘有一幅《刮》，又



赵西岩绘《待诏图》

赵西岩曾绘有一幅《刮》，又

称《待诏图》，发表于1929年11月17日的《北平晨报》。“待诏”原为古代官名，汉代以才技征召士人，使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称之为待诏。唐代诗人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一诗中有：“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正因为有“随时等待召唤”之意，所以到了清初，民间将待诏用在了理发剃须的服务行业。赵西岩所画《待诏图》反映了当时在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下百姓困窘的生活，画家以对生活细致的观察、浓淡有致的色彩、富有动感的线条画出一位理发师在认真地给一位顾客剃头，旁边还绘有脸盆架以及镜子。

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曾于1934年来到兰州，慕名游览了五泉山。赵西岩在五泉山出示此画，张恨水观后欣然题诗一首：

人生不自由，
千里作狂游。
看罢浩然叹，
谁来剃我头。

在五泉小蓬莱涂 西岩兄羽正

凌文渊为著名画家、书法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还曾任北平艺专校长，与齐白石、陈半丁和陈师曾齐名，被称为“京师四大家”。他在看到这幅画后，也欣然题诗一首：

等足威权手上衡，

叫他低头默无声。

霜锋试处无余地，

青发蓬蓬刮复生。

子厚仁弟擅长讽世画，此帧尤有深意，属题即以廿八字应上凌文渊。

齐白石看到爱徒的画作后，也颇感欣慰，于是也在其上题诗一首：

三百年前削发手，

当门挂剑最销魂。

笑君畏缩何须削，

最好髡松作汉人。

子厚仁弟画此，请白石山翁题句

1952年，赵西岩又至北京，与恩师齐白石会面，白石老人热情地为其旧画册题字：

子厚弟别来二十又二年，今相见出此书，书中小像皆不相识。又欲作别，记数语留作再有重逢之日能一笑也。

九十一白石

于此可见其师生间之深情厚谊。



佚画谜踪

蓝方丈足拓

兰州普照寺，又名大佛寺，旧址在今兰州市武都路兰园少年宫。普照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在宋、元、明、清各代均有修葺。全盛时的普照寺，寺院庄严、殿宇宏伟、塑像精美、壁画惟妙惟肖，为兰州诸寺院之冠。最为珍贵的当属普照寺中轴线上北端的藏经楼。藏经楼二层五楹，第一层供奉关圣帝君，殿门左右悬楹联：“大义参天，金炉不彻扶炎气；精忠贯口，宝炬常明达旦光。”意借关帝的忠义磊落、英勇神武、儒雅酷学的威名，企盼保佑藏经楼的安全吉祥。藏经楼二层供奉着立于莲座之上的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塑像，两侧分立药师、释迦、弥



兰州普照寺藏经阁三佛像

陀、韦驮等木雕佛像及铜接引佛，后壁绘千佛。东西壁为四个木橱，皮藏经书 6358 卷，唐刻《大藏经》5418 卷，其中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刻印的《永乐南藏》638 函。

悠悠普照寺就这样在晨钟暮鼓以及琅琅的诵经声中走过了一千三百余年。可是到了 1939 年 2 月 23 日，日寇飞机轰炸兰州，普照寺遭遇劫难，变成一片残垣瓦砾，寺中悟明上人为护佛经而罹难。

悟明上人因俗姓蓝，民间又称为蓝方丈，法号众诚，兰州市阿干镇铁冶人。悟明上人与弘一法师一样，是近代受人尊敬的一代高僧。他自幼多病，8 岁在榆中大兴国寺剃度出家，为禅宗曹洞宗的传法弟子，对经、戒、禅研究颇深。他来兰州后，拜在普照寺长老座下为弟子，学经、戒律仪规，并受三坛大戒，遂成为普照寺住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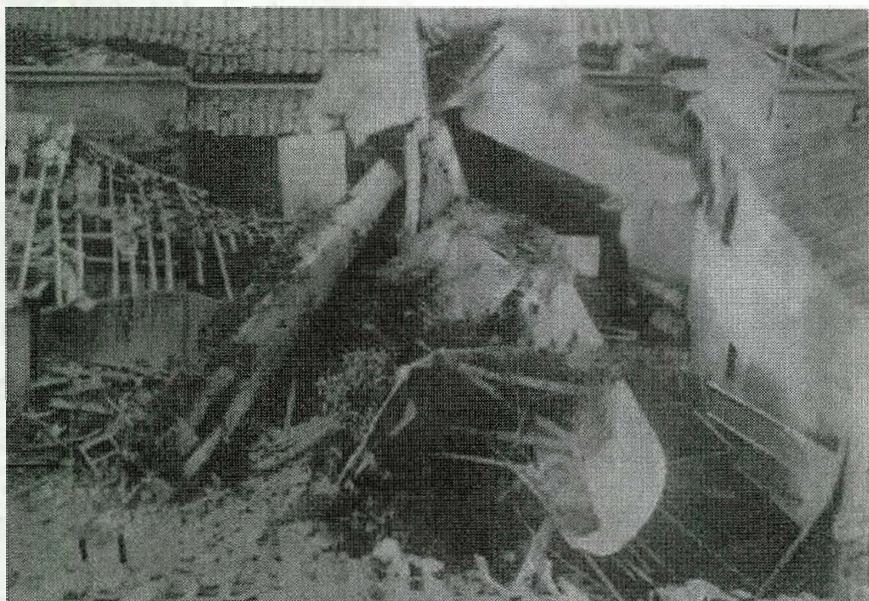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军二师师长刘郁芬擅将普照寺辟为中山市场，以大雄宝殿百货商场为中心，周围廊房均改造为商铺，出租与各商家经营。院内各空闲地皮均开辟为摊点，估衣、小吃、杂货、杂耍、古玩、旧书等划区经营，所有兰州市面零售之杂货，均聚集于此，成为兰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刘郁芬欲逼蓝迁出，遭蓝严词拒绝。刘郁芬又以委派蓝方丈一个县长做交易，蓝坚辞不就。就这样，形成了早市一开，一方的善男信女依然虔诚地拜佛烧香；另一方衣着华丽的摩登女郎、长衫礼帽的绅士涌进大雄宝殿内的百货商场，挑选自己喜爱之商品。在此情形下，蓝方丈依然率众僧诵经不已。正因为蓝方丈的据理力争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及各界人士，寺院香火旺盛，信徒云集。

民国二十年（1931年），蓝方丈在普照寺讲《北极玄机历法》，名流听经者甚多，流寓兰州的吴佩孚也曾跻身其间，对其评价颇高。

到了1933年春，蓝方丈又开坛传授三坛大戒，得戒僧尼数百人。后又邀在西北弘法的湖北名僧心道法师入寺讲经，共办“护国息灾”法会，宣讲反侵略、反邪教和众生平等的主张等。同年他还与刘尔炘、杨思、水梓、裴建准等名流宿儒创立了兰州佛教协会，选举晚清进士邓隆为理事长，蓝为常务理事，开创了甘肃佛教协会之滥觞。

1935年至1937年，蓝方丈曾闭关习经三年，出关时发长垂肩，容貌红润，双目如炬。后曾在兰州五泉山浚源寺大雄宝殿前举办规模盛大的传戒大法会，历时40天，名流及拜佛者甚众。

蓝方丈视寺内的经卷为生命。抗战期间，日寇飞机常来空袭兰州，很多人都劝大师暂出躲避。蓝方丈却总是对人说：“人在经存，经亡人



兰州被炸后的惨相

亡。”1939年2月23日12时22分，日机20架，从东北方侵入兰州上空，中国空军当即迎击。慌乱中，日机疯狂地倾泻了八九十枚炸弹，轰炸了唐代名刹普照寺（今兰园）、黄家园、东大街（今张掖路中央广场以东段）、学院街（今武都路酒泉路至静宁路段）、贡元巷、黄河沿（儿童公园以南）、南关（今庆阳路安定门至南关十字段）、东城壕一带。普照寺被多枚炸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蓝方丈让别人快走，自己却高诵佛号走上藏经楼，以身殉经。

蓝方丈遇难前，曾在虎皮宣纸上拓足印一双，脚瘦而长，弓部空白，十趾有力，旁有多人行书题跋，钤有鲜红的印章。蓝之弟子装裱后，供奉于该寺东北部观音堂中。原兰州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邓明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亲见过。可是由于当时照相摄影设备的匮乏，未



能拍下照片，现在想起，邓先生仍感遗憾，同时也感慨蓝方丈的足拓不知落于何处？

朱岫兰藏画魂归何处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辛亥革命后，新疆虽已“归附民国”，但由于国家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新疆一直鞭长莫及，新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上台任新疆边防督办，他积极推行亲苏政策，甚至请苏联派一个加强团驻守新疆东部门户哈密。

蒋介石对于盛世才与苏联的联系动向一直十分关注，多次警告苏方不能同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苏德战争的爆发，无疑给蒋介石一个收回新疆行政权的绝好机会。1941年秋，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政，意在控制河西走廊，压迫新疆。同时，善变的盛世才从苏德战争在欧洲战场的胶着状态认为，苏联大势已去，转而将他的政治天平倾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一方。

为了收复盛世才，蒋、盛之间开始了密切的联系，要联系，中间就要有一个牵线搭桥的人。这个人选最终落在了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身上。之所以选中朱，是因为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盛世才任其手下上校参谋，同时盛还曾任朱女儿的家庭教师。朱绍良就这样肩负着使命，往来自于新疆与陪都重庆、兰州之间。

1942年7月3日，受盛世才之邀，朱绍良和经济部长翁文灏由兰州飞抵迪化。临行前，蒋介石手书一信，要朱绍良亲交盛世才，信中写道：

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朱绍良，字逸民）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

7月10日，朱绍良在结束新疆之行后，直接飞赴重庆，向蒋介石



朱绍良子女媳合影

禀报其在新疆的所见所闻。蒋介石在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本日中午，由朱长官转呈盛世才来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之经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1940年11月间迫盛签订了《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尤有过之。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对东北张作霖作所未能为之者而俄竟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矣；我国何不牵而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早已根深蒂固。若不有此5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顺，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

此后，朱绍良又多次往返于口里与新疆之间。最后一次是8月29日，朱绍良与宋美龄一同由兰州飞赴新疆。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迪化市大街小巷，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9月1日，宋美龄和朱绍良携带着盛世才“切实奉行……钧座一切指示”的复函回到兰州见呈蒋介石。这也标志着，蒋介石在兰州彻底结束了新疆数十年来半独立半割据的局面，将新疆彻底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对此，蒋介石在当年年底12月31日的日记中对一年来的大事进行总结，不无得意地写道：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7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

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回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 3000 公里之领土（古代亚欧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盖新疆归顺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日本更不能再有消灭我政府之妄图。

当然，收服盛世才，朱绍良可谓“功不可没”，其前后九次往返于新疆。为了纪念乃父的“丰功伟绩”，朱绍良的女儿朱岫兰特请有“陇上美才”之誉的冯国瑞先生将朱绍良先后九度往返新疆的故事加以撰述。冯国瑞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曾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门下。冯所撰之班马文章，对蒋、盛之间的明争暗斗描述得栩栩如生。而且是图文并茂，加上冯之璧坐玳驰的文采和淋漓潇洒的书法，实为艺苑中之佳品，被称之为《九度天山长卷》。

朱岫兰又委托手艺高超的装裱匠人以淡青色绫绸装裱为高 60 厘米、长 400 厘米的折叠式卷子。《九度天山长卷》卷子虽绵长但并不繁臃，它既可悬挂壁上欣赏，又可摊于案上品评，还可折叠收藏。据见过此卷的原天水市政协委员周勋青回忆：“个中绚美堂皇，令人神往！迄今思之，真有‘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之感。”

据《甘肃文史资料》记载：

他（朱绍良）和他的老婆孩子，生活都十分考究。他自己，



烟非加力克不吸，酒非白兰地不饮。他老婆华德芬鸦片嗜好极深，且非云南土不过瘾。至于他的五个女儿更因过度放纵，淫逸骄奢，声名狼藉。

可是他的大女儿朱岫兰却酷爱收藏书画文物，且对书画古玩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除收藏有《九度天山长卷》外，她还收藏有孙中山、林森、于右任、邵力子、戴季陶、邵元冲、高一涵、罗家伦等政要的墨宝；此外，还有张大千的山水、徐悲鸿的马、张善子的虎、常书鸿的观音像、范振绪的山水和裴建准的八骏图等名家画作。

其实，朱岫兰的书画收藏更得力于她的夫婿张宣泽。张宣泽为贵州盘县人，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的堂弟。黄埔高教班二期毕业，后与台湾著名楹联家张佛千同拜青帮龙头老大杜心五为师。

朱绍良当年也许是为了拉近与盛世才的私谊，他在与翁文灏进疆时，也带了他这位乘龙快婿。据一本书中写道：“（朱绍良）手指一位年轻随员张宣泽，对盛世才说：‘他就是我女儿的丈夫。’盛世才点点头。”

张宣泽也酷爱书画收藏，冯国瑞曾为其收藏的敦煌遗书武周写经《妙莲花观音经卷》题跋：

张子所获乃尤物，题记六行尾能全。武氏窃国时无几，犹记万岁登封年。丰林金明两废县，补遗史志信可传。五凉希姓著张澍，崇德氏族增呼延……丝栏精整如新制，楮墨丰发有余研……



齐白石画赠张宣泽的《眉寿图》

在 2015 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一件齐白石的《眉寿图》上拍。该画尺幅不大，长 33.5 厘米，高 38 厘米，但是却是白石老人的精心之作，是“红花墨叶法”的再现。画面上一只憨态可掬的鹦鹉，充满了无限的生活情趣。该画落款也极为简洁，只有“宣泽君属，璜”几个字，钤“木人”印。从落款可知这是当年白石老人画给张宣泽的。可是从拍品说明中得知，这是从美国征集来的缪云台的旧藏。这可能是张宣泽得到白石老人的这幅画作后，又将其转赠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缪云台。

从以上这些遗留下来的书画题跋可以看出，张宣泽也酷爱书画收藏。也许是朱岫兰“夫唱妇随”，从而也喜欢上了书画，琴瑟和谐地一同从事此道。

兴许是仰仗着岳丈朱绍良的威名，张宣泽后来任国民党财政部新疆银行监理官、迪化市市长、贵州省府委员兼贵州日报社社长等职。

对于这幅珍贵的《九度天山长卷》，著名文史学家马晓余先生在《晓余文集》中记载：

当张宣泽、朱岫兰夫妇随朱绍良离兰时，将兰州左公路（现白银路）住宅交周（勋青）暂管，各种名人字画及巨卷俱藏锁于室内两个木箱中。兰州解放后，周深感中国人民解放军何等急需军用地图，即将《西北五省军用地图》数十张呈送王震将军参用，其余名人书画及巨卷等在“文革”中被全部抄走。

从此《九度天山长卷》及朱岫兰收藏的其他名人字画，皆不知所踪，音信皆无。

周勋青与张宣泽为南京黄埔军校高教班二期同学，二人交谊颇深。可是数十年过去了，巨卷和其他名人书画不知沉落于民间何处，也正如马晓余先生所说：“如果上项珍宝藏之人民，留给后代子孙，其价值……”

畅想五泉山壁画

《中国壁画史》中曾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壁画开始受到重视。……北京和甘肃的一些中国画家曾为兰州五泉山公园绘制了多幅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壁画。”

五泉山位于兰州城南，以汨汨涌出的五眼清泉驰名。这里林木葱郁，环境清幽，依山就势，梵厦庙宇点缀其间。董必武曾赋诗有：“兰州名胜地，共说五泉山。”

五泉山背倚皋兰山，故依山借势，修建了一些亭台楼阁。长廊上雕梁画栋，殿宇间的墙壁上、崖坎上，成了创作壁画的绝好载体。

1919年，五泉山人刘尔炘募得白银4.8万余两，对五泉山进行修葺扩建。他聘曹蓉江为五泉山绘制壁画，曹在1920年为五泉山半月亭绘《松风秋月图》一幅。画面中松树虬枝盘旋，松间明月高挂如盘，皎洁朗照，飞瀑漱石有声，颇有王摩诘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整幅画作诗情画意，珠联璧合，这幅壁画堪称一件上乘的艺术佳品。另外，曹蓉江还为间柳轩（太昊宫西口）南偏门绘有梅花，凌寒自开，清幽淡雅，暗香浮动，苍古而清秀。

曹蓉江，字兆镜，又字月如，号蓉江，兰州本地人。他生于清同治年间，卒于抗战前。1924年，他在广武门外水车园建别墅，号“若园”，仰可见兰山巍峨，侧可听黄河滔滔，他以艺术家手法，叠奇石，育异花，筑卓然亭、观澜斋，并巧妙借景，使河声山色浓缩于园中。更



为奇特的是他在家中辟小楼为画室，不设楼梯，借滑轮牵引上下。他厌视帖括业，黎明即起，上楼摩挲碑帖画谱，挥毫写字、临画，遍临历代名家画的山水花鸟虫鱼而不辍。所画花鸟山水自成风格，时人重金争购其作品，视为拱璧。

30余年后的1955年，曹蓉江所绘《松风秋月图》壁画因墙壁泛潮，多处剥落，部分色彩脱落，濒临毁灭。曹蓉江的侄儿曹陇丁又将《松风秋月图》进行了修复。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该画又焕发了新的生机：18棵松树苍翠挺拔，气势雄浑，似乎有着擎天撼地之力量。甘肃省文史馆首任馆长杨巨川为画题跋，记其始末，并对曹陇丁的补画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一些兰州画家还在五泉山蝴蝶亭仿照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和平颂》绘制了大型壁画，如段梦久绘青松，孔寿彭绘牡丹、和平鸽，马子珍绘石榴、溪流、碧草等。

“文革”中批黑画，五泉山的众多壁画被视为黑画涂去，写上语录或画上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壁画。1984年，五泉山在一次修葺中，将原嵌于太昊宫北廊壁间的刘尔炘所书《兰州五泉太昊宫记》8块碑刻移于半月亭，取代“文革”语录。

此外，五泉山还有一处壁画，位于半月亭以西的嘛呢寺。嘛呢寺，因从惠泉中流出的溪水汇流此处有嘛呢转轮而得名。

对于嘛呢寺的壁画，我们可从我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郑振铎先生的日记中得知。他在1957年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嘛呢寺

阴，偶见太阳，下午雨。六时半起，写信给潘景郑、吴文良、孙实君，即发出。整理行装，九时到五泉山公园，循游廊上山，看东龙口的水，从石罅里涓涓流出，淙淙有声，如在深山听溪水声。至卧佛殿，又上至千佛阁。有天顺、嘉靖、万历三碑，又有康熙时碑，民国二十五年又重修过。天顺碑已称“重修”，则其来源久矣。所谓千佛乃是壁画，作风颇古，然方之敦煌千佛洞，则乎小哉，其风格却是一脉传授下来的。至西龙口，泉水较小，在嘛呢寺喝茶，水甚甘。新壁画颇多佳者，黄胄作的藏族青年们骑马相逐的一幅，尤好。坐听泉声，意兴洒然。沿溪流万山，购冬果梨若干。

这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于1957年4、5月间，就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古建筑保护，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等，率队赴甘肃考察。他们在结束了对莫高窟的考察后，于5月10日晨离开敦煌，5月12日中午返回兰州，于次日游览了五泉山。

从郑振铎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千佛阁也有壁画，且“作风颇古”，因为郑先生刚从敦煌回来，所以与敦煌的壁画相比，“则乎小哉”。另外，他喝茶小憩的嘛呢寺也有大量壁画，“新壁画颇多佳者”，但印象深的还是“黄胄作的藏族青年们骑马相逐的一幅”。其实郑振铎先生也许记忆有误，黄胄所绘并不是“藏族青年们骑马相逐”，而是反映生活在新疆天山脚下的哈萨克族的民俗“姑娘追”。所谓“姑娘追”在当地也称作“克孜库瓦尔”。因哈萨克民族热情善骑，所以在节日和喜庆的日子，牧民都要举行骑术表演和竞赛。因此，黄胄在注重笔墨线条、色彩运用的同时，更绘出一种节日喜庆的氛围，给郑振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胄之所以善于创作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的画作，这是因为1948年，他和恩师赵望云在兰州举办了一次作品展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在参观完画展后，邀请他们去新疆写生。从此以后，他热爱上了那片广袤的土地，并创作出大量反映新疆民族风情的作品。

嘛呢寺除了黄胄的壁画外，还有当年甘肃画家赵西岩抱病所绘的《芦雁图》。该画形神兼备，真切自然。就在赵画完该画的当年，即因病故去，所以《芦雁图》又成为他的绝笔。

1956年，全国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西北旅行团，成员包括冯至、张恨水、朱光潜、孙福熙、钟敬文、常任侠等，画家有周怀民、陶一

清、周元亮等。他们一行来到兰州后，应邀为五泉山创作壁画，画面每幅有一丈多宽、一丈二三尺长。周怀民先生画的是《太湖秋晚》，陶一清先生画的是《长江堤影》，孙福熙先生画的是《稽山红叶》，周元亮先生画的是《云汇天都》。天都峰位于黄山东南，与光明顶、莲花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云汇天都》，画面上云雾氤氲，烟波浩渺，在奇松怪石中一峰突兀。因为黄山在张恨水先生的家乡，所以他在画上题诗：

豁然天底万山图，怪石奇松盖世无。

看毕诸峰三十六，白云深处是天都。

“文革”结束后，兰州画家李德俊还为五泉山公园绘制了壁画《庐山图》。李德俊为兰州下西园人，别号李虎子、北山愚公。1966年起，为白塔山公园美工。他工楷书，善隶书，精板桥体。国画能山水、人物、花鸟。人物多以维吾尔族、蒙古族人为主，富有西北风情。除了在五泉山绘制壁画外，他还为白塔山绘制了《塞上行》壁画。

由此可见，五泉山存在着大量的壁画，使五泉山不光具有清澈的泉水、清幽的环境，而且更注入了艺术的魅力。“水结禅林左右连，萧萧古木带寒烟”的五泉山，不仅是兰州人民休憩游览的花园，它更是一个艺苑。



画坛逸事

顾颉刚写字无印章

1950年冬天，应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之邀，赵俪生与夫人高昭一携子女自长春来到山东大学任教。高昭一起先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后来也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

新来的赵俪生，与历史系的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陈同燮等七位著名的教授，合称为“八马同槽”。他们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开端发皇，并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山东大学历史系也由此进入辉煌

蒼茫海上月
空兀在中
山化境
融生幻
煙雲
鴻羊間

一九五六年八月家成行向博
德生先生一敬
頤頤剛



顾颉刚写与赵俪生的书法作品

时期，因浹洽时代变迁而引领学术潮流，为山东大学赢得了“文史见长”的盛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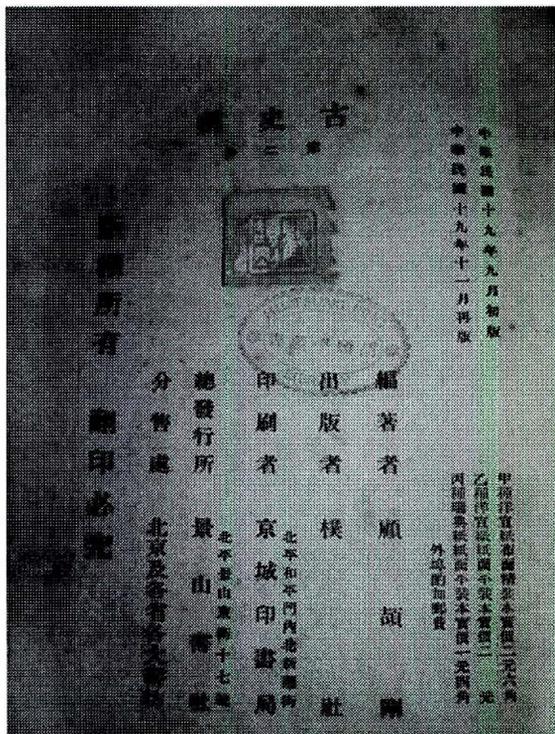
1956年夏天，顾颉刚先生因神经衰弱和高血压到青岛休养。当时他的饮食起居也就多与这些历史系的教授发生联系，顾颉刚住则在安东路杨向奎分配的两室套房（杨夫人在龙山路另有洋房一幢），吃则到合江路童书业家就餐。

有一天，赵俪生邀请顾颉刚到家中吃饭。赵俪生的夫人高昭一将煮熟的洋芋泥加入碎肉做成饼，并涂抹鸡蛋清于饼上，然后用油炸之。顾

颉刚吃后，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后仍对朋友谈及此次在赵家这顿难忘的便饭，似意犹未尽。

记得当时吃过饭后，顾颉刚与赵俪生坐在书房品茶，他一时兴起，在书房中就着现成的纸笔，写了一首诗。写完后，顾颉刚却发现没有带印章，就问赵俪生是否有《古史辨》，赵俪生就从书架上找了出来。

《古史辨》是顾颉刚先生于1926年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因为民国书籍为防盗版，在书的末尾版权页



《古史辨》版权页钐有顾颉刚的印章

一般要钤盖作者印章。顾颉刚让赵俪生从版权页上剪下印章，贴在刚写的诗后。只是这枚印章所用印泥并非红色，而是蓝色。对此顾颉刚先生解释说：“当时守制，故用蓝印泥，殊不恭。”

后来查阅赵俪生先生的《师友书画集》，果然见到一幅顾颉刚写于1956年的小诗，内容为：

苍茫海上月，突兀画中山。
化境融空幻，经云涌笔间。

只是这幅书法作品末钤盖的却是一枚鲜红的印章，并不是贴上去的蓝色印章，这不知何故？网上曾有民国十九年九月初版、十月再版的景山书社发行的《古史辨》第二册出售，在版权页可看到，是书钤有“顾颉刚”三字的篆书白文印章。

宋万选喷墨绘蛟龙

宋万选，字子清，清代金城画龙名家。他生于兰州市黄河北盐场堡一个耕读之家，从小在叔父宋朝彦所设的私塾中学习，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艺术方面的天赋被及早得到了开发。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宋万选成举人，次年考中丙戌科三甲第150名进士，先后出任蜀地之崇庆、大竹、梁山、广元知县。他学识渊博，酷爱书画。晚年回归故里，终老乡里。

宋万选画龙得古人画法之精髓，以阳刚之美为主，融合一定的阴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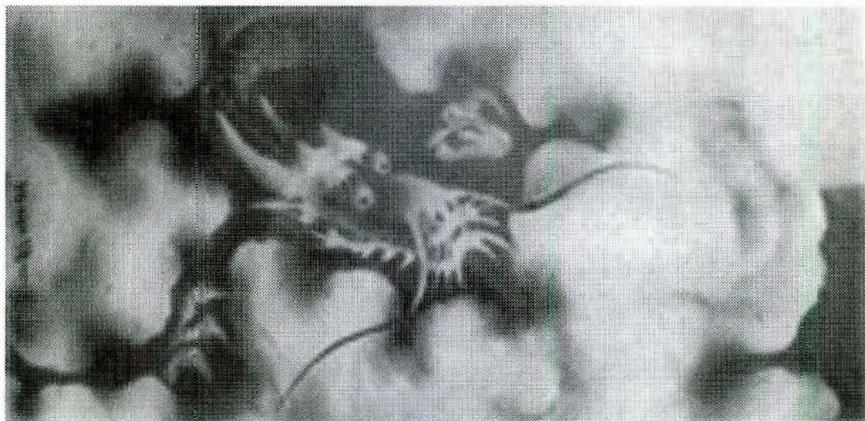


之美。

宋万选画龙一般不让人看，有人曾用手指戳破窗户纸进行偷窥。只见他先勾勒好龙的角、首、爪，以及部分躯干。对于画中的云雾，他并不是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渲染。为了表现云雾的朦胧、缭绕和飘逸，他先口噙淡墨，然后喷于画面。从而画面氤氲弥漫，达到了一种气韵生动的效果。

古人提出了“墨分五色”的绘画理论，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运墨而五色具”之说。宋万选画龙极为遵从这一理论，他用墨由淡入浓，由干入润，用笔灵动，疏密有致，凝重中透出秀逸。他画的云雾舒展自如、飘忽变幻，正因为他泼墨成云，喷水成雾，所以衬托出了龙的搏云凌空、矫健遒劲、隐现出没，或行云布雨，或腾跃盘旋，从而产生了动静对比、虚实相生的神秘感。

他画的龙翻腾在云雾里，龙身盘旋翻腾多次，远处浅近处深，隐隐



宋万选画龙

约约，可谓非常好看。有人说画龙在云中固然好看，但烘染太过，却不是大雅所推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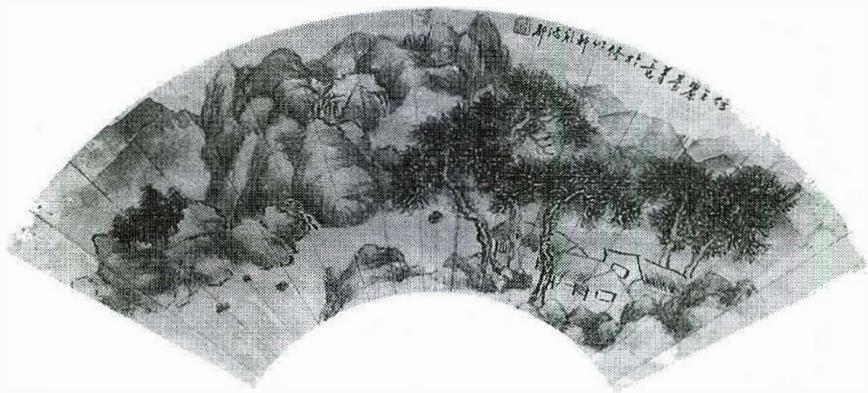
颜鸿都瓜皮研粉作画

颜鸿都，字汉卿，兰州颜家沟人，清咸丰同治间庠生。他多才多艺，善抚琴，能谱曲，工书画。画学王摩诘，尤善画柳，时人称“颜柳”。



颜鸿都绘《仿王淑明山水图轴》





颜鸿都绘山水扇面

颜鸿都所居颜家沟，其旁有自五泉山流下的泉水潺潺流过，而沟渠旁多有古柳，树影婆娑，浓荫蔽日。颜鸿都将其书斋命名曰“深柳读书堂”。读书之余，徜徉渠边，仔细观察柳树四季不同形象，烂熟于胸。

每年暑期，取兰州绿皮西瓜，刀刮表层绿皮，阴干研末，过细筛，调为绿颜料用以作画。所绘柳树三五一丛，或老干斑驳，或柔条飘舞，或初见鹅黄，或柳絮轻扬，或烈日浓荫，无不神态万千、气韵生动，个中得力于瓜皮粉末颜料甚多。

曹世岳椽笔写大字

曹世岳，字柱西，甘肃永登县人。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民政厅第三科办事员，曾上书甘肃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朱绍良，自荐能写丈二飞白大字。而且他右手能写郑板桥体，左手能写隶书。

朱自诩“儒将”，也颇好翰墨，同时也感到很好奇，于是，他令人从市坊买来数匹白布，令人缝制为丈二见方的大幅，铺展于一块场地

上；又置大盆一口，用红土磨细以水和匀盛之当墨；捆茭茭草一束，用木棍扎如扫帚状当笔。

届时，曹脱鞋登布上，双手持帚，二人举盆随之，但见他上下进退、腾挪跳跃，如舞蹈焉，须臾字成，写成一大“德”字，字迹苍劲挺拔。

朱绍良看后大喜，命悬于兰州民众教育馆（今张掖路原兰州晚报院内）。张思温先生当时在省民政厅任第二科主任科员，曾亲眼看见曹世岳挥如椽大笔写字。后来张思温问曹是如何学成书写大字之法。曹告诉张，小时候，他在乡下务农，就酷爱书法。每当农忙间隙，他就在麦场上以帚作笔，就地挥写。所以，他能挥洒自如地在朱绍良面前“露一手”。

黄胄在兰州

黄胄第一次来兰州是在1947年。当年7月，黄胄的老师韩乐然（朝鲜族画家）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考察结束后回到迪化（乌鲁木齐），举办了一次画展。画展结束后，韩乐然在乘坐国民党军用飞机由迪化飞往兰州的途中遭遇空难，不幸罹难。黄胄得知噩耗后，想到5年前，他还为恩师韩乐然背负着画具，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随其学画。在共同生活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黄胄还从韩处学到一些外国美术知识，并阅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遥想此情此景，不由得潸然泪下。7月30日，黄胄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兰州老师家里，吊唁老师，并慰问了师母刘玉霞。



1946年12月，赵望云在西安创办了以刊发美术和文学作品为主的图文杂志《雍华》，黄胄负责编辑。在创办《雍华》杂志期间，黄胄于1948年夏随老师赵望云到青海祁连山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写生。写生结束后，他们的作品在兰州展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前往参观画展后，还邀请他们去新疆写生。他们在新疆进行了近三个月的采风写生创作，画了大量当地民族风俗生活作品，春节临近才返回西安。

次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黄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新疆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漫画、连环画、宣传画。1950年他创作的《爹去打老蒋》受到徐悲鸿器重。徐让韦江凡推荐给第一次全国美展，并建议将黄胄调北京工作。同年，吕斯百先生奉命到兰州创建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可是院系初肇，苦于无教员。于是他写信给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恩师徐悲鸿，请其伸出援手派来



黄胄在兰州所绘《马球图》

教员。徐悲鸿首先想到了黄胄，他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当时黄胄还兼任着战士读物社的工作，任务也很繁重。后来在吕斯百先生的多方努力下，战士读物社以答应为军区培养篮球运动员作为交换条件，方才同意黄胄兼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教师。

就这样，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的教室里，一位穿着羊皮大衣、厚棉裤的年轻教师正在给学生们绘声绘色地讲课。讲到高兴处，他还在黑板上画起来，这就是25岁的黄胄。在讲台下，有一位女生对黄胄特别佩服，她名叫郑闻慧，陕西城固人。她喜欢唱歌，想学音乐，可当时学院里没有成立音乐系，只有艺术系，她便上了这个系。年轻的黄胄，多才多艺，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元旦联欢晚会上，师生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迎接新年的到来。黄胄先是唱了一段河南梆子，赢得了满堂彩。大家不过瘾，他又来了一段河南坠子。还不行，就又来了一段山西梆子。他又多又棒的节目，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郑闻慧觉得黄胄不仅画得很棒，戏也唱得这么好，心里不免又多了几分爱慕之意。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郑闻慧毕业了，1954年他们在西安喜结连理。黄胄的老师赵望云及其夫人是婚礼的主婚人，画家石鲁既是证婚人，又是婚礼的司仪。

黄胄在兰州找到了终身伴侣，同时也在兰州奠定了他艺术创作的基础。大西北边塞生活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经常到草原、荒漠，以及黄河岸边去采风写生，在这里他迈出了艺术攀登中的关键步伐。在向大自然学习的同时，他还注重向前人先贤学习。他常流连于书画装裱店

以及书肆，有时一幅感兴趣的古画他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反复揣摩古人的运笔、用墨。就是在兰州，他对清代画家温虚舟画的毛驴产生了兴趣，以致成为他终身所喜爱的内容，并有了“驴贩子”的戏称。

其中《马球图》是黄胄在兰州红山根体育场观看西北军区第一届运动会上马球比赛后，根据现场画的速写加工而成的。《马球图》显示出作者善于捕捉住激烈运动过程中人物活动的才能。黄胄经常说：“一张画一定要画完，而且要多画几次，才能将形象画得生动，笔墨用得得当。”

此外，黄胄在兰州还创作了《苹果花开的时候》等画作。

1955年，黄胄被调到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从而离开了甘肃，离开了兰州。

黄胄受温虚舟启发画驴

著名画家黄胄擅长人物画与动物画，尤以画驴而蜚声中外。他笔下的毛驴可与徐悲鸿笔下的马、齐白石笔下的虾、李可染笔下的牛相媲美，故在画坛黄胄又被戏称为“驴贩子”。黄胄为什么把毕生心血都放在了这其貌不扬、温顺耐劳的毛驴身上？这还要提到清代兰州一位画家——温虚舟。

温虚舟，名又新，号野园居士，清嘉庆、同治年间皋兰（今兰州市）人，其室名“半砚斋”“磊石山之瞻斗轩”。温虚舟早年学画于兰州名画家松石老人唐琏，成名后温虚舟为老师捐资刊刻了其书画理论专著《松石斋集》。

温虚舟善画山水、牲畜，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情趣。因唐琏论画主张“骨格清奇，笔意生动”，所以温虚舟也“亲其师，信其道”，始终恪守着老师的教诲。故温虚舟与唐琏一样，多着笔于西北突兀的山川、黄河岸边的田园村舍，施以深浅浓淡的墨色，以厚朴稚拙的线条表现出烟云氤氲的沟壑山峦、纵横的阡陌、枝叶招展的树木。画面泼墨淋漓，充满潇洒淡逸之气。

清时的雷坛河，河水潺潺，握桥横亘；河旁的金天观，殿宇巍峨，清幽雅静；不远处的北园则为兰州八景之“梨苑花光”，春天一到，白

茫茫的梨花盎然盛开，清风袭来，馨香阵阵，大有“香雪海”之势。因这里美景如画，故温虚舟常到这里来临摹写生，或感受画中意境。雷坛河上游的阿干镇产煤，加之原雷坛河水势湍急，两岸水磨林立，所以常有驮煤运粮的毛驴从这里经过。有的毛驴皮笼头上的红缨，随着毛驴“呱嗒、呱嗒”的蹄声，脑袋上下用力地晃动，红缨则像一朵盛开的花在摇曳。



温虚舟画作

作为一名善于观察的画家，温虚舟的目光常被这些倔强但踏实的毛驴所吸引。他心追手摹，画驴技法日渐成熟。他所画之驴或负重前行，或被骚人墨客骑之访友，这些毛驴或任劳而行，或耷耳长吼，或摆尾抬蹄搔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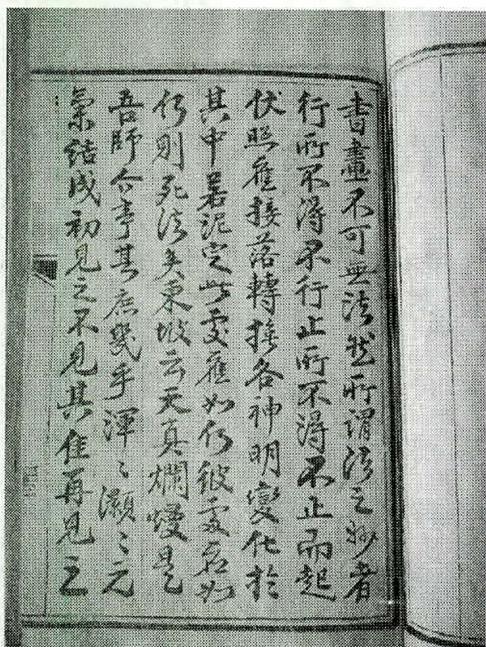
此外，温虚舟还擅长指画，并且将绘画这一技艺还薪火相传地传给了他的儿子温筱舟（又名晓舟）。筱舟自幼耳濡目染，尽得家传。后来温筱舟游幕西安，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胸襟为之开阔。其画山水仿元代黄公望、人物仿明代唐寅，所画山水老辣疏简、人物惟妙惟肖。

到了20世纪40年代，黄胄随赵望云来兰州，他在朋友家、装裱店见到温虚舟所绘的毛驴，颇感兴趣，受到启发。全国解放之际，恩师赵望云送黄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黄胄在西北军区政治部任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到了50年代，他又兼任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创作课讲师。就是在此期间，节假日他常身背画板和画具到黄河边进行写生，在这里他不时可以看到当时西北的主要驮运力量毛驴到河边饮水，他仔细观察了毛驴的各种神态，经过耐心的揣摩，融入自己的见解和特色，最终自成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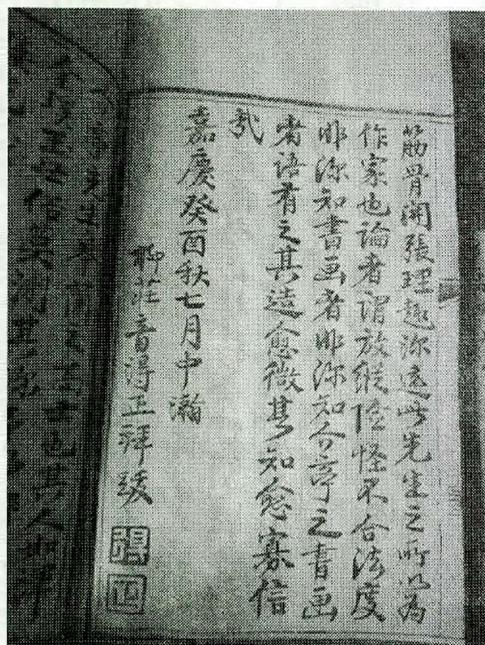
音得正不擅使鸡毫

清嘉庆年间，兰州有位乡绅给其父过寿，大宴宾客，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书画家唐琏与音得正也应邀前来。

时人有“家家音得正，户户李友桃”之说，音得正的书法在当时兰州并非浪得虚名。据《甘肃省新通志》载：“（音得正）书法用力最深，



音得正为唐琏《书画琐言》作跋一



音得正为唐琏《书画琐言》作跋二



初习颜真卿，后摹赵孟頫，故婉媚之中饶有筋骨，一时榜联多出其手。”他曾为皋兰书院题写一联：“汇众力以续前功，一志同心，幸得重开广厦；愿萃英而尚实学，尊贤取友，定然高步云程。”

但音、唐二人只素仰对方大名，却并未谋面，主人也未予相互介绍，所以二人同堂却并不相识。

主人提出请来宾为其父题写寿幛屏匾之类。唐璉比音得正年长二十岁，按说得唐璉先写。但是按旧俗，书写这些贺寿之作，书者必有官衔，始见荣耀。据何聚川的《一鳞半爪集》载：“是音得正为官，故主人请音书。”

可是音得正却未带笔墨，正在踌躇间，这时唐璉拿出自己的鸡毫长峰递与他。音得正接过笔，蘸墨欲写，可是笔毫却柔软不听使唤，很难驾驭。音只好又将笔还给唐璉，唐璉接笔在握，饱蘸浓墨，却挥洒自如。音佩服之至，乃问姓名，方才知此人即为唐璉唐介亭先生。二人由此成为书画同道和至交。音得正后来为唐璉所著《书画琐言》作跋，称：“介亭其庶几乎？浑浑灏灏，元气结成。初见之，不见其佳；再见之，筋骨开张，理趣深远，此先生之所以作家也。论者谓放纵险怪，不合法度，非深知书画者，非深知介亭之书画者。语有之‘其造愈微，其知愈寡’，信哉！”

甄载明铁锨“写”标语

“文革”期间，书法家甄载明被送回天水老家关子镇。当时全国各地都流行一些巨型标语和语录，一开始让他提着油漆桶，在镇上街道的



墙壁上刷写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口号和标语，一时关子镇街道两边的白墙上遍留其“墨迹”。

接着，又将一张八仙桌倒过来，作为升降台，甄载明站上去，然后吊到四五层楼高的北堡子墙上，写下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幅巨型标语从关子镇任何地方一抬头就可看到。

后来，在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策划下，甄载明又被送到北堡子山对面的烟雾嘴山。甄先生以一把铁锹当笔，几十亩荒山做纸，五个十几米的大字“农业学大寨”就被“写”了出来。这幅巨型标语是如何创作的呢？当时甄载明用铁锹先“写”出字的轮廓，然后农民们背着白石头，一笔一画地将每一个字填筑出来。这幅巨型标语，在关子镇几里之外就可以赫然看见。

张大千西去敦煌逸事

在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张大千是一位极富人生传奇，享誉海峡两岸，并在世界画坛深有影响的艺术大家。他精研传统，深攻笔墨，一生游艺神州大地和世界各国。他每到一地必结交名流、同赏山水、切磋技艺，所以他高朋无数、胜友如云。其中他在西去敦煌临摹壁画途经甘肃武威时，结识了甘肃画家范振绪先生，从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范振绪（1872 年—1960 年）为甘肃靖远县人，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中癸卯恩正并科进士。1906 年赴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任河南省济源

县知县。1919年，深居北京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维持生计。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出任萨拉齐县知事。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

1941年，张大千携夫人杨婉君、二子张心智和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等一行前往敦煌。据张大千在《我与敦煌》中讲述：“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

最后经鲁大昌等人的协助，张大千他们在兰州租到一辆苏联的“羊毛卡车”前往敦煌。当汽车驶过中山桥时，迎着清凉的黄河河风，张大千感到很惬意，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他们一行经永登、乌鞘岭、古浪到达武威。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邈邈、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河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顿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

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马步青。马步青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

以上这段是2006年出版的《行走的画帝》中描写的张大千初到武威时的一段故事。

接着，“马步青命人置办宴席盛情款待。席间，张大千向马步青说起一件事：‘蔡市长准备引荐我会见武威城一位书法大家范振绪。’话未说完，马步青笑道：‘他是我家的教师哩，是个人才。’宴毕，送至河西大旅馆安歇。次日，张大千和蔡孟坚前往范振绪家拜访。张大千见到范振绪时，以‘禹丈’称呼他，因为张大千涉足画坛即对范振绪崇拜不已，如今相见分外高兴。当张大千把准备前往敦煌一事告诉他时，范振绪大加称赞，最后两人相约一同前往。”这是2012年5月11日《兰州晚报》刊发的一篇《张大千在甘肃的传奇故事》中的描述。关于张、范二人的会面，至今有许多版本。

张尚瀛在《范振绪先生的一生》一文中写道：“他（张大千）到武威后去参观大云寺时，巧逢范老正在寺中蘸墨作画，故人喜逢，倍感亲切。此时范老适避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暂居武威。当大千先生把他西去莫高窟的计划告诉范老后，深得范老赞同，并相约愿与同往，还与当地





范振绪（左七）与张大千（左四抱小孩者）
鲁大昌（左八）等合影

有关方面联系解决了警卫护送、伙食供应、交通工具诸问题。”

从文中可以看到，张、范二人原就相识，此次是重逢于武威。但是在《陇右文博》2006年第一期刊登的黎大祥撰写的《张大千与范振绪在凉州的友情及遗留的墨迹》中，却这样写道：“入城不久，一位个头不高、银髯拂胸的长者前去造访他，这个人就是当时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著名的书画家范振绪先生，两人相会非常高兴。”很显然，这是范振绪慕名前去拜访张大千的。

发表于《人民政协报》的李玉琴所写的《张大千当年是如何到达敦煌的》写道：“在武威，大千幸遇甘肃省参议会范振绪副会长。此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大千留下很好的印象。范乃甘肃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他要亲自陪同大千去敦煌。”这段话也记载了张、范二人是在武威才相识的。



与张大千同去敦煌的张大千的次子张心智后来在《张大千敦煌行》一书中写道：“过武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先生。张、范二人结识后相谈甚投。”从张心智的记载来看，张、范二人的结识是经别人介绍的。

张、范二人结识后，也正如张心智所写的，二人“相谈甚投”。他们彼此诉说了自己的身世、阅历，以及对书画艺术的见解。张大千得知范振绪与其恩师曾熙为同科，所以对范以“师叔”称之。他赠送给范振绪的书画作品多题有“禹勤道丈”“禹老道翁”，体现出了文人那种谦谦有礼的“慎独”情怀。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据说，在张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母亲曾友贞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髯长袍老者送她一铜锣，上蜷伏着一只黑猿，曾氏接过此物，梦遂醒。没过多久大千出生，后来人们都说张大千是黑猿转世。张大千也很喜欢猿这种有灵性、有感情的动物，他写猿、画猿、养猿。21岁时，张大千到上海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曾熙根据他的黑猿转世之说，为他取名为“爰”（“爰”即“猿”古字）。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张大千去“虫”旁，改为“爰”，故他作画落款多为“张爰”。

对于张大千的黑猿转世说，范振绪也颇认同，他曾在张大千送给川人黎四素的一幅画作上题诗一首：

秃笔纵横写石根，
蝉鸣鱼咏正黄昏。

如何妙解荒寒色，
君是山中一老猿。

黎四素(1882年—1961年)，四川阆中人。原名之彦，字子俊，清末拔贡，先后任甘肃渭源、临潭县知事。在渭源县任上，由黎四素倡建主持，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县城南门口新址，改原平桥，仿兰州雷坛河卧桥修建的纯木悬臂拱桥，即现在的灞陵桥。1935年，黎四素任宁夏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黎滞留北平，在无奈和惆怅中，唯有借书画来自娱。他与好友国画名家许翔皆联手绘制《嘉陵江山图》，以书画求友人诗文题赠，共寄思乡爱国之情。抗战胜利时，黎四素将长卷展出，引起轰动，《申报》曾有报道。随后，黎四素又以锦屏山为素材，撰《锦屏山房记》及多首诗篇，由其夫人、书画家樊瑞贞女士书写，范振绪作画，制成《锦屏山房图记》，以诗文求名人书画，形成了《嘉陵江山图》的姊妹篇。两卷上，齐白石、徐悲鸿、廖静文、沈炳儒、王青芳、李苦禅、吴作人、萧淑芳、陆鸿年等当代书画大家都有题句。2012年4月23日，央视《寻宝》栏目组走进阆中，《嘉陵江山图》和《锦屏山房图记》被评选为阆中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

张大千送给黎四素的画作为《石潭游鱼图》，画面上清澈的水潭中有几尾小鱼在欢畅的游弋，潭边怪石嶙峋，上面几株兰草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在画幅的左上角，张大千题有“子俊仁兄法家正之。大千张爱”款识，并钤有“爱钵”白文印和“大千”朱文印。范振绪在上面那首题诗后，又写有一段小跋：



张大千绘《石潭游鱼图》

大千生时云：太夫人梦道士
予一老猿，儿时见月则啼，亦猿
性也。故名曰“爰”。

在武威时，有一次文人雅集，大家进行诗文书画的切磋。因张大千当时的画名已是名满神州，而范仅驰名陇上。所以范有心让大千先画，可是大千却施礼请范振绪先画。范于是拿出自己所藏的名笔佳墨，自谓不恶。张大千见后笑之说：“此墨品劣不可用。”范争辩说：“此墨乃昔日予宰时名人馈赠之物，平日予宝而用之。”张大千听后，也未答话，取出一锭明墨，乃蓝光绽现。接着又取出长锋紫毫一枝，盖特制之笔。范抻纸研墨开始作画，张则侍立一旁观之。何裕所著的《一鳞半爪集》中写道：“范画四王山水，均

用小笔，皴搓点染，一丝不苟。张谓范曰，师叔乃描画耳，实非画也，当大笔挥洒，乃见气韵耳，范甚服之。”

为了感谢马步青的盛情款待，张大千作了一幅《长松高士图》赠予马步青，以表谢忱。高士为大千颇喜创作的题材。将高逸之士以概念化的形象置于山林泉石之间，这也可看作大千作为一名入世画家，对于超凡遁世、

纵情于物外生活状态的一种希冀。大千所绘的这幅高士图，只见一长者手抚古松，凝视远方，立于清溪旁。画中的苍松虬枝遒劲，盘曲斜出，突出了高士超逸的气节。整幅作品力遵古法，敷然深厚，充满了清逸之气。在画的左侧有长款：子云（马步青字子云）将军法家教正。辛巳之四月既望大千张爱写于五凉。

张大千和范振绪在武威又盘桓几天，他们相应地又进一步做了西去敦煌的准备。自武威出发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嘉峪关、“世界风库”安西的桥湾大风口……这一路黄沙千里、戈壁万顷，历来人烟稀少，兵匪贼寇出没，属荒蛮之地。他们一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快抵达张掖时，正遇沙尘暴，只见黄沙滚滚，

天昏地暗，天地之间混沌一片，空气中还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大千先生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但他浑然不觉头上、身上落下的尘土，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也许这种壮景，正运用到他后来创造的泼墨、泼彩画的技法当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间万物也许正是通过艺术家敏锐的慧眼，加之他们深厚的艺术修养及积淀，创作出了陶冶人



张大千绘《长松高士图》

性灵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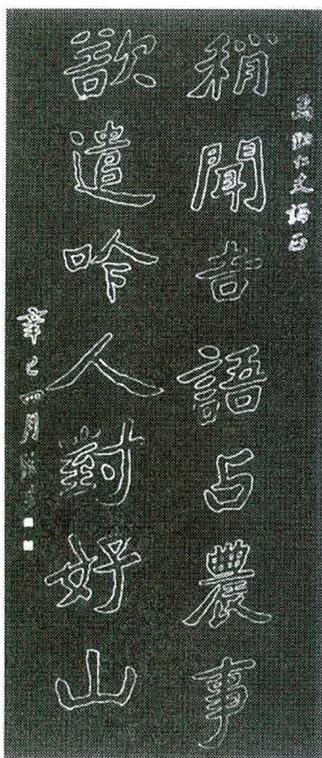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因这里纬度较高，所以春光迟迟不至，因此古诗中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说。张、范他们到达敦煌时，尽管已是暮春时节，在南方早已是花红柳绿、莺歌燕舞，但这里才冰消雪融，当地的农人们才开始农事的劳作。张大千看到这些辛勤劳作的农人们，书写了一副对联赠予范振绪：

稍闻吉语占农事；
欲遣吟人好对山。

确切地说，这是一副集联，上联集自南宋范成大的《次韵子永雪后见赠》中的颈联：“稍闻吉语占农事，便觉归心胜宦情。”下联集自北宋黄庭坚的《李大夫招饮》中的首联：“欲遣吟人对好山，暮天和雨醉凭栏。”而这副对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张大千以双钩的技法写成，仔细品评，整幅作品真是“笔法精细，若游丝萦绕，孤烟袅风，连绵不断”。张大千还谦虚地题有上款“禹勤仁丈海正”，落款为“辛巳四月 张爱”。

荒滩万里无人迹，雨雪纷纷连朔漠。开凿于鸣沙山崖壁上的千佛洞，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渊薮，因缺乏保护，大量艺术瑰宝被盜、流失，有的洞口已被流沙所掩，部分壁画因风沙、渗水侵蚀而剥落。张大千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带领儿子、门人及画工清理流沙，并详细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现状、缺损状况等，还为 309 个洞窟进行了编号。张、范等先后在莫高窟、榆林窟、锁阳城等地进行壁画临摹，





张大千书对联



张大千戏题范振绪

考证各窟经事、本生、尊像、供像和图饰的内容。

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辛而孤寂的。先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的吃食用品等皆由酒泉运来，费用颇巨，且很难吃到新鲜的菜蔬。但在繁忙的临摹工作之余，大家也以诗文调剂枯燥的生活。张大千曾写有一诗：

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

颜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蟻。

戏赠范禹丈 张大千爰

张大千的这幅墨迹如今就珍藏于兰州市博物馆，后来它和前面提到的那副对联一起于2000年被翻刻于兰州碑林，立于青峰之巅、大河之畔。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时令已是初夏时节，敦煌四周全是戈壁滩，温差较大，每到中午，烈日炎炎。张大千看到范振绪偌大年纪，挥汗不已，于是取出一把携带的素面金陵折扇，亲自在扇面上画山水一幅，并在左上角题写诗文及长跋，赠予范振绪。

南天青卞美连城，北地林泉拱众星。

更向九州数光隆，大风惭愧草堂灵。

黄鹤山樵真迹传世者，当推狄平子《青卞隐居》、张汉卿《林泉清集》及寒家《夏山隐居》为最。此能用三图，笔呈禹丈吾师教正。张爱。

张大千文中所提到的“黄鹤山樵”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王蒙，他自号黄鹤山樵。王蒙的山水画多为大幅，以繁密为特色，同一幅画中，常使用多种皴、擦、点、染技法，变化丰富而又有机统一。张大千对他极为推崇。他还指出王蒙的真迹传至当时有三幅最为有名，分别为民国收藏家狄平子的《青卞隐居图》，画面秀润灵动；张学良将军所藏的《林泉清集图》，苍郁沉厚；以及张大千自藏的《夏山隐居图》。而这幅扇面，张大千则将此三图的画法糅合用之，使之集王蒙笔法之精妙，实处深厚，虚处空灵，小中见大，显示出张大千对传统绘画的深刻理解和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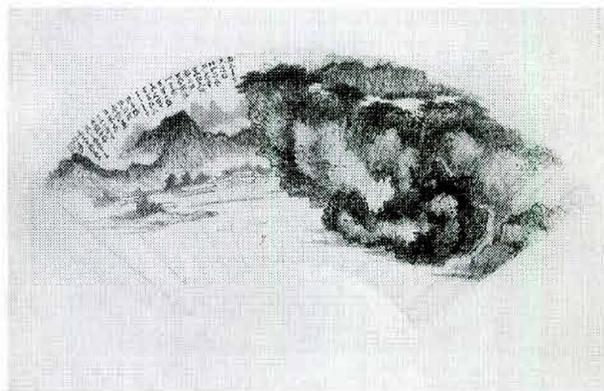


会贯通，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

似乎张大千画完扇面还意犹未尽，他又在折扇背面题有《三姝媚·题天女散花图》词一首：

天风吹不断。惹娇红纷飘坠，愁沾怨瑟瑟，云裳拥翠辇，
无奈凤恬鸾懒。月姊相逢，曾记得，霞绡亲剪。病起维摩，烦
恼依然，鬓丝嗟晚。谁念春光回换。

叹几度随潮泪痕，同散一榻枯禅。任世间儿女梦，葱魂茜



张大千绘赠范振绪扇面

触处，华空环佩，杳歌尘栖扇。终有情缘，弹指余香未浣。三
妹媚旧题散花天女一阙，辛巳夏日沙州莫高窟录奉禹老道翁正
律，蜀郡张大千爰。

题记中可以看出之所以称为旧题，因为这是大千先生于五年前作于
苏州网师园的一首词。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张大千临摹壁画 276 幅，还编撰了 20 多万字
的《敦煌石窟记》。大千因汲取了大量壁画的精髓，在此时画风为之一
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敦煌时期对他以
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 年 2 月，国民政府在
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宝窟的管理、保
护、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
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
大千请教。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
全都送给了常书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宝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
础。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创作的壁画艺术在内地香港等地的展出，引起
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画坛引
起极大轰动，卷起一股“敦煌热”。不仅在社会上感召了一大批被敦煌
艺术深深吸引的有志青年，投奔、献身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的工作之
中，更使中国璀璨的敦煌艺术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

张大千一行自敦煌返回路过武威时，又受到马步青的热情接待。马



步青还拿出了自己收藏的黄庭坚的《墨竹赋》、明代赵藩平乡王的《墨梅图》请张、范二人观看。范振绪观后真有陶醉之感。而马步青又嘱范振绪题写书斋匾额，范振绪想到马步青既收藏有黄庭坚的《墨竹赋》又有平乡王的《墨梅图》，因此挥毫为马步青题写了“醉竹斋”。张大千为此赋诗一首：

野服恣谈笑，将军礼数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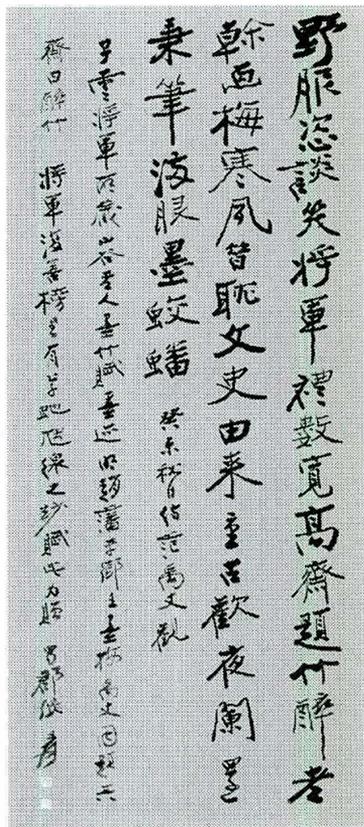
高斋题醉竹，老干画梅寒。

夙昔耽文史，由来重古欢。

夜来还秉笔，满眼墨蛟蟠。

癸未秋日，侍范禹丈观子云将军所藏山谷老人墨竹赋墨迹、明赵藩平乡王墨梅，禹丈因题其斋曰醉竹。将军复善榜书，有草蛇虺线之妙。赋此为赠。蜀郡张爰。

1943年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举行，展出张大千敦煌临画及个人创作绘画百余件。当时的社会贤



张大千行书轴

达、政府要人诸如朱绍良、谷正伦、张维、高一涵和鲁大昌等人主持了开幕式，各路媒体也进行了采访报道。《西北日报》当日在头版刊文道：

中国绘事，千百年来，六法多门，人物寝绝，宗师不作，一发难维。大千先生近数年间，寄迹敦煌，研治壁画，黼黻丹青，追风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隐而复彰；六朝隋唐之迹，晦而复显。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观者达万人以上。各界人士均认为此次展品实为张大千近年之杰作，均别具风格，观者无不饱赏眼福而去。

这是敦煌千年艺术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展示，成为当时国内美术界一大奇观。当时观众如潮，其中展出的一幅六尺墨荷中堂，有观众感叹，如此巨幅画作，真不知如何一笔钩出荷叶茎。因为一笔钩下去，行笔不到一半，就会墨尽而干滞。而有人说，这就是大千先生分两笔画成，只是大千先生功力非凡，看不出连笔的痕迹。展出首日，参观者达万余人次，大千的画作被订购一空。此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连续在成都、重庆展出，仍然观众如潮，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

姚凤岐“点睛”有“绝活”

狩猎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谋生技能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狩猎逐渐具有了娱乐、军事、体育的多重性质，成为一项集体性的综合运



动。古时一些画家又将旌旗猎猎、骏马嘶鸣、猎犬奔逐的场面涉入画幅，使之具有了艺术元素。如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就曾绘有一系列的《乾隆出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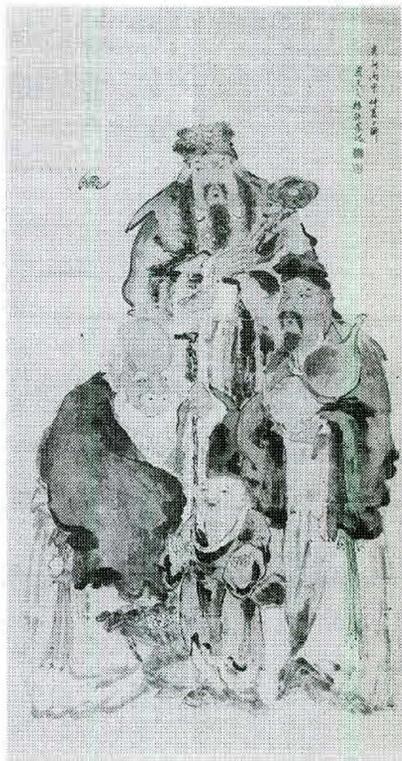
创作描绘狩猎之类的作品，可谓是对画家艺术水平的检阅，因为画面要涉及人物、动物、山水或是花卉、鸟禽等。

清末，兰州有一位画家即爱狩猎图、祝寿图的创作，他就是姚凤岐。姚凤岐，字文辉，辽东人，寓居兰州以鬻画为生。他所绘狩猎图及祝寿图，形神兼备，人物栩栩如生，为时人所欣赏。

当时从姚凤岐学画者甚众，一时范振绪、陈韶伯、孙文德等人皆汇于其门下，以师礼事之。

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中讲了一个故事：

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不点睛。每曰：“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皆在。



姚凤岐绘《三星图》

这也就是后来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画眼睛不难，但眼睛要画得出神很难。姚凤岐画眼睛，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点睛”，却有一套“绝活”，而且秘不示人。在他众多的徒弟中，只有陈韶伯深得姚凤岐真传。

陈韶伯，字思舜，甘肃临洮人。他拜于姚公门下，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于人物画，更是潜心摹练，其中八仙图等颇得时人欣赏，并称他的画“传神写照，栩栩如生”。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正是凭借着他从姚凤岐处学得的“点睛术”，以至后来成为临洮画坛魁首。据说陈韶伯后来来到兰州售画，当时有人为了给甘督张广建贺寿，购买了一幅陈韶伯画的《麻姑献寿图》。张广建看到此画时，很是满意，马上派人请陈韶伯入府列席参加寿典，并留府作画数月。此后，陈声名鹊起，以后凡有名流邀请他去作画，皆以车马接送。



参考文献

1. 张国常. 重修皋兰县志 (光绪) [M]. 兰州陇右乐善书局石印本, 1917.
2. 秦明智, 徐祖蕃. 淳化阁帖选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1.
3. 薛仰敬. 兰州古今碑刻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7.
4. 流萤. 塔影河声 [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 3.
5. 曾雪梅. 还读我书楼珍藏尺牋考解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9.
6. 兰州市博物馆. 陇右翰墨选粹 [M].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12.
7. 甘肃省书画研究院, 甘肃省群众艺术馆. 明清百名进士墨迹 [M]. 1994: 7.
8. 李世嵘. 清代金城画龙名家宋万选 [N]. 兰州: 兰州日报, 2009.
9.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 陇原鸿迹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1994: 1.

后 记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是城关区重点出版项目，旨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区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激发热爱城关、建设城关的情怀。

2013年3月，丛书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在城关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城关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紧密结合城关地情实际，在充分研讨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编撰大纲，确定了文体及篇目，发动、组织兰州地区有一定文学造诣、熟悉城关区情、热衷弘扬传统文化的学者、作家成立编辑部，并根据各作家、学者的研究志趣、学术专长和写作特点，逐项分解落实编写任务。经过搜集、挖掘、筛选、整理、加工、审定等一系列浩繁工作，历时四年，数易其稿，终于顺利出版。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不仅对城关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和盘点，同时也补充了地方史志的不足，为全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然，由于思想高度、认识水平、专业能力有限，同时，由于各个时期的人物、文化遗存、风土人情等历史跨度大，时间久远，难免错漏，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教正。

作为城关区文化建设中一项浩繁艰巨的工程，丛书从筹划立项，到编撰刊印，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区委、区政府领导坚定的文化清醒和积极的文化创新，得益于所有参编者的精诚团结与埋头工作。这套丛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着兰州市特别是城关区社会各方人士的辛劳和才智，承载着保存、传承、开拓城关悠久历史文化的美好愿景。值此丛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编纂出版的各位领导、文史专家、学者、参编者和有关单位及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与一块地域悠久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相比较，任何图片的展示、文字的表述都是苍白的，都如同在大海里撷取了几朵浪花。本丛书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寻访城关历史文化蕴藏的线索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以本书为向导，顺藤摸瓜，寻幽探隐，以您的新发现，来填补本丛书之缺陷，共同推动优秀文化遗产服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

本书所用图片部分来自网络，署名者谁？故未敢掠人之美，尚请相关作者告知，以付薄酬。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编委

主 编 韩春梅

编 审 姜洪源

学术顾问 邓 明

策划指导 张卫东

编 务 高 峰 孙 霞 赵文娟

杨重来 聂 民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街巷旧事》

《良风美俗》

《土木之功》

《艺苑经典》

《工商辐辏》

《人物春秋》

《名札集束》

《文博精藏》

《千载芸香》

《杏坛遗泽》

《太平鼓韵》

《金声玉振》

责任编辑：吴艳丽

封面设计：李中安